中國中古社會史略論稿

毛　漢　光

前　言
第一篇　中古統治階層之社會基礎
第二篇　中古統治階層之社會成分
第三篇　中古家族之變動
第四篇　中古士族性質之演變

前　言

社會所表露的現象，林林總總，千頭萬緒；欲提綱挈領，抽絲剝繭，本已困難重重。而過去的社會現象，復由於史料缺乏，或史家記載角度不同，越增研究艱難。後人研究既囿於材料，於是乎記載較詳部份常被細論，少見於記載者每被忽略，屢屢輕重失敍，難窺全豹。又國人記載歷史，有關政治活動者居多，社會史要從政治史中爬梳而得，一項社會發展，每困於政治史的斷代而不能通其變。在此一鱗半爪的社會史料裏，其能超越朝代更迭，點中演變關節，而爲社會史探出蛛絲馬跡如前輩陳寅恪先生者，鳳毛麟角。著者有見於社會史有其獨自發展的趨向與意義，多年來習作試探性論著七、八篇，普遍論及魏晉南北朝隋唐各代社會現象，思前慮後，尋其脈絡，今融會寫出，以就教於世人。

一如自然科學然，當新工具新觀念的出現，每每鼓舞人們追求新的發現。近代社會科學所採用的方法與觀念，激起著者重整社會史的動機，在資料許可的情況之下，本文儘量以客觀的量化以展示出種種社會現象，以減少主觀所引起的誤差。社會是變動的，今日的事物與昨日不同，明日又不同於今日，故動態觀念是研究本題的中心思想。

中國正史內容多偏於統治階層的活動，本文受此資料之限制，祇得把重心放在討論統治階層這一層次上，名雖曰社會史，實際上兼有政治史的內容，尤其集中在政治領域與社會領域的焦點上；故政治力與社會勢力之消長演變，常被用以說明種種社會

現象的內在因素。社會史中的平民部份，亦甚重要，待收集足够資料後，再予細論。

本文所謂「中古」，是指東漢獻帝建安至唐昭宗天祐年間（公元197–906 A.D.），本文並不欲捲入中國社會史分期的論辯之中，其所以取這七個世紀作爲研究對象。乃依據本文量化之結果所示，漢末興起的那一類士族，在這段時期之中，連續性地占統治階層的絕對多數，構成一個共同社會架構也。

本文包括四大部分，卽：中古統治階層之社會基礎、中古統治階層之社會成分、中古家族之變動、中古士族性質之演變。中間二章以量化爲骨幹，首尾二章重視質的分析，希望能兩者並重，表裏相映。

第一篇　中古統治階層之社會基礎

（一）統治階層與社會領袖

影響國家政治者可以是少數人，也可以是多數人，也可以是人民全體，端視其政體的不同及人民對政治的關心程度而有差異。然而揮舞政治權力和直接行政者恒是全體人民中的少數人而已。墨斯加氏的大著「統治階級」(Gaetano Mosca: The Ruling Class)[1] 裏，曾經討論分析了各種統治型態，就其整個貢獻而言，最被人們採信的一點乃是在於他强調統治者在各種政體中只是整個人口的少數人。這是一個平淡無奇不言而喻的見解，但也是研究社會科學的最基本認識，有了這種認識才不會被某些政治哲學家帶向理想，而作罔顧現實的研究。然則吾人要問，統治階層既屬整個人口的少數人，何以能順利地統治多數人？純武力的控制只能解釋爲一時的現象，是當征服者或新建立王朝者的最初憑藉，但是一個政權若永遠憑藉其赤裸裸的權力是危險的，我們雖不可武斷地說這種方式不能保持長久，至少這種統治型態不會太穩固，被統治者誠然感到不舒服，統治者何嘗會高枕無憂。俗語云：「馬上得天下，不可馬上治天下」，顯然治天下與得天下的方法不同。統治階層既不能由多數人參與，則如何能得到多數人的支持呢？我國歷來採用的方法之一，是統治階層實施爲大多數人的福利政策，孔子的仁政、孟子的民本思想是也。但是人民需要什麼？如何去實行？並非容易之事，統治者認爲一種政策有利於人民，而實際上却常是擾民或害民，尤其在古代社會科學不發達，對於政治社會上若干問題沒有深刻的研究，民意不能很正確地表

1. Gaetano Mosca: The Ruling Class.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39

達，在這種社會裏，即令有心想把事情做好的統治者，有時也無形中做些害民之事，從這方面而言，從民間出身的人物，猜測人民的需要較爲準確，但是到了第二代以後，子孫們「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我們常常看到民間出身皇帝若干措施受到讚美，而末期皇帝不是暴君便是昏君，盡是做些害民之事，所以所謂仁政、民本的福利政策，尙屬學者們的理論階段。

另一種獲得大多數人支持的方法是引用社會領袖參與統治階層。社會中領導階層一方面是社會力量的中堅份子，一方面能反映社會一般需要，我國歷史上能够安定社會及穩定政治者，大都採取或巧合了這種辦法。社會領袖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使我們想起羅素在其「權力論」(Bertrand Russell: Power-A New Social Analysis)[1]第三章中所舉的例子——「即引誘羊羣上船，必須使用强力將其領袖拉過舷門，其餘的於是便自動的跟了上去」。當然人類比動物複雜得多，人的思想豐富，生活多姿多彩，長於某一方面者可能短於其他方面，也就是說某些地方是他的强點，某些地方可能是他的弱點，我們如果假定强點即是力量即是權力，則人類相互間的權力大小是如此地複雜，以致無法像動物一般地很明顯找出自然領袖來，但是社會領袖畢竟是有的，這需要從綜合力量的分析中獲得。綜合力量是多元的，正如羅素在「權力論」中所說：從社會意義上將權力分爲若干種，即僧侶的權力、帝王的權力、赤裸的權力、革命的權力、經濟的權力、輿情的權力、教條的權力等。我們融合羅素之意，可將權力分析爲下列幾種：(一)赤裸的權力：依羅素云，這種權力是剝去所有其他權力，最後所露的力量，亦即當人民尊敬或服從權力，而非爲其他任何理由時，其權力是赤裸裸的，如武力、如打手等。(二)傳統權力：人大多數是依習慣而生活，對於慣例常視爲當然，而不去想一下。傳統權力有習慣力量擁護它，它不須以理由肯定自己，也不須繼續證明，反對它却需要强大的力量，從這時就可發現傳統權力的存在。一般而論，第一代開國之君或憑武力，第二代即可能初具傳統權力。(三)知識權力與宗教權力：除了「知識即力量」以外，知識與宗教本身都被人們認爲有某些神秘性，一個社會裏知識及宗教權力的大小與該社會對其敬仰成正比。(四)經濟權力：由於經濟權力常常衍生其他權力，或表現在其他權力上，所以許多人相信經濟權力不是原始的，而

1. Bertrand Russell: Power-A New Social Analysis 王鳳喈譯本

是轉成的。但也有許多人認爲經濟因素是人類文化中最重要的基因，因此經濟權力也具根本性與原始性，(五)輿情權力。憑藉宣傳力量，製造出社會上共同的欲望、目標、價值標準，而使符合者獲得公認的價值，不符合者蒙受壓抑。

人類所擁有這些權力是複雜的，這種權力綜合的大小決定社會階層，拉斯威爾氏 (Harold D. Lasswell) 從事於權力的研究，他認爲社會上有許多有價值之物 (Available Values)，獲得較多者是傑出之士 (Elites)，獲得較少者便是人民大衆[1] (Masses)。「價值」是拉斯威爾所認爲產生權力的原素，他是以另一角度分析權力，然而其所指的 Influence 與羅素所謂 Power 在意義上有異曲同工之妙。而兩氏皆共認社會領袖是綜合某些優勢而產生的。

有關社會領袖的研究，自 Vilfredo Pareto 提出 Elite 觀念以來[2]，經 Gaetano Mosca 系統整理[3]，有 Thostein Veblen[4]、Joseph Schumpeter[5]、Ferdinand Lundberg[6] 等着重經濟角度分析，有 Harold D. Lasswell[7]、Raymond Aron[8] 等着重政治角度分析，有 Stanislav Andreski[9]，着重軍事角度分析，有 James Burnham 氏着重商業經理之分析[10]，有 S. N. Eisenstadt[11] 着重官僚之分析，有 Karl Mannheim 對智識方面之分析[12]，而 C. Wright Mills[13]、G. William Domhoff[14]、

1. Harold D. Lasswell: The Political Writing of Harold D. Lasswell. pp. 295.
2. Vilfredo Pareto: The Mind and Society. Brace and Company 1942
3. Gaetano Mosca: The Ruling Class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39.
4. Thostein Veblen: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Viking press paperback 1948. First published 1899.
5. Joseph Schumpeter: Imperialism—Social classes.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1th printing 1971. First published 1955.
6. Ferdinand Lundberg: The Rich and Superrich. Bantam Book, Inc. 4th printing 1969. First published 1968.
7. Harold D. Lasswell: Politics—who gets, what, when, how.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1th printing 1968. First published 1958,
   Harold D. Lasswell, D. Lerner and C.E. Rothwell: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Elites.
8. Raymond Aron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Ruling Class"—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I. 1950.
9. Stanislav Andreski: Military Organization and Socie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10. James Burnham: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11. S.N. Eisenstadt: 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Empire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Historical Bureaucratic Societies. Free press paperback 1969. First published 1963.
12. Karl Mannheim: Idealogy and Utopia. Harvest Book paperback. First published 1936.
13. C. Wright Mills: The Power Elite. Oxford Univesity press paperback 1959. First published 1956.
    C. Wright Mills: White Cola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3th printing paperback 1964. First published 1951.
    Compiled by G. William Domhoff and Hoyt B. Ballard: C. Wright Mills and the Power Elite. Beacon press 1969. First published 1968.
14. G. William Domhoff: Who Rules America ? Prentice-Hall 1967.

及 Robert A. Dahl[1] 等氏對美國社會之研究，已綜合各種角度的 Elites 而論之。

以中國史爲研究 Elites 的著作，有許倬雲「先秦社會史論」[2]、Wolfram Eberhard: The Rulers and Conquerors: Social Forces in Medieval China[3]、何炳棣「明清社會史論」[4]、費孝通「中國的縉紳」(China's Gentry)[5]「農民與縉紳」(Peasantry and Gentry)[6]、張仲禮「中國縉紳」(Chinese Gentry)[7] 蕭公權「中國鄉村」(Rural China)[8] 都承認中國的縉紳在地方上是核心人物，對一般人民而言，他們是社會領袖，社會的上層人物，就是因爲縉紳綜合所有權力的平均力量較高。在我國中古——即漢末宋前時期，擁有較大社會力量者亦即社會階層的上層人物是士族及地方豪族。在漢朝崇尙儒術之後，上自帝王，下至庶民，皆以學術（尤其是儒術）爲高，士族擁有知識，受整個社會的敬仰。又自東漢以來，士族在政治上日占重要性[9]，累代官宦在地方上常是多世大族[10]，品德、才貌、官宦、一代代地累積着，自然產生羅素所謂的傳統權力，又不論官宦以前或官宦以後，每個大族常建立有龐大的經濟後盾，通常都以大地主的身份出現，這是支持其門望的物質基礎。從史料裏我們每常發現這些士大夫相互標榜，這種風氣自東漢末年就已流行，如「三君」「八俊」「八厨」等，好像整個社會中好人就只有他們幾個。不獨此也，他們似乎是社會上價值標

1. Robert A. Dahl: Who Governs ? Yale University press 11th printing 1967. First published 1961.
2. 許倬雲 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關於這方面的論文還有：
"西漢政權與社會勢力的交互作用" 史語所集刊第35本 1964。
"三國吳地的地方勢力" 史語所集刊第37本上册 1967。
3. Walfram Eberhard 關於這方面的著作還有：
Social Mobility in Traditional China 1962.
4. Ho, Ping-ti: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5. Fei, Hsiao-t'ung: China's Gentry. Unive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6. Fei, Hsiao-t'ung: "Peasanty and Gentry: An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social Structure and its Changes"
7. Chang, Chung-li: The Chinese Gentry: 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th-century Chinese societ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55
8. Hsiao, Kung-chuan: 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0.
9. 參見楊聯陞 "東漢的豪族" 清華學報11卷4期 1936
余英時 "東漢政權之建立與世家大姓之關係" 新亞學報1卷2期 1956
10. 參見龐聖偉 "三國時代大族" 新亞學報6卷1期 1964

準的制定者，又配合選舉制度(九品中正制度)，其輿論的力量更顯得無比的巨大。當亂世之秋，大族的宗黨、部曲、門生、幕客、奴婢常常是一股武裝單位[1]，是赤裸權力的基礎。白樂日著「中國的文明與官僚政治」(Etienne Balazs: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2]中亦强調中國士大夫家族所包含的力量是綜合各方面的，他說：

> (中國)士大夫(官吏)階級在數量上僅是極少數人，但是由於他們有力量、影響力、地位、聲望，掌握有所有的權力，擁有大量的土地，因此權力顯得無比的巨大，這個階級並且有每種特權，最主要的因爲他們壟斷教育而享有塑造其本身成員的特權。

就社會勢力而言，團體的力量應比個人的力量爲大。在我國中古時期，宗教極爲盛行，但遠無歐洲中古天主教有組織有力量；新型政黨尚沒有出現；行業公會亦沒有建立[3]；唯有以血緣爲基礎的家族是當時社會力量的中堅。社會中有能力的個人雖亦有某些力量，但個人不能延續長久，他雖可作爲反映社會需要的代表，如「鹽鐵論」中賢良方正與大司農桑弘羊的辯論，但大部份都很快失去其社會性，而成爲統治者的爪牙。

士大夫家族——士族，是中古社會上一股最有力量的社會勢力。政治統治者爲了要穩定其政權，設若無法摧毀這股勢力，以自己所建立的社會勢力代之，則必須覓取這股社會勢力的合作，獲得他們對政權的支持，也就是引用社會領袖參與統治階層，分享政治地位與政策。擁有社會勢力者一旦參與政治統治階層，既可以保持其現有的社會地位與利益，由於政治地位之獲得，還可以增强其原有的社會地位與利益，這兩者之間的合作，是民主政治以前較普遍現象，也成爲古代政治社會安定的重要基石，在這種大趨向之下所形成的大框框，也可以反映在社會架構上。然而政治力與社會勢力畢竟不是一件事，兩者也並非永遠維持等距同重，當社會勢力較强大時，則視朝代之改變猶如一家物換一家物，其自身政治社會地位並不受重大的影響；如果政治力强大時，則將伸張其政治力，增加其對各階層人力物力之吸取，甚至努力塑造適合自己所需的社會基礎，以便於貫澈政令，兩者間權力的消融與伸縮，遂呈現出各種型態的政變與政潮，在大框框中也有一番熱鬧的景象。

---

1. 金發根「永嘉亂後北方的豪族」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 1964
2. Etienne Balazs: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6
3. 參見何炳棣「中國會館史論」引言及第一章。臺灣學生書局 1966.

有關政治力與社會勢力之間的演變關係，本章將中古時期又分爲四個階段落，即漢魏西晉時期、東晉南朝時期、北朝時期，隋唐時期，逐次討論。

（二）兩漢魏西晉

許師倬雲“西漢政權與社會勢力的交互作用”一文，對於大一統以後中央政府如何覓尋其社會基礎的嘗試，頗有啓發。該文以西漢丞相之身分爲標竿，發現高祖惠帝文帝三朝丞相皆開國功臣；景帝時爲功臣子弟；武帝時則功臣子弟外戚雜用；昭帝用掾史文吏爲相；宣帝則文吏與經學之士參半；自宣帝末期至西漢末年，顯以儒生爲主，西漢政權在覓尋其社會基礎的過程當中，並非毫無波折，自漢高至武帝，政治力的核心——皇權與社會勢力之間曾發生衝突，政治力爲想獲得較多的人力物力資源，先後約束、限制、壓迫擁有社會勢力者，如六國貴族後裔、二千石子弟、商人、游俠等，所以在西漢前期，政治階層與社會階層之間的拉力是相當緊張的。雙方都覺得不舒服、不穩定。宣帝以後逐漸任用儒生爲相，似乎找到了溝通雙方的媒介。可是這時的士大夫是個人參政。東漢政權之成立及其性質，都與豪族有較密切的關係，論者多矣！長期的發展的結果，至東漢末擁有社會勢力者有兩種人，其一是凝結中的士族，其二是地方豪强。這便是魏晉時期的歷史背景。

有關東漢末葉之羣雄紛爭以及魏蜀吳政權與社會勢力間之關係，拙文“三國政權的社會基礎”曾有分析。聲勢最龐大而又安居中原之地的曹魏政權，自其開創時期至政權穩固時期，建立在兩大支柱之上。其一是潁泗集團、其二是譙沛集團。前者是士族子弟的中心，後者是地方豪强之代表。曹操雄桀，在其有生之年頗能平衡運用這兩股勢力，有「謀士如雲，武將如雨」之感。其後這兩股勢力在曹氏政權之中漸漸磨擦與鬪爭，魏齊王芳嘉平元年，司馬懿在一次政變中殺曹爽，取得實際政權。明顯表示曹氏宗親及譙沛功臣子孫之消退，以及以河內司馬氏爲首的士大夫集團，取得絕對優勢[1]。且不論潁泗士族集團與譙沛地方豪族集團之間的鬪爭情況如何，曹魏政權大體上吸收了社會上有力量者，且維持其政權之穩定性。司馬氏當政及西晉政權之建立，士族得到充分的發展，地方豪强亦並沒有被遺棄，祇是由原先平行的地位，變成爲士族與地方豪强間上下關係的地位。九品官人法在制度上加强了這種關係。所以西晉政

1. 參見萬繩楠“曹魏政治派別的分野及其升降”，徐高阮“山濤論”史語所集刊第41本1分。1968。

權仍以士族與地方豪强作爲基石，士族則成爲居上位的主導者。士族居統治階層五品官以上之絕對多數，也在此時間昇起，這一種社會架構延續到唐代末年，凡七百年。

（三）東晉南朝

永嘉亂起，中原政局不定，許多士族大舉渡江，司馬睿立足江東，在南方建立王朝，是爲東晉。這個政權是以士族爲立國基石，其中包括二大主體。其一是僑姓，另一是吳姓。僑姓與司馬睿面臨同樣的命運，遭受同等的災難，東晉元帝之能够卽位，他們的功勞最大，東晉政權可以說是僑姓捧出來的[1]，所以僑姓在東晉朝廷中所占的比重甚大。隨着中央政府之南移，這一批遠離原籍的僑姓，不論其如何大規模地舉宗南下，他們也無法將原籍數世所累積成的經濟及社會關係完全南移。定居在南方的僑姓，大都在中央所在地建康之附近，尤以三吳、丹陽、會稽之地爲多[2]。荆州是由河南陝西南下士人的另一安居地[3]，嶺南雖有人去，並非很大的比例；對僑姓而言，原本擁有「城市與鄉村的雙家型態」[4]，至此一變爲純粹居住京師或京師附近的單一型態。

吳姓，不論其先世在何時遷入南方，至少在三國東晉之時，大家已認定他們是南方土著，通常以盛行於三國之際的「朱、張、顧、陸」[5]作爲代表，實際上它的含義應該更爲廣泛。三吳士族常常被人作爲南方士族的代表，原因甚多，其中之一是孫氏政權與東晉政權立基江東，三吳卽有三輔之說[6]，在這種局面下，三吳士族無形中成爲中央人物，西晉滅孫氏，三吳士族所受歧視，永刻在他們內心[7]，以西晉政權而言，三吳祇是遠方州郡，並不能算作樞紐區，這一點當然無法滿足三吳士族心理上的要求，所以當東晉立基建康以後，三吳士族至少在這個角度上滿足了。

西晉政權有濃厚的士族色彩，東晉的客觀形勢更形成其政權「優渥士族」[8]，兩者之間的接合，從政治現象的發展演變到制度的建立，九品中正制發揮重要功能，九品

1. 參見拙文"五朝軍權之轉移及其對政局之影響" 清華學報新八卷一、二合期，1970。
2. 參見譚其驤"晉永嘉喪亂後之民族遷徙" 燕京學報卷15 1934
3. 參見安田二郎"南朝の皇帝と貴族と豪族、土豪層——梁武帝の革命を手がかりに"載於「中國中世史研究」
4. 參見 Eberhard Wolfram: Conquerors & Rulers-Social Forces in Medieval China 導論1965修正版
5. 參見世說新語賞譽篇注引吳錄士林曰：吳郡的顧陸朱張爲四姓，三國之間，四姓盛焉。
   又見新唐書卷一九九柳冲傳。
   又見何啓民"中古南方門第——吳郡朱張顧陸四姓之比較研究" 刊於政大學報第27期。1973
6. 宋書卷五十四傳末沈約論。
7. 參見何啓民"永嘉前後吳姓與僑姓關係之轉變" 政大學報第26期，1972。
8. 參見顏氏家訓第十一涉務篇。

中正制起源於魏文帝時，一般而論在魏末西晉之際，九品中正制還未完全失去其原意。即中正評品以品德爲最重要的標準，並藉此以達勸勉之效，個人的後天修爲應該是原意的主要內容。這個制度在西晉開始不斷地士族化，至東晉而大備，於是乎不但政治力與社會勢力找到了結合的固定通道，而且密切地、層次地、制度地緊緊拉在一起，拙文「從中正評品與官職之關係論魏晉南朝之社會架構」所示，在東晉南朝時期，政治階層與社會階層結合之發展，及其最後凝固的情形。在這種大框框的體制之下，東晉南朝的改朝與政潮，一如拙文「五朝軍權轉移及其對政局之影響」一文所示，表現在士族與士族之間，士族與宗室之間等權力平衡與平衡破壞之關係上，梁末地方豪强略有風采，但寒素似乎一直僅占百分之十的比重。

儘管僑姓與吳姓有許多不同之點，在共同的强敵壓迫威脅之下，僑姓吳姓扮演建設性的角色遠蓋過兩者間相互破壞的角色，在同一片空間上延續了五朝（東晉、宋、齊、梁、陳）。這是南方政權最重要的支柱。

（四）北朝之漢姓

南北朝時期，北方與南方的社會架構相似，但由於各自複雜的組合與發展，故其類似之中，有不同的特色。永嘉亂後，北中國所遭遇的紊亂與破壞，非南中國可比。司馬睿在南方建立政權的前後，有許多大族南遷，當然，一個大士族的房支甚繁，與中央政府較密切的房支可能南渡，地方性較濃厚的房支仍留在原籍，其例甚多，如河東聞喜裴氏、河東解縣柳氏、京兆杜陵韋氏、太原晉陽王氏等，皆分裂爲南北二大支。在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中，也可找到很多類似例子。還有一些士族甚至無人南奔。這些留在北方的士族或房支，因中原失御，屢屢易主，爲求生存，不得不保持地方力量，而表現出濃厚的地方色彩。士族及各地地方豪族在永嘉亂後到處建立塢堡[1]，是最具體的地方自衞方式。全晉文卷一〇八劉琨與丞相箋：「（兗州）二千石及文武大姓連遣信使求刺史……」，一般認爲所謂文大姓可能指士族，武大姓大部份指地方豪族。「文」是士族的特色之一，但亦非沒有以「武」爲特質的士族，如河東汾陰薛氏[2]；「武」是地方豪族的特色之一，然而事實上由於北方特殊情況，士族純以文事相尚者，

1. 金發根「永嘉亂後北方的豪族」。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出版委員會。
2. 參見魏書卷四十二薛辯傳、卷六十一薛安都傳。

甚難生存，許多士族兼有龐大的地方勢力，例如范陽涿縣盧氏[1]、清河東武城崔氏[2]、趙郡平棘李氏[3]、及「瀛冀諸劉，清河張、宋，幷州王氏，濮陽侯族」[4]，在北魏後期仍保持强大的地方勢力。所以北方的士族與地方豪族重疊面較廣，尤以北魏政權仍未强化之前爲甚。

（五） 胡人政權與漢人社會勢力之結合

北魏入主中原是第一個在北中國成功地建立王朝的異族，一百五十餘年的統治大體上相處尙爲融洽，拓拔氏自始便採取與漢族士大夫合作態度。魏書卷二太祖道武帝本紀記載太祖道武皇始元年（稱帝後之第十一年）平幷州時：

> 帝初拓中原，留心慰納，諸士大夫詣軍門者，無少長，皆引入賜見，存問周悉，人得自盡，苟有微能，咸蒙敍用。

魏書卷三十二崔逞傳記述太祖時：

> 司馬德宗（東晉）荆州刺史司馬休之等數十人爲桓玄所逐，皆將來奔，至陳留南分爲二輩，一奔長安，一歸廣固。太祖初聞休之等降，大悅，後怪其不至，詔兗州尋訪，獲其從者，問故，皆曰：國家威聲遠被，是以休之等咸欲歸闕，及聞崔逞被殺，故奔二處。太祖深悔之，自是士人有過者，多見優容。

許多異族的統治者都瞭解與被征服者合作之重要，北魏是成功的實例。北魏的做法完全吻合於政治力與社會勢力結合的原則，這是欲與被統治者維持良好關係的辦法。北魏在「馬上定天下」之後，假藉豪族合作以治理天下。魏書卷一一三官氏志：太祖道武帝天賜二年（稱帝後之第二十年）制：

> 諸州置三刺史，刺史用第六品者，宗室一人，異姓二人……郡置三太守……縣置三令長。

異姓之中有鮮卑貴族、從龍部落酋豪、與中原大姓，由當時實際任命者看，刺史、太守、縣令往往以本地大姓爲之，則此三頭馬車政策係政治力與社會勢力合作之最佳實例。迨北魏軍事上漸次統一中國北方之後，更廣泛地吸收各地大豪族參與統治階

1. 參見北齊書卷二十二盧文偉傳。
2. 參見北齊書卷六十三崔悛傳。
3. 參見資治通鑑卷一五五梁中大通三年二月條。
4. 通典卷三引宋孝王關東風俗傳。

層。

魏書卷四十八高允傳：

> 魏自神廟以後，宇內平定，誅赫連積世之僭，掃窮髮不羈之寇，南摧江楚，西盪涼域，殊方之外，慕義而至，於是偃兵息甲，修立文學，登延儁造，酬諮政事，夢想賢哲，思遇其人，訪諸有司，以求名士，咸稱范陽盧玄等四十二人，皆冠冕之胄，著聞州邦，有羽儀之用，親發明詔，以徵玄等，乃贖官以待之，懸爵以縻之，其就命三十五人，自餘依例，州郡所遣者，不可稱記。爾乃髦士盈朝，而濟濟之美興焉。

這三十五位徵士的族望姓氏爲：

范陽	盧玄	趙郡	呂秀才
范陽	祖邁	太原	張偉
范陽	祖侃	中山	劉策
渤海	高允	中山	張綱
渤海	高毗	中山	郎茁
渤海	高濟	常山	許琛
渤海	高欽	西河	宋宣
博陵	崔綽	西河	宋愔
博陵	許堪	燕郡	劉遐
博陵	崔建	河間	邢穎
廣寧	燕崇	雁門	李熙
廣寧	常陟	廣平	游雅
京兆	杜銓	長樂	潘天符
京兆	韋閬	長樂	杜熙
趙郡	李靈	上谷	張誕
趙郡	李遐	上谷	侯辯
趙郡	李詵	雁門	王道雅　關弼

以上三十五人，從其身份而言，「皆冠冕之胄」，從其社會地位而言，「著聞州邦」。

如若再注意其地望，所徵人物「東至渤海，北極上谷，西盡西河，南窮中山」，從徵士地理分佈圖可見北魏不但吸收社會階層的上層人物，且注意及其地理分配[1]。

不僅在形式上北魏統治階層徵用中原士族，「曠官以待之，懸爵以縻之」，在實質上這批參與北魏統治階層的社會領袖們確實影響到北魏的政策與行政，有許多重要政策的擬訂似乎皆經過諮商的結果。例如當遊牧民族統治農業民族時，最易發生衝突的是生產方式過於懸殊，遊牧民族以畜牧爲主，草地是畜牧的根本，其所需要的面積較大，所以當遊牧民族征服農業民族時，常常大量地圈劃良田爲草場，引起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嚴重的衝突。在高允與世祖的一段政策諮議中，我們發現異族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協調的實例。魏書卷四十八高允傳云：

> 世祖引允與論刑政，言甚稱旨，因問允曰：萬機之務，何者爲先，是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者衆。允因言曰：臣少也賤，所知唯田，請言農事，古人方一里則爲田三頃七十畝，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百里損益之率爲粟二百二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哉？世祖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民：

崔浩爲相，大量援引中原士族，同傳云：

> 初崔浩薦冀、定、相、幽、幷五州之士數十人；各起家郡守。恭宗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勞勤未答，今可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爲郎吏，又守令宰民宜使便事者，浩固爭而遣之。

拓拔氏的另外一項成功的政策是把胡人的上層階級與中原士大夫結合在一起[2]，一方面冲淡了種族的隔閡，一方面顧及社會勢力的平衡。

（六） 北魏政治力與社會勢力之推移

北魏採取較具有彈性的政策以統治北中國，故其政治力與社會勢力之間，一直在微妙地變動着。

永嘉亂後至拓拔氏統一北方以前，漢人社會大致上以地方自衛體系爲主，士族一般都是郡級領袖，地方豪族則爲縣級以次的領袖。胡人則以部落爲單位，以與拓拔氏之親疏和部落大小爲等次。

---

1. 參見賀次君"西晉以下北方宦族地望表"禹貢3卷4期，北魏一朝皆重視地理分配。
2. 參見孫同勛「拓拔氏的漢化」頁50，胡漢官吏比例統計表。

及拓拔氏力排羣雄，最後統一中國北方，王權已超過往昔部落盟主之時，但仍然沒有力量直接控制地方，尤其是地廣人衆的漢人社會。自道武入居中原，乘王權高漲之勢，首先是將部落解散，改爲編戶，魏書卷一二三官氏志云：

四方諸部，歲時朝貢。登國初，太祖散諸部落，始同編民。

北史卷八十外戚賀納傳亦云：

道武平中原，離散諸部，分土定居，不聽遷徙，其君長大人，皆同編戶。

僅有極少數部落可得例外，如北史卷九十八高車傳云：

道武時分散諸部，唯高車以類粗獷，不任使役，故得別爲部落。

能將有形的同盟部落打散，已顯示出拓拔氏王權已强化，但部落遺留下的無形力量，不可忽視，所謂「其君長大人，皆同編戶」，恐怕是從純政治體制而言，在社會體系上其君長大人決不可能立刻降爲一般編民，故有宗主督護制出現，陳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禮儀篇有云：

魏初宗主督護之制，蓋與道武時離散部落，改爲編戶一事有關，實本胡部之遺蹟，不僅普通豪族之兼併已也。

宗主督護制實施於整個北方的胡漢社會中，對於胡人而言，陳寅恪先生之論甚是；對於漢人社會而論，宗主督護制是承認並鼓勵豪族兼併現象。承認漢豪族是拓拔氏的重要政策，將打散後的小部落（宗主督護）與中原地方豪族結合，使成爲北魏政權的基層領袖，既吻合漢地的社會架構，同時亦是北魏前半期政治力的極限，所以宗主督護制是拓拔氏的巧妙安排，當然，其中含有濃厚的政治力與社會勢力妥協的意味，余遜在"讀魏書李沖傳論宗主制"文中云：

抑魏初之於鄉里豪右，不僅採羈縻之策，使其不爲已害而已，甚且假以位號，牢籠之，策勵之，以收其力用。夫既撫之以恩，則自不願綜覈名實，出其蔭蔭之戶，以重傷其心。宗主制者，以督護之責，委之大族豪右，而不必檢校其戶口，斯豪强之所甚願。故宗主制與羈縻政策，如輔車之相依。

北魏同盟部落在入居中原以後，放棄以部落爲單位的政經大權，在宗主督護制之下，還享有何種特權（漢人豪族同）呢？據魏書卷五十三李沖傳云：（孝文帝時）

舊無三長，惟立宗主督護，所以民多隱冒，五十三十家方爲一戶。

又魏書卷一一〇食貨志云：

> 魏初不立三長，故民多蔭附。蔭附者，皆無官役，豪彊徵斂，倍於公賦。

從北魏前半期的稅制入手，更能看出其中癥結所在。按魏書卷一一〇食貨志云：

> 太和八年，始準古班百官之祿，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戶以九品混通，戶調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粟三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至是，戶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爲官司之祿。後增調外帛滿二匹，所謂各隨其土所出。

這麼高的賦稅，非一夫一婦所構成的小戶所能負擔。又北魏屢有臨時徵調，如魏書卷三太宗紀泰常三年九月詔：

> 諸州調民租戶五十石，積于定、相、冀三州。

同書卷七高祖紀上延興三年七月詔：

> 河南六州之民，戶收絹一匹，綿一匹，租三十石。……（十月詔）州郡之民十丁取一，以充行，戶收租五十石以備軍糧。

祇有五十三十家合一戶，才能繳付如此鉅大稅徵。這種方式形同包稅制，以一個宗主的小部落或一個小村落算作一戶，政府指定每年徵收一個整數的粟米布帛；若在特殊情況下，亦以此大戶爲單位，要求支付三十石、五十石以作急需之用。制度上並沒有規定每戶包含幾家，有的大戶恐怕還會超過五十家。戶長當然是士族、地方豪族、散解後的部落大人。戶長與各家的權利義務如何，亦無規定，故在政府徵收公賦與豪强私收的私賦之間，有着鉅大的彈性，這便是豪族的實利。

士族相當於郡級豪族，其權利義務型態一如地方豪族，在程度上可能較大型些。這一點從上段引文「太和八年，始準古班百官之祿」語中得知，按北魏曾吸收許多郡級士族任官中央，在孝文帝太和八年以前，官吏無俸祿，自必需有龐大的原籍基業才能供養。這也注定了北魏士族對原籍特別重視，對地方利益非常關懷。中央化的士族亦有，但與南朝僑姓多以俸祿爲生[1] 的情況，在程度上有極大差別。北朝士族大部份皆未完全脫離其原籍基業，所以「包稅制」對他們的利益一如地方豪族，這一點可從

1. 顏氏家訓卷十一涉務篇：「江南朝士，因晉中興，南渡江，卒爲羈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資俸祿而食耳」。

孝文帝廷議改革宗主制時，分析其正反意見之人物背景時得知，魏書卷五十三李冲傳云：

> 舊無三長，惟立宗主督護，所以民多隱冒，五十三十家方爲一戶，冲以三正治民，所由來遠，於是創三長之制而上之。文明太后覽而稱善，引見公卿議之。中書令鄭羲、秘書令高祐等曰：「冲求立三長者，乃欲混天下一法，言似可用，事實難行」。太尉元丕曰：「臣謂此法若行，於公私有益。」咸稱「方今有事之月，校比民戶，新舊未分，民必勞怨。請過今秋，至冬閑月，徐乃遣使，於事爲宜。」冲曰：「民者冥也，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調時，百姓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課調之月，令知賦稅之均」，著作郎傅思益進曰：「九品差調，爲日已久，一旦改法，恐成擾亂。」太后曰：「立三長則課有常準，賦有恒分，苞蔭之戶可出，僥倖之人可止，何爲而不可？」遂立三長，公私便之。

三長制原提議人李冲，魏書卷五十三本傳云：「隴西人，敦煌公寶少子也」。同書卷三十九李寶傳：「私署涼王暠之孫也」。這一支似乎是涼室後裔，附魏以後，漸漸步向官僚羣中，以俸祿賞賜爲重要經濟來源，本傳云：「冲爲文明太后所幸，恩寵日盛，賞賜月至數十萬，進爵隴西公，密致珍寶御物，以充其第，外人莫得而知焉。冲家素清貧，於是始爲富室」。文明太后及太尉元丕贊成立三長，他們站在皇室立場，三長制對皇室最有利，贊成理由可以理解。反對三長的有鄭羲、高祐、傅思益。魏書卷五十六鄭羲傳云：

> 滎陽開封人，魏將作大匠渾之八世孫也。曾祖豁，慕容垂太常卿，父曄，不仕……遷（羲）中書侍郎。延興初陽武人田智度年十五，妖惑動衆，擾亂京索，以羲河南民望，爲州郡所信，遣羲乘傳慰諭，羲到宣示禍福，重加慕賞，旬日之間，衆皆歸散，智度奔潁川，尋見擒斬，以功賜爵平昌男，加鷹揚將軍。

魏書卷五十七高祐傳云：

> 渤海人也……司空允從祖弟也。祖展，慕容寶黃門侍郎……父讜，功拜游擊將軍。……子和璧……和璧子顥……出爲冀州別駕，未之仕，屬刺史元愉據州反，世宗遣尚書李平爲都督，率衆討之，平以顥彼州領袖，乃引爲錄事參軍，

仍領統軍，軍機取捨，多與參決，擒愉之後，別黨千餘人皆將伏法，顯以爲擁逼之徒，前許原免，宜爲表陳請，平從之。於是咸蒙全濟。

可見鄭羲及高祐二家族在原籍有雄厚的地方勢力。〔傳思益正史無傳，不可查〕。去宗主督護，立三長，對士族及其親黨皆有很大的影響。

自道武帝登國起，至孝文帝太和九年，恰恰實施一百年（西元386～485），宗主督護制在道武時開始實施幾約占北魏王朝的三分之二時間。

北魏百年統治，至孝文帝時王權又獲得進一步的擴張，除遷都漢化等政策外，實施三長制和均田制，對解散後部落、士族、地方豪族等，進一步縮小其社會勢力和經濟特權。實施三長制，由原先五十三十家爲一戶，變爲五家立一隣長，五隣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單戶則從私附地位變爲編戶地位，可減免豪族從中剝削，但是三長制和均田制實施後的士族與地方豪族，雖然受到了打擊，也祇是特權之受限制，對其本身宗黨所產生的地方勢力，並不減色，可由下列現象證明之。

其一：三長制仍以豪族爲長。魏書卷一一〇食貨志云：

（太和）十年，給事中李冲上言：宜準古，五家立一隣長，五隣立一里長，五里爲一黨長，長取鄉人彊謹者。

其二：均田制僅在公田上實施[1]，並非將全國公私土地一律均分，所以士族及地方豪族原有私產，仍然保留。

其三：奴婢受田數，北齊河清三年令（北魏記載不詳，僅以此推測）據隋書卷二十四食貨志載：

奴婢受田者，親王止三百人，嗣王止二百人，第二品嗣王已下及庶姓王止一百五十人，正三品以上及王宗止一百人，七品以上限止八十人，八品已下至庶人限止六十人。

「庶人」不知界限爲何？極可能指無品位的地方豪族。

本期自孝文帝太和九年至北魏分裂止，共五十年（西元485～534）。實施百官俸祿制、職官受田制、官品奴婢受田制、三長取鄉人彊謹制、公田均田制等，其目的是想將士族、地方豪族、平民，相對地、層次地套入其政治體系之中，增長其政治力與

1. 賀昌羣：「漢唐間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之研究」

控制力。因其制度本身仍然過於稀鬆，僅得到部份成功。但其精神却被宇文氏吸收。

（七） 府兵制度在政治力與社會勢力間之意義

北魏於公元534年分爲東西二部。西魏自始至終是宇文氏實際上掌握政權，六軍是其底班，六軍最遲在東西魏分裂時已有跡象，大統八年（公元 542）宇文泰正式制立，此一結合政、經、軍、社爲一體的組織，卽關中六柱國是也。宇文氏以關中一隅之地與東魏及南方抗衡，除其團結胡漢以外，還能善於吸收組合社會勢力，故能發揮出巨大力量。吸收社會勢力爲政權之一部，其他朝代亦行之，唯宇文氏不但積極，並且使其制度化，甚至成爲社會體系。在邙山之敗(大統九年，公元 543)以後，且已成爲基本政策。原來北方有鄉兵存在，這都是分散的力量，以士族及地方豪族爲頭目，以私兵、部曲和一些地方豪俠武士做骨幹的團體；或者以宗族、鄉黨再附以賓客、義從的團體。這是社會上潛在的武裝力量。宇文氏的召募政策，當然重視團體力量勝過個別豪俠、武士；重視大宗族勝過小宗族。例證如下：

例一，周書卷三十九韋瑱傳：

> 韋瑱，京兆杜陵人，世爲三輔著姓。……大統八年，齊神武侵汾絳，瑱從太祖禦之。……頃之，徵拜鴻臚卿，以望族兼領鄉兵，加帥都督，遷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行京兆郡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例二，周書卷三十二柳敏傳：

> 柳敏，河東解縣人，晉太常純之七世孫也；父懿，魏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汾州刺史。……(敏)累遷河東丞，朝議以敏之本邑，故有此授，敏雖統御鄉里，而處物平允，甚得時譽。及文帝克復河東，見而器異之……遷禮部郎中，封武城縣子，加帥都督，領本鄉兵，俄進大都督……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除河東郡守……進位大將軍。

例三，周書卷三十七郭彥傳：

> 郭彥，太原陽曲人也，其先從宦關右，遂居馮翊。……大統十二年，初選當州首望，統領鄉兵，除帥都督……進大都督，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例四，周書卷二十三蘇綽傳附弟椿傳：

蘇椿，武功人……關右賊亂，椿應募討之……加都督……大統四年，改授西夏州長史，除帥都督……十四年，置當州鄉帥，自非鄉望，允當衆心，不得預焉，乃令驛追椿領鄉兵……加大都督……尋授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

例五，周書卷三十三王悅傳：

王悅，京兆藍田人也，少有氣幹，爲州里所稱……太祖初定關隴，悅率募鄉里從軍，屢有戰功……侯景攻圍洛陽，太祖赴援，悅又獲鄉里千餘人從軍……大統十四年，授雍州大中正，帥都督，加衞將軍右光祿大夫都督……尋拜京兆郡守加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

例六，周書卷三十六司馬裔傳：

司馬裔，河內溫人也……及魏孝武西遷，裔時在鄴，潛歸鄉里，志在立功。大統三年，大軍復弘農，乃于溫城起義……八年率其義衆入朝，太祖嘉之，特蒙賞勞。頃之，河內有四千餘家歸附，並裔之鄉舊，乃授前將軍太中大夫領河內郡守，令安集流民，十三年，加都督……十五年，太祖令山東立義諸將等能率衆入關者，並加重賞，裔領千室先至……授帥都督加授撫軍將軍大都督……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例七，周書卷三十六令狐整傳：

令狐整，燉煌人也……世爲西土冠冕……魏孝武西遷，河右擾亂。(元)榮仗整附扞，州境獲寧……太祖嘉其忠節。表爲都督……遂立爲瓜州義首，仍除持節撫軍將軍通直騎散常侍大都督……整以國難未寧，常願舉宗效力，遂率鄉親二千餘人入朝，隨軍征討……還使持節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尋除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天和六年，進位大將軍。

例八，隋書卷七十四酷吏列傳田式傳：

田式，馮翊下邽人也。祖安興，父長樂，仕魏俱爲本郡太守，周明帝時，年十八。授都督，領鄉兵。

按宇文氏的府兵制度體系如下：

六柱國	六軍	正九命
↓		
十二大將軍	十二軍	正九命
↓		
二十四開府將軍	二十四軍	九命
↓		
若干儀同將軍	若干團	九命
↓		
若干大都督	若干團	八命
↓		
若干帥都督	若干旅	正七命
↓		
若干都督	若干隊	七命

據上列諸例，與宇文氏府兵制度作一對照，例一「三輔著姓」京兆杜陵韋氏，例二河東解縣柳氏，例三「當州首望」太原陽曲郭氏等，皆以族望領鄉兵，拜以帥都督，進入府兵體系，循大都督、儀同將軍、開府將軍、大將軍升遷。而例四武功蘇氏、例七敦煌令狐氏、例八馮翊下邽田氏等，亦以鄉望領鄉兵拜以都督，居帥都督之下。例五京兆藍田王氏，初任帥都督，加升都督，依制度而言，恐是史書筆誤倒置。河內溫人司馬氏是晉帝室後裔，恐爲其一支。綜上而論，大體上按照族望高下、鄉兵强弱爲評定都督、帥都督官職，州郡級的士族委以高一級的帥都督，地方豪族則授以都督。此卽北史卷九周本紀謂：

帝以邙山諸將失律，上表自貶，魏帝不許，于是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

是故府兵制度是將州郡士族、地方豪族、民間富室，相對地、層次地納入制度之中，使地方力量中央化。

（八） 隋

隋朝統一中國，府兵仍然是承襲北魏北周系統的國家支柱，祇是漸漸減退鄉兵色彩而增加中央化的濃度[1]。 隋政權本不應如此速亡，但其屢舉兵役、大興土木，業已超過農業社會生產力的負荷，挺而走險者日衆，遂授予各方擁有社會勢力者良機。按陳寅恪“論隋末唐初所謂「山東豪傑」”文中看法，「當時中國武力集團最重要者，爲關隴六鎭及山東豪傑兩系統，而太宗與（徐）世勣二人卽可視爲其代表人也。世勣地位之重要實因其爲山東豪傑領袖之故，太宗爲身後之計欲平衡關隴山東兩大武力集團之力量，以鞏固其皇阼，是以委以長孫無忌及世勣輔佐柔懦之高宗，其用心可謂深

1. 谷霽光：「府兵制度考釋」

遠矣！後來高宗欲立武曌爲后，當日山東出身之朝臣皆贊助其事，而關隴集團代表之長孫無忌及其附屬系統之褚遂良等則竭力諫阻，高宗當日欲立武氏爲后，以元舅大臣之故有所顧慮而不敢行，惟有取決於其他別一集團之代表人卽世勣之一言，而世勣竟以武氏爲山東人而贊成其事，（見冊府元龜叁叁陸宰輔部依違門）。論史者往往以此爲世勣個人道德之汚點，殊不知其社會集團之關係有以致之也。又唐書以李靖李勣同傳，後世亦以二李並稱，此就二公俱爲唐代之名將而言耳，其實靖爲韓擒虎之甥屬於關隴府兵集團，而世勣則是山東豪傑領袖，其社會背景廻然不同，故二人在政治上之地位亦互異，斯亦治唐史者所不可不注意及之者也。史復言世勣家多僮僕，積粟常數千鐘，當是與翟讓張亮同從事農業，而豪富遠過之者，卽所謂大地主之流也，此點亦殊重要。」

（九） 唐

李淵在隋末「自衞尉卿轉右驍衞將軍，奉詔爲太原道安撫大使，郡文武官治能不稱職者，並委帝（李淵）黜陟選補焉。河東已來兵馬仍令帝（李淵）徵發，討捕所部盜賊」，[1] 太原是唐的發跡之地，乘天下大亂，肅清太原附近，下西河，破宋老生精兵二萬於霍邑，圍河東，渡河，直撲關中，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二謂：

> 庚申，率諸軍以次而渡。甲子舍于朝邑長春宮，三秦士庶衣冠子弟郡縣長吏豪族弟兄老幼，相携來者如市。帝（李淵）皆引見親勞問，仍節級授官。敎曰：義旗濟河，關中響應，轅門輻湊，赴者如歸，五陵豪傑，三輔冠蓋，公卿將相之緒餘，俠少良家之子弟，從吾投刺，咸畏後時，扼腕連鑣，爭求立效，縻之好爵，以永今朝。於是秦人大悅，更相語曰：眞吾主也，來何晚哉！咸願前距，以死自效。

次年（義寧二年）春正月，同書又云：

> 蜀漢及氐羌所在諸郡雄豪並守長等，奉帝書感悅，競遣子弟獻款，絡繹而至，所司報答，日有百餘，梁益之間，宴如也。

按大唐帝室與楊隋有姻親關係，[2] 同屬西魏北周八柱國之一，卽陳寅恪先生所謂

1. 溫大雅 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一。
2. 新唐書卷一高祖本紀（舊唐書卷一同）：「隋文帝獨孤皇后，高祖之從母也。是故文帝與高祖相親愛」。

「關中」集團是也。故當隋煬帝被弒於江都，天下紛亂，羣雄並起，李淵所領導的這股勢力，在未克屆突通之前，就渡河至關中，一方面是戰略上之成功[1]，另一方面亦由於李氏本屬關中集團，較易獲得三秦人物支持。由上文而觀之，果然順利地擁有關中。及李世民破薛舉於隴西，李淵集團已獲得故秦之地。李唐東向平定天下與嬴秦幷吞六國有相似之處，而其能順利完成，與李世民能降服另一系勢力「山東豪傑」有重要的關係。然而，關中仍爲其根基，唐初仍圖以府兵制度的精神，結合地方力量，以爲其政權之基礎，新唐書卷五十兵志謂：「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興因之」。除唐高祖武德六年一度停廢以外，府兵大體因隋制。同書同卷稱：「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衞」。[2] 又唐六典諸衞卷二十四載諸衞統折衝府之驍騎。這種制度寓兵於農，使耕戰合體，而地方的軍事訓練與徵調又與中央十六衞有嚴密的關連[3]。

據谷霽光考釋，唐十道折衝府數分配爲：

	關內	河東	河南	河北	隴右	山南	劍南	淮南	嶺南	江南	合計
軍府數	288	164	74	46	37	14	13	10	6	5	657
占軍府總數的百分比	43.9	24.9	11.2	7.0	5.6	2.1	2.0	1.5	0.9	0.8	100.0

唐的基業以河東、關中、隴右爲主，這個區域亦正是當年宇文氏建立府兵時之轄區，關中本位政策之原始地。唐在這三道的軍府數爲四百八十九個，占軍府總數的百分之七十四點四。輕重之勢，頗爲明顯。李唐以關中河東爲基業，在形勢上與嬴秦有類似之處，但李唐對山東之關係，遠沒有嬴秦對六國那樣惡劣。六國本有社稷，經過長期戰爭與對抗以後，秦卒滅六國而統一天下，六國貴族與遺民一直努力反秦。隋末山東人物與關中人物雖然不屬同一集團，但亦沒有深仇大恨。何況唐代統一後不久，

1. 新唐書卷八十八裴寂傳（舊唐書卷五十七同）：「至河東，屆突通未下，而三輔豪傑多歸者，唐公欲先取京師，恐通掎其後，猶豫未決。寂說曰：今通據蒲關，未下而西，我腹背受敵，敗之符也，不若破通而後趨京師。秦王（李世民）曰：不然，兵尚權，權利於速，今乘機度河以奪其心，且關中羣盜處處屯結，疑力相仗，易以招懷，撫而有之，衆附兵强，何向不克……唐公兩從之，留兵圍蒲，而遣秦王入關」。
2. 有關折衝府之總數，各種記載不一。其增減可能因時而有小異。
3. 陶希聖「中國政治制度史」第四册隋唐五代，頁246語。

較與山東豪傑有來往的李世民取得政權[1]，除河北地區[2]以外關中與山東人物有某些程度的調和[3]。

一個大帝國的創業，固先由某一地區或某一階層人作其基業；但帝國的發展與穩定，則應超脫地域利益與階級利益，方能克其功。故當軍事停息之際，也是統治階級努力尋覓社會基礎，穩固其政權之時。「貞觀政要」中記述唐太宗融合以前敵對人物，接納雅言，以及想以科舉盡納天下英雄於其彀中的看法與作法，正是克己私慾而爲其政權長遠打算之計。武則天爲了把持政局建立武周，以科舉和薦辟方式大量吸引非關中集團人物，實際上已有意無意地擴大了社會基礎，科舉和薦辟方式所吸引的人物，理論上包括社會上各階層人物，實際上則仍以士族爲多[4]。故武則天當政時期，於其說其政權基礎平民化，毋寧說地域的普遍化。武氏在實施的時候常令所謂酷吏對唐功臣集團加以整肅，關中集團人物被貶退者很多，但並非關中集團勢力都被鏟除[5]，而是使其失去絕對優勢，或許是下降到其應有的比例上。

府兵制度到唐玄宗時漸漸鬆弛而被破壞，其原因甚多[6]，要研究府兵的徭役與一般人民的徭役之比較、及府兵制有密切關係的均田制之存廢，才能得其實況，就以鄴侯家乘所敍述的府兵義務而言，在唐玄宗承平之世，恐怕不足以吸引府兵久任。再者，一個大帝國最高的政治統治者的保位，掌握京師爲其重點，政變發動之時，皇宮禁城是決勝負之地，禁軍最爲重要[7]。所以玄宗天寶年間以彍騎取代府兵，彍騎乃十二萬常備的宿衞精兵，其戰鬪力必較府兵爲强，在純政治觀念而言，極易理解，但這項改變已飛越府兵制度連繫中央政權與地方勢力結合的原則，中央宿衞遂成爲皇帝政治力的赤裸裸爪牙。然而大唐帝國，疆土遼濶，自西北迄東北，時有烽火，在府兵時

1. 參見李樹桐“初唐帝室間相互關係的演變”載於「唐史考辨」。
2. 參見谷霽光“安史亂前之河北道”燕京學報卷19.
3. 參見布目潮渢“唐初の貴族”載於「隋唐史研究」。
4. 參見本文第二篇中古統治階層社會成分統計表。
5. 參見章羣「唐史」頁44之分析。
6. 王壽南「唐代藩鎮與中央關係之研究」頁105，謂府兵之制破壞的原因主要有三：一、均田制度之破壞。二、府兵之懼久戍遠征。三、府兵在社會上地位之低落。及陶希聖「中國政治制度史」謂當時客觀的環境逐漸使府兵制度趨於壞敗。第一是當時的交通條件不够，各地府兵番上宿衞既疲於勞役而不能按時；第二是普遍的府兵訓練，强壯與羸弱同流，兵多而不精；第三開元以後，國家承平既久，軍事訓練廢弛。
7.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頁44。謂：「自高祖太宗至中宗玄宗，中央政治革命凡四次，俱以玄武門之得失及屯衞北門禁軍之向背爲成敗之關鍵」。

期尙且徵用蕃兵蕃將，驍騎集聚中央，去府兵猶如東漢光武去州郡都尉，故唐室有不得已而重用蕃人之苦衷[1]，種下了日後藩鎭之亂的遠因。

府兵廢弛之後有驍騎、禁軍，唐皇室並非僅以此赤裸裸權力維持其政權。唐政權在其他方面的社會基礎尙稱成功。從武后玄宗以來，它的官僚體系之中實已吸收了各地域的社會人物。士族（包括魏晉舊族與唐代新族）仍然是當時社會中的優勝者[2]，雖然士族在軍事方面的參與，已日益減退；地區性的功能也漸趨疏遠，但在其他方面的功能，仍然存在。這些功能透過唐代官僚體系表現出來，兩者相形得彰，這是中央政權與社會勢力結合的另一形態。唐代統治階層仍以士族爲主體，但士族的性質不斷地轉變，轉變後的優點與缺點又反映在以此爲基礎的政權上。安史之亂，叛軍長驅直入，不旋踵而下兩京。肅宗在靈武興兵，也可以看出西北仍有唐室的傳統勢力。安史雖亡，自此以後，河北成爲半獨立狀態，這一地區的節度使隨時向唐室加壓力，唐室大致守住自西北至東南的一條防線上，東南的財力與西北的軍力維持了剩餘的一百餘年。運河[3]、藍田武閱道[4]的暢通，成爲安危之所繫，漕運與理財成爲中晚唐宰輔大臣之特色。均田似乎是行在北方公田上的土地制度[5]，以均田制爲基礎的租調庸賦稅制度，自均田破壞、北土殘破以後，實際上在安史亂後已無法實施，在客觀的現象改變以後，兩稅法繼之而起[6]。在土地不平均的狀態之下，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7]爲本的稅法，更能有效地抽取物力財力。又「其見任官一品至於九品，同上上至下下戶等級之數，並寄住寄莊，及前資勳蔭寄住家，一切並稅」[8]，通典作者杜佑評爲「蓋近如晉宋土斷之類也」。這顯然是指「安史亂起中原士族衣冠及各地難民，羣起浮盪，大部份到江南方面，僑居各地」[9]而言。人口比重的趨勢，若以淮河秦嶺爲南北界線，在隋代南北之比爲15:85，至安史亂前爲35:65，[10]安史亂起，河北藩鎭割據，百姓南

1. 參見王壽南「唐代藩鎭與中央關係之研究」頁316，唐之重用蕃將條。
2. 參見第二篇中古統治階層社會成分統計表，唐代部份。
3. 參見全漢昇「唐宋帝國與運河」。
4. 參見嚴耕望"唐藍田武關道驛程考"。史語所集刊第39本下册，1969。
5. 賀昌羣「漢唐間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之研究」。
6. 參見楊聯陞"中唐以後稅制與南朝稅制之關係"清華學報12-3。
7. 參見新唐書卷五十二食貨志。或唐會要卷八十三租稅上、新唐書卷一四五（舊唐書卷一一八）楊炎傳。
8. 通典卷六賦稅下。
9. 鞠清遠「唐代財政史」頁224。
10. 人口統計之可信性，向爲國史中最受懷疑的一部份，本數字參考 E. G. Pulleyblank: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pp. 172-174.

遷，會昌年間杜牧曾謂「三吳者國用半在焉」[1]，整個南方比重可見而知。江淮等地既是中央經濟命脈，故中晚唐江淮藩鎮之選任，非常愼重，大都是忠心於唐室的高級中央官派任之[2]，唐之中晚期似乎比東晉南朝更直接地抽取百姓的財力，並有效地予以輸送。唐增添其他稅項，以減緩土地稅的壓力，並彌補北方若干地區失御的財政損失[3]，是一種比較進步的政策。

在這種情況之下，唐對江淮地區也做一些水利工程建設[4]，但吾人看不出有任何大規模有系統的建樹，充其量祇是當經濟由北向南遷轉[5]時，扮演先驅角色，下開五代十國之吳越[6]及宋代有系統發展水利系統之始。隴右涼州之地，晚唐一直受吐蕃的壓迫與侵犯，在張義潮最後廻光反照之後，大至已非唐的勢力範圍。南方經黃巢之動亂，已非昔比。經過人力物力之損耗，唐帝國已失其根本。唐在吸收社會領袖時，有其成功的一面，但社會領袖的性質漸漸改變，原本居於皇帝與百姓之間的地位，移近政治中心的那一端，本文第四篇另有分析。均田制之破壞，兩稅法之實施，都意味出土地平均精神之消失，土地兼並愈來愈烈，莊園出現後的社會問題，政治與社會領袖無法解決。晚唐南方的社會動亂，以及北方强鎮、五代十國之赤裸權力，都顯示出政權與社會基礎脫節，新王朝新政權的穩定，要尋找新的社會基礎和接合型態。

---

1. 杜牧樊川集14。
2. 參見王壽南「唐代藩鎮與中央關係之研究」頁273。
3. 參見 D.C. Twitchett: 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T'ang Dynas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 23語，及其後各章文。
   又鞠清遠「唐代財政史」第三章至第五章文。
4. 如全唐文卷五六六韓愈撰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在南昌「灌陂塘五百九十八，得田萬二千頃。」又全唐文卷五二九顧況撰湖州刺史廳壁記于頔「作塘貯水，溉田三千頃」。又册府元龜卷六七三牧守部，孟簡爲常州刺史「開古孟瀆，長四十一里，得沃壤四千餘頃」。又册府元龜卷六七八牧守部，李德裕引高郵縣築堤爲塘「溉田數千頃」。又唐會要卷八十九，疏鑿利人條，嗣曹王皐爲荆南節度使「修湜得良田五千頃，畝收一鐘」。
5. 嚴耕望「中國歷史地理」唐代篇，農林，頁21。「就興建次第而言，北方工程幾皆天寶以前所興建，長江以北者亦前期爲多，江南東道則中葉興建者爲多，而江南西道則盡中葉之工程矣！」
   及鄒逸麟"從唐代水利建設看與當時社會經濟有關的兩個問題"文中之水利建設

時期＼道	關內	河南	河東	河北	隴右	山南	淮南	江南	劍南	嶺南	合計
安史亂前	11	20	16	54	1	5	4	22	27	3	163
安史亂後	13	7	2	3	1	6	13	49	4	3	101

6. 參見繆啓愉"吳越錢氏在太湖地區的圩田制度和水利系統"農史研究集刊第2册。

第二篇　中古統治階層之社會成分

(一) 分　　類

我國中古社會具有濃厚的階級性，階級社會所呈現的現象顯著地反映在政治人物上，歷來治中古社會政治史者皆有此共同認識。中古階級社會是以家族爲座標之單位，依其家族地位聲望之高低而決定其社會階層之層次，皇室當然是全國最華貴的家族，累世有三公九卿之族，乃是僅次於皇室而高居社會階層之頂層者，官大及系長是一個家族建立其政治社會地位的有形標準，因此在社會階層高低層次面的一系列刻度上，我們可以塡入許許多多家族。垂直分類是必要的，其原因有二。其一：一項科學化的研究，若從其全面整體或外在觀察，不如先予解剖分段而從內在分析着手，然後再合而觀其全貌。分類是分析的標準與起點，可增强觀察力的明銳，使研究更加便利。其二：一個較大的家族與一個較小的家族就其性質而言，皆居於社會階層的水平面之上，但對政治社會的影響力而言，不能等量齊觀，其間自有輕重程度之分，而有分類必要。在社會階層的一系列層次面上，把它切爲一層一層是困難的，問題是在所定的標準爲何？從何處作爲分類的分野？歷來中外學者研究中國社會史者，亦作過這一方面的努力。新唐書卷一九九柳芳將魏晉以來的大族分爲四類，卽：山東郡姓，關中郡姓，東南吳姓，代北虜姓。凡二十六族。柳芳是唐代人，以研究譜學聞於世，其所記載的大族可信性極高，被後人視爲寶貴資料，然當時的階級社會，自大族以次於平民寒素，尙有千百家族，此點柳芳亦極瞭解，其所舉二十餘族，乃階級社會中之頂層大族，而所列四類亦屬地理分類，實屬同一層次；如以此頂層人物與平民寒素相對，似爲二分法的分類，既非當時社會實情，亦非柳芳本意。若爲了强調某一角度或某一層次之特性，而以二分法作爲强烈對比，猶有可說，例如前輩陳寅恪先生[1] 錢穆先生[2] 强調大士族的學業品德家學家風；宮川尙志[3] 以寒門、寒人爲着眼點，以大族作爲對照；唐長孺[4] 致力於門閥形成與衰落；井上晃[5] 之考定姓族；王伊同先生[6] 對大族譜譜

1.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2. 錢穆"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係"新亞學報5卷2期。
3. 宮川尙志"魏晉南朝の寒門寒人"刊於「六朝史研究」
4. 唐長孺"門閥的形成及其衰落"
5. 井上晃"後魏姓族分定考"
6. 王伊同「五朝門第」金　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叢刊乙種。

之貢獻等。再如 Eberhard Wolfram氏[1] 列述拓拔魏一百個家族，但似未作垂直之分類。宮崎市定[2] 曾對魏晉南北朝士庶作一分界線變遷表，以官品爲標準；全書最大的貢獻在於分析門第與官職之關係上。另一位日本學者矢野主稅[3] 亦以官職作爲族望高下的標竿。日人越智重明[4] 着力於下級官僚之研究，因此他不但重視「門地二品」大士族，且在士族以下分類較詳，分爲甲族、次門、後門、三五門，似乎是四分法。何啓民[5] 的標準重視門第民間的聲望，如吳郡朱氏雖官宦不多，不減其社會地位。David Johnson[6] 認爲法律上的地位、權利、義務、戶籍等，是「士」的重要標準，這當然受日人仁井田陞[7] 諸輩之影響。又如其論點不屬本期範圍之內，但事涉中國社會史分類之名著，關於漢朝者如楊聯陞先生[8] 東漢的豪族泛指外戚、宦官、清流與濁流。瞿同祖先生[9] 所謂漢代大族 (Powerful families) 是指六國舊貴族後裔、漢朝皇室及王侯、外戚、二千石官吏、富商、游俠等；余英時先生[10] 是指南陽一帶大地主及東漢以來單士與家族結合而成的士族；許師倬雲[11] 指出春秋戰國時士與公子階層，同時在漢末三國時有地方勢力——地方豪强。凡此種種皆與本文凝定分類標準有重大影響。至於明清之際社會史方面的學者，有張仲禮[12]、何炳棣[13]大抵以科舉名位作爲重要標準，而 Gentry 一詞常被借用；費孝通[14] 亦是此中翹楚，然費氏將 Gentry 概括自秦漢以

1. Wolfram Eberhard: Das Toba-Reich Nordchinas. Leiden 1946.
2. 宮崎市定「九品官人法の研究」東洋史研究叢刊之一，1956。
3. 矢野主稅 "魏晉中正の性格についての一考察" 史學雜誌72-3。
4. 越智重明 "魏晉南朝の最下級官僚層について" 史學雜誌74-7 "梁の天監の改革と次門層" 史學研究卷 97
5. 何啓民 "中古南方門第——吳郡朱張顧陸四姓之比較研究"
6. David Johnson "The Medieval Oligarchy: A study of Great Families in their Social, Political & Institutional setting" p.p. 49. Chapter 3. Shih status: Legal Aspect. 博士論文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70.
7. 仁井田陞「中國法制史研究」1962.
   增村宏 "黃白籍の新研究" 東洋史研究 2-4。
8. 楊聯陞 "東漢的豪族" 清華學報11卷4期
9. Chu, T'ung-tsu: Han Social structure. Chapter Five. Powerful families p.p. 160.
10. 余英時 "東漢政權建立與士族之關係" 新亞學報1卷2期 "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 新亞學報4卷1期。
11. Hsu, Cho-yun: 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An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
    許倬雲 "三國吳地的地方勢力" 史語所集刊第37本上册，1967。
12. Chang, Chung-li: The Chinese Gentry: 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th-century Chinese society.
13. Ho, Ping-ti: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4. Fei, Hsiao-t'ung "Peasantry & Gentry: An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social Structure & its Changes"

來中國士大夫階層[1]，與白樂日 (Etienne Balazs,)[2] 將中國二千年來社會看作一樣，乃忽略了時代特點，不能被視爲精確的分類法。

十年以前，當著者遍閱中古各朝正史時，發現史家對於這個時期官吏出身背景之社會成分記載頗詳，遂嘗試以較精確的方法來衡度統治階層，當時所採用的方法是以魏書卷一一三官氏志中所載之標準。凡稱士族需合於二大條件，其一：累官三世以上。其二：任官需達五品以上者。這二個條件完全符合官氏志中所謂膏粱、華腴、甲、乙、丙、丁姓的標準。蓋因北魏統治北中國以後，採與漢人合作之策，亦希望將其官吏酋豪套入中國社會架構中，此項法令之正式公布，當亦參照當時漢人社會無疑，故三世及五品兩個條件可能與當時漢社會相去不遠。用此項標準試用於兩晉南北朝各代[3]，使階級社會有着明確的百分比，而所得之大士族又與柳芳所言大體相同，證明了此項標準與當時社會實情差距不大。然而，社會階級之分類，究非如此簡易之法所能含蓋，在撰寫「兩晉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時，發現吳郡朱氏竟然任官者甚少，而朱氏在許多記載中似乎是吳姓「朱、張、顧、陸」四姓之首，這是柳芳所列姓望與著者統計所得之間的唯一例外，於是乎著者在撰寫博士論文「唐代統治階層社會變動」時，在分類項下除仍採用三世爲官、五品以上的標準以外，還添加凡史書皆稱大族者，雖任官次數甚少，亦屬士族範圍。以法律地位爲標準評定士族，是以現代標準衡量中古社會，有關「士」之特權之記載，魏晉南北朝時史資料記載不多，在這些片斷的行文中，是因爲官宦的因素，抑或是家族地位之因素，一直是糾纏不清的問題。同時也牽連到政治性的運用與習慣法等在中古是否是法律等問題，況且隋唐時期，唐律中並無階級社會之記載，然這也無法抹去唐代濃厚士族社會的色彩。在魏晉南北朝時，常有大士族稱次級大士族爲寒族、寒門[4]，這是相對的稱呼，其實次級大士族也是士族，同理一個次級大士級亦會稱初次形成的士族(三世爲官，任官五品)爲寒門。而實際上若將初次形成的士族與寒素及地方豪族、小姓等作一對照，其政治社會之影響力當列士族無疑。故本文士族之定義，包含柳芳所說的郡姓、虜姓、吳姓；亦包括正史中所提及的大族；還包括一切三世爲官、任官五品的家族，其中有唐代新族；列

1. Fei, Hsiao-t'ung: China's Gentry; Chapter I. The Gentry & The Imperial Power p.p. 17.
2. Etienne Balazs: Chinese Civilization & Bureaucracy
3. 參見拙著「兩晉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出版委員會。
4. 參見拙著「兩晉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

朝皇室亦包含在內。是廣義的士族。

寒素類指素士、農、工、商、兵、其他半自由民，及非自由民如奴婢、門客等。寒素類中有平行的職業分類，上下層次的非自由民，本身可再予細分，亦可深入研究，本文將他們歸爲一類，是因爲他們的祖父輩皆無參與統治階層的跡象。

在士族與寒素之間，本文列小姓類。這類人物之存在，可見於華陽國志中各縣的大姓、豪富；永嘉亂後北方的塢堡[1]；梁末侯景之亂時的縣姓、地方酋豪、洞主[2]；隋末所謂「山東豪傑」[3]；以及唐代前後期氏族譜殘卷中千百計的郡縣大姓[4]。拙文"從中正評品與官職之關係論魏晉南朝之社會架構"更具體指出三個層次的社會架構。小姓是一個複雜的層次，它的名稱也最多，包括縣姓、地方豪族、酋豪、部落酋長、洞主、累世低品、累世校尉、或曾有一世五品以上等家族。

（二）分　　期

爲研究動態變化的痕跡，本文分期以「代」（Generation）爲單位，每代通常是以二十五至三十年計，但研究中國歷史，需配合皇帝的更換與朝代的變動，因爲每個皇帝的更換與朝代的變動常常引起內外大臣的更易，故略微依據朝代與建元要比硬性規定以一定的年代斷代（Generation）較爲實際。從比較觀察的立場而言，又希望分期後的每期都大致能自成單元，或在某事上有若干特色，自東漢獻帝建安元年始至唐昭宗天祐三年止，凡得七百十一年（即196～906 A.D.）。其所以取這段時期作爲研究範圍是因爲漢末與唐亡是中古階級社會架構的起點與落點（見下文）。以下且劃分各期年代，並略述各期之特有內容。

第一期。公元196～219年。漢獻帝建安24年。凡24年。在政局方面，自董卓被召入中原，宦官雖除而天下自此分裂。建安年間，代表着曹操竊奪朝政，也意味着三國鼎立的開始。從社會角度看，這是大族出任政治角色的上坡點。

第二期。公元220～239年。曹魏文帝黃初7年。明帝太和6年，青龍4年，景初3年。共二十年。曹魏王朝正式建立，三國分治，魏文帝及明帝時期，曹氏仍能掌握政權，司馬氏雖漸次得勢，但未能危及朝基。黃初初年吏部尚書陳羣建議行九

1. 金發根「永嘉亂後北方的豪族」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出版委員會。
2. 拙著"五朝軍權轉移及其對政局之影響"清華學報新八卷一、二合期。
3. 陳寅恪"論隋末唐初所謂「山東豪傑」"
4. 拙著"敦煌唐代氏族譜殘卷之商榷"史語所集刊第43本第二分，1971。

品官人法取士，其結果加速門第社會的發展。

第三期。公元240～264年。曹魏齊王芳正始9年，嘉平6年。高貴鄉公髦正元1年，甘露4年。常道鄉公奐景元4年，咸熙1年。共25年。司馬氏積極擴張勢力，正始十年卽嘉平元年曹爽被殺是司馬氏權力穩固的轉捩點。

第四期。公元265～289年。西晉武帝太始10年，咸寧5年，太康10年，共計25年。本期內中國又歸統一，而社會方面是因襲的，門第社會至此漸次發展成熟，若干大族均已顯示出其鞏固的政治社會地位。

第五期。公元290～316年。西晉惠帝永熙1年，元康9年，永康1年，永寧1年，泰安2年，永興2年，光熙1年。懷帝永嘉6年。愍帝建興4年。共27年。中央有賈后專政、八王之亂，旋卽引起永嘉之亂，外族侵入，中原失御，這是一個極大的轉變時期，無論在政治上社會上經濟上都可作爲一個單位研究。

第六期。公元317～344年。東晉建武1年，大興4年，永昌1年。明帝太寧3年。成帝咸和9年，咸康8年，康帝建元2年。共28年。在王氏的扶助下，晉元帝據有南中國，在這個時期中，瑯琊王氏及潁川庾氏等相繼把握朝政。

第七期。公元345～370年。東晉穆帝永和12年，升平5年。哀帝隆和1年，興寧3年。帝奕太和5年。共26年。桓溫與殷浩兩家族執本期政治之牛耳，桓溫曾北伐至洛陽，幾乎篡代晉室。

第八期。西元371～396年。東晉簡文帝咸安2年。孝武帝寧康3年，太元21年。共26年。桓氏仍是重要家族之一，謝氏挾其淝水戰功極爲强盛。苻堅淝水之敗使北中國再度陷入紛爭局面。

第九期。公元397～419年。東晉安帝隆安5年。元興3年。義熙14年。恭帝元熙1年。共23年：本期之初桓玄擁有南朝三分之二的土地，最後實行篡代，爲新興勢力劉裕所敗，又有孫恩盧循事件，皆爲劉裕所破，强人劉裕終於取晉自代。

第十期。公元420～453年。宋武帝永初3年。廢帝景平1年。文帝元嘉30年。共有34年。宋文帝當政凡30年，是東晉南朝政治較上軌道的時期，史稱元嘉之治。同時拓拔氏亦統一北中國，史稱北魏，南北朝開始。

第十一期。公元454～478年。宋孝武帝孝建3年，大明8年。明帝彧泰始7年，泰豫

一年。廢帝昱4年。順帝昇明2年。共25年。這個時期是劉宋衰弱時代，政潮、廢立屢起，强人蕭道成乘機而起，取代劉宋。宋亡。

第十二期。公元479～501年。南齊高祖建元4年。武帝永明11年。明帝建武4年，永泰1年。東昏侯永元2年。和帝中興1年。共23年。整個南齊一朝合爲一期。這期，武帝有承明之治，明帝以後濫殺傾軋，强人蕭衍取南齊而代之。南齊亡。

第十三期。公元502～528年。梁武帝天監18年，普通7年，大通2年，共27年。南北屢有交戰，梁制定新官品十八班制，佛教大盛於南方，昭明太子文學傳世。

第十四期。公元529～556年。梁武帝中大通6年，大同11年，中大同1年，太清3年。簡文帝天寶2年。元帝承聖3年、敬帝紹泰1年、太平1年。共28年。梁共享國凡五十五年，而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故梁武是兩期的當政者，前期（卽第十三期）雖有對外戰事，大致太平，第十四期發生侯景之亂，使梁室傾覆，同時對於自東晉以還的南朝社會階層，有某些程度的變化。强人陳霸先平亂自立。梁亡。

第十五期。公元557～589年。陳武帝永定3年。文帝天嘉6年，天康1年。臨海王伯宗光大2年。宣帝太建14年。後主叔寶至德4年，禎明2年。共32年。有陳一朝皆合爲第十五期，這是東晉南朝系統的最後一期，國勢及疆域已無法與東晉劉宋時相比。

※　　※　　※

依相對的時間順序及政治社會的特定事件，北朝亦可劃分爲若干時期。

〔第八期〕。公元386～408年。北魏太祖道武帝登國10年，皇始2年，天興6年，天賜5年。共23年。北方自永嘉之亂以後，先後有五胡十六國。戰亂不已。道武帝時，拓拔氏已顯示出其强大力量，且有統一中原的趨向，但必竟是一個草創時期。

〔第九期〕。公元409～431年。北魏太宗明元帝永興5年，神瑞2年，泰常8年。世祖太武帝始光4年，神䴥4年。共23年。拓拔氏繼續擴張，驅柔然、降丁零、高車，滅勅勒，神䴥四年又廣徵漢大族參政，南北對峙形勢初成。

〔第十期〕。公元432～451年。北魏世祖太武帝延和3年，太延5年，太平眞君12年，正平2年。共有22年。伐鄯善，通西域。李寶來朝，降遼西，大體上統一了中原，政治上開始大量吸收漢人參與統治，社會上承繼西晉以來的門第社會。

〔第十一期〕。公元452～476年。北魏高宗文成皇帝興安2年，興光1年，太安5年，和平6年。顯祖獻文帝天安1年，皇興4年。高祖孝文帝延興5年，承明1年。共有25年。佛教大盛，魏宋時戰時和。

〔第十二期〕。公元477～499年。北魏高祖孝文帝太和23年。孝文當政，遷都洛陽，議定律令、班祿之制，定姓氏，大力推行漢化政策。

〔第十三期〕。公元500～530年。北魏世宗宣武帝景明4年，正始4年，永平4年，延昌4年，肅宗孝明帝熙平2年，神龜2年，正光5年，孝昌3年，敬宗孝莊永安3年。共三十一年。北魏進入衰微時期，戰亂頻起，六鎮反叛，尤其爾朱氏之亂，朝士死亡甚多。

〔第十四期〕。公元534～577年。東魏孝靜帝善見天平4年，元象1年，興和4年，武定7年。東魏名義上仍屬於元氏，實際上高歡高洋相繼專政。北齊顯祖文皇帝高洋天保10年。廢帝濟南王殷乾明半年。肅宗孝昭帝皇建1年。世祖武成帝大寧1年，河清3年。後主溫公緯天統5年，武平6年，隆化1年。幼主恒承光1年。共計44年。

〔第十五期〕。公元532～580年。西魏孝武帝永熙3年。文帝大統17年。廢帝欽3年。恭帝3年。宇文泰專政西魏，實際上是北周的前身。大統九年，宇文有芒山之敗。北周閔帝宇文覺。世宗明帝武定2年，武成1年。高祖武帝保定5年，天和6年，建德6年。宣帝宣政1年。靜帝大象2年。共49年。建德6年，西周滅北齊。

第十六期，公元581～617年。隋文帝開皇20年，仁壽4年。煬帝大業13年。共計三十七年。開皇九年，隋滅陳，中國統一。大業二年，建進士科。

第十七期。西元618～649年。唐高祖武德9年。太宗貞觀23年，共32年。包括唐朝開國時期及貞觀之治。貞觀十三年頒氏族志。

第十八期。公元650～683年。唐高宗永徽6年，顯慶5年，龍朔3年，麟德2年，乾封2年，總章2年，咸亨4年，上元2年，儀鳳3年，調露1年，永隆1年，開輝1年，永淳1年，弘道1年。共34年。顯慶四年改訂氏族志爲姓氏錄。麟徵元年，高宗與武后同稱二聖這是唐朝國力極强盛時期，末期武則天已掌握了實際政權。

第十九期。公元684～709年。唐中宗哲嗣聖、睿宗旦文明、武太后光宅共1年，垂拱4年，永昌1年。周天授2年，如意1年，長壽1年，延載1年，天冊萬歲與萬

歲登封共1年，萬歲通天1年，神功1年，聖曆2年，久視1年，大足半年，長安4年。唐中宗神龍2年，景龍3年。共26年。本期中武則天從幕後到幕前，最後登上了皇位，中宗再登位亦列入本期，蓋其性質係武后之延長也。

第二十期。公元710～730年。睿宗景雲2年，太極1年。玄宗開元 1～18年。共計21年。本期係唐代另一個治世——開元之治。

第二十一期。公元731～755年。唐玄宗開元19～29年，天寶14載。共25年。開元二十四年李林甫爲相前半期是開元之治的延續，後半期天寶年間政治漸壞，安祿山之亂起。

第二十二期。公元756～779年。唐肅宗至德2載、乾元2年，上元2年，寶應1年。代宗廣德2年，永泰1年，大曆14年。共24年。本期安史之亂波及中國大部，戰亂不絕，本期末安史雖已消滅，藩鎭割據已有雛形。

第二十三期。公元780～805年。唐德宗建中4年，興元1年，貞元21年。共26年。藩鎭割據的局面已成，德宗僅能採取安撫政策，唐中央權力極爲薄弱，建中元年楊炎立兩稅法。

第二十四期。公元806～826年。唐順宗永貞半年。憲宗永和15年，穆宗長慶4年，敬宗寶曆2年。共21年。憲宗時期，唐中央與藩鎭展開力量的爭奪，本期是自安史亂後中央權力稍微復振的時期。但唐朋黨之爭發生。

第二十五期。公元827～846年。唐文宗太和9年，開成5年。武宗會昌6年。共20年。藩鎭割據復盛，朋黨之爭加劇，復有甘露之變，宦官實際影響唐中央政治，會昌5年武宗打擊佛寺。

第二十六期。公元847～873年。唐宣宗大中13年。懿宗咸通14年。共27年。牛李朋黨繼續傾軋，藩鎭割據蔓延，宦官操縱政治。咸通元年裘甫起於浙東，咸通十三年歸義侯張義潮率甘沙等州陷。

第二十七期。公元874～906年。唐僖宗乾符6年，廣明1年，中和4年，光啓3年，文德1年。昭宗龍紀1年，大順2年，景福2年，乾寧4年，光化3年，天復3年，天祐2年，共32年。乾符元年王仙芝、黃巢等起、光啓元年秦宗權兵熾，政治敗壞、藩鎭、宦官、朋黨爲害。朱全忠篡唐自代。唐亡。

（三） 中古統治階層社會成分統計表 （公元 197～906A.D.）

期別	朝代	公元	士族			小姓		寒素		合計
			No.	%		No.	%	No.	%	No.
1	漢	197～219	38	29.0		19	14.5	74	56.5	131
2	曹魏	220～239	60	38.7		38	24.7	57	36.8	155
3	曹魏	240～264	74	47.1		59	37.6	24	15.3	157
4	西晉	265～289	84	46.2		67	36.8	31	17.0	182
5	西晉	290～316	179	66.3		58	21.5	33	12.2	270
6	東晉	317～344	110	65.9		33	19.7	24	14.4	167
7	東晉	345～370	90	79.6		21	18.6	2	1.8	113
8	東晉	371～396	80	79.7		13	13.2	6	6.1	99
9	東晉	397～419	58	68.1		4	4.9	23	27.0	85
10	宋	420～453	153	72.0		38	18.0	21	10.0	212
11	宋	454～478	150	64.3		36	15.5	47	20.2	233
12	南齊	479～501	109	58.9		39	21.1	37	20.0	185
13	梁	502～528	85	52.5		32	20.0	44	27.5	161
14	梁	529～556	80	56.4		30	21.1	32	22.5	142
15	陳	557～589	86	56.7		39	25.6	27	17.7	152
(8)	北魏	386～408	14	31.2		20	44.4	11	24.4	45
(9)	北魏	409～431	33	36.7		37	41.1	20	22.2	90
(10)	北魏	432～451	92	63.0		40	27.3	14	9.7	146
(11)	北魏	452～476	146	73.0		26	13.0	28	14.0	200
(12)	北魏	477～499	244	77.5	（魏晉舊族%）↓	40	12.7	31	9.8	315
(13)	北魏	500～530	545	79.7		73	10.7	66	9.6	684
(14)	東魏北齊	534～577	163	55.6		65	25.3	49	19.1	257
(15)	西魏北周	532～580	329	69.3		55	11.7	90	19.0	474
16	隋	581～617	311	67.0		73	15.2	80	17.2	464
17	唐	618～649	219	64.8	61.5	21	6.2	98	29.0	338
18	唐	650～683	189	62.7	57.9	67	22.7	43	14.6	295
19	唐	684～709	231	63.3	51.5	41	11.2	93	25.5	365
20	唐	710～730	212	67.5	58.9	25	8.0	77	24.5	314
21	唐	731～755	199	70.6	63.0	34	12.1	49	17.3	282
22	唐	756～779	204	56.2	44.1	56	15.4	103	28.4	363
23	唐	780～805	215	60.4	45.5	52	14.6	89	25.0	356
24	唐	806～826	209	63.3	41.2	56	17.0	65	19.7	330
25	唐	827～846	237	75.5	57.6	40	13.1	37	11.4	314
26	唐	847～873	196	88.7	64.2	12	5.4	13	5.9	221
27	唐	874～906	126	65.3	39.2	10	5.2	57	29.5	193

（四）變動之分析

士族之變動

大家族的子弟累代官宦的現象，漢代已有。以大家族成爲政治社會中統治階層的骨幹，似乎是魏晉以來降至隋唐期間社會型態的特點。本章以量化證明之。從第三期開始統治階層中士族所占比例已近百分之五十。第三期正值曹魏的後半期，士族成分是百分之四十七點一。比第二期士族所占成分高出百分之九弱，而第二期又比第一期士族成分高出百分之九强。這前三期士族成分的梯升，值得重視，第一期是指漢末建安年間，政治社會紛亂，羣雄並起，山林水澤中的草莽英雄有較大的機會上升，然而許多主要的人物都是漢末的刺史太守或其他官吏，因此我們亦可從第一期的統計數字上同看東漢末年的政治社會，也就是說除去因戰亂政潮所引起的士族成分改變以外，東漢末年士族在整個統治階層中所占比例不會過高，因此從這一段時期作爲士族成爲統治階層架構中骨幹的起點。第一期士族占百分之二十九，第二期占百分之三十八點七，第三期占百分之四十七點一，這是很明顯的上坡面。從第三期至第二十七期，士族的比例雖時高時落，但一直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北魏初期例外。後文討論），因此第三期士族成分上升到接近百分之五十，是上坡線上的重要點，而第二期却是研究第三期成因的重要時期，第二期是曹魏的上半期，在這一期的初年亦卽黃初年間魏吏部尚書制定了九品官人法，許多研究九品官人法的學者認爲這是產生士族的最大原因，但是由於九品官人法以前士族已經出現社會中，九品官人法產生士族之說不能解釋這種現象。然而由於第二期初期採行九品官人法以後，自第三期以後士族卽占百分之五十以上而不墜這點來看，九品官人法與士族盛行顯然其間有若干因果關係，關於這一點拙著「兩晉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中曾有兩章討論之。

司馬氏之篡魏乃積三代之功，自第二期中司馬懿誅曹爽以後，魏的政權實際上已落在司馬氏手中，在漸次的剪除魏室支持者與擴張自己勢力的過程中，司馬氏之篡魏是一個政權轉移的最佳例子[1]，許多重要的大臣並沒有因改朝換代而影響到他們的祿位，因此在統計數字上顯示第三期與第四期的士族比例是非常的接近，（第三期百分之四十七點一，第四期百分之四十六點二）。第五期是西晉的後半期，在沒有發生八

1. 參見徐高阮"山濤論"

玉之亂以前，政治社會在表面上是平靜的，這有利於士族的發展，第五期士族占百分之六十六點三，這個百分比已達中古士族在統治階層中所占百分比的平均數。

第五期末期發生永嘉之亂，政治社會紛亂，應當是社會變動的活潑時期，但家族成爲政治中堅份子的趨勢已成，在這段時期士族們除了扮演政治和社會領袖的角色以外，仍然保持着軍事的才華，在混亂的局面之中，擁兵自守的地方長官大部份是世家子弟，故第五期的士族比例占百分之六十六點三。

東晉在南半部中國立足，是靠着僑姓與吳姓的支持，東晉皇帝的權力似乎極小，其主要的功能在於平衡內部大族的勢力，及維繫强大地方力量的向心力，這種地方力量的代表厥爲各州的刺史都督，垂整個東晉一百餘年，其刺史都督大部亦由士族子弟掌握，拙著“五朝軍權的轉移及其對政局之影響”一文曾有詳細的統計資料證明之。因此自第六期至第九期有一項極明顯的傾向，卽士族所占的比例由百分之六十三點三升至百分之七十九點七的高峯而接近百分之八十，這是士族極盛時代，許多形容階級森嚴的故事發生在這一時期。

劉裕以武力清除桓氏，他是一位極想削弱大家族力量的皇帝，首先他剝奪了士族子弟軍權，使其皇位鞏固，皇權增加，但是在政治與社會方面，仍不得不與士族合作，所以雖然在宋以後士族掌軍權者愈來愈少，士族仍然能够不受改朝換代的影響而居官位，第十期第十一期是劉宋時期，士族已自百分之七十二降到百分之六十四點三，南齊復降到百分之五十八點九。梁降至百分之五十二點五的低點，逐次減退充份表示出士族失去軍權以後的影響，但對於整個政治社會的架構而言仍然未變。梁末的侯景之亂使許多士族沉淪[1]，士族的百分比降至百分之五十六點四，這是東晉南朝的低潮[2]。

依本文的時期劃分法，將北魏分爲六個時期，按其公元前後，約相當於南朝第八期至第十三期，爲分別計，以(8)(9)(10)(11)(12)(13)等符號表示之。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卽北魏前三期〔卽第(8)、(9)、(10)期〕士族比例上升之幅度，很類似於漢魏之際（卽本文第 1.2. 期）。第(8)與第(9)之間逐漸上升，每每是開國時期引用

1. 參見顏氏家訓卷十一涉務篇。
2. 唐長孺“南朝寒人的興起”篇「魏晉南北朝史續論叢」，過份强調南朝（尤其梁陳）的實際政權正在轉入寒人手中，易於予人寒人占優勢的錯覺。而本文統計表所示之比例，可予人清晰的觀念。

功臣子弟的普遍現象。然北魏第(9)與第(10)期之間上升幅度極大(即自百分之三十六點七升至百分之六十三)，有其特殊意義，蓋因北魏自神廳以來，大量吸收中原漢士族參與統治，其胡族部落亦仿漢人習俗，變成大小不等的家族，出現在統治階層，凡此種種皆表示北中原胡漢政治社會亦已納入中國社會史的發展洪流之中。至北魏高宗文皇帝及顯祖獻文帝時〔即第(11)期〕，士族升至百分之七十三點零。而第(12)期再次升至百分之七十七點五的高峯，這正值北魏漢化最澈底時期——孝文帝親自當政時期；北魏最後一期〔即第(13)期〕達到北朝的最高峯點，士族占百分之七十九點七。更有趣的是北朝的最高峯點與東晉南朝的最高峯點相映齊頭，同爲百分之七十九點七。極其巧合。

北魏的河陰之役，使統治階層起了極大的變化，其影響之巨一如南朝的侯景之亂，隨即魏分東西，戰禍連年，雖然北朝士族子弟每每允文允武，但仍壓抑不住寒素憑藉軍功上升進入統治階層的機會。西魏與北周的士族成分降至百分之六十九點三，而東魏北齊更下降達百分之五十五點六。其情況與南朝類似。

隋文帝取代周室也是一個緩和方式轉移政權的實例，隋朝的大臣大部出自北周，及其次第亡齊亡陳以後，雖然也吸收些北齊及陳的官吏，但爲數甚低，從表五「隋官吏社會成分統計表」所示，隋朝士族占統治階層的百分之六十七點零，與北周的百分之六十九點三最爲接近，而與北齊的百分之五十五點六及陳朝的百分之五十六點七差距較大。陳寅恪先生指出西魏北周、隋、唐初之人物，因關中本位政策而相承襲，與本文之統計暗合。隋是大統一局面的朝代，在隋以前南北分立凡三百餘年，隋以前的統一局面是西晉，西晉末期(即第五期)士族成分占百分之六十六點三，與隋朝極爲接近，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第十七期是唐朝開創時期，唐初的統治階層與北周楊隋有密切關係(陳寅恪語)，然以戰爭方式取代前朝者，恒給予其他階級上升之機會，與隋朝相比，第十七期士族占百分之六十四點八，大同而小異。代表高宗的第十八期與代表武周的第十九期，有兩股相逆的潮流會聚在一起，一方是唐初功臣後裔的累積梯升趨向，一方是武后以科舉及薦舉引進新貴；功臣後裔頗受武則天之壓抑，而武后所引進的新貴之中，有一些是新士族，彼等取代了部份舊士族，如：

時期＼類別	士族總比例	舊士族比例	新士族比例
第十八期　高宗時期（武后已開始當政）	62.7	57.9	4.8
第十九期　武周時期	63.3	51.5	11.8

由此可見第十九期士族總比例雖穩定在百分之六十三的基礎上(與前二期接近之意)，但武周時期新士族已占百分之十一點八，而魏晉舊士族則已落入百分之五十一點五矣！第二十期與第二十一期分別代表唐玄宗的前期與後期，士族又略微升至百分之六十七點五與百分之七十點六。所值得注意的是舊士族增加較多，如：

第二十期	玄宗前期	67.5	58.9	8.6
第二十一期	玄宗後期	70.6	63.0	7.6

安史之亂對我國中古所帶來的震撼，可由多角度去觀察，論者多矣！在於統治階層社會變動而言，士族成分在第二十二期(安史之亂)，急速降至百分之五十六點二，這是另一個最低點，可與第十三期的梁侯景之亂（士族降至百分之五十二點五，及北魏亡後的東魏北齊百分之五十五點六相比，尤其值得重視的是魏晉以來舊士族落入百分之五十，即第二十二期百分之四十四點一；第二十三期百分之四十五點五；第二十四期百分之四十一點二。

另一項重要事實，即自安史亂後，藩鎮割據，全國漸漸佈滿節度使，中央所能直接統轄地區日蹙，藩鎮大都有任命僚屬之權，於是乎唐室除能任命中央官吏及所轄州縣官吏以外，較唐代前半期已不可同日而語，於是乎出現在唐史記載中，大都蒐集在首都與若干州郡的士族羣們，這種現象的演變，及其所代表的歷史意義，在另章士族性質之轉變中討論之。故第二十五及第二十六期士族比例上升達百分之八十八點七，是唐室蹙局情況下的中央官吏士族成分。這種集中在中央的官僚化現象，在黃巢之亂

以後，使士族遭受很大傷亡。第二十七期，士族分降至百分之六十五點三，其中魏晉舊族僅占百分之三十九點二，已表明出歷史演變趨向。

孫國棟先生"唐宋之際門第的消融"比較唐末、五代、北宋初三階段舊士族趨於消失的研究，爲士族走下其歷史舞臺提供證明。

小姓之變動

小姓在統治階層中所占比例之消長，表示兩種意義，其一：小姓是介於寒素與士族之間的階層，依本文之定義，由寒素晉升爲士族必需經過小姓這個階段，故從小姓比例的變化觀察寒素的上升運動，以及士族的下降運動。其二：小姓的另一含義包括所謂縣姓、地方酋豪、地方豪族等，這個階層在整個中國社會史上是很重要的一環，在士族出現以前（曹魏以前）、及士族沒落以後（唐末以後），都是很重要的社會階層，即在中古這段時期，小姓亦與士族同時存在，祇是在門第炫耀的時代中，史書沒有太多的記載罷了。小姓的變化亦表示地方勢力的盛衰。

在第三期及第四期小姓的比例較高，依次爲百分之三十七點六、百分之三十六點八，這是上升運動活潑時期，使次一期士族的比例依次推進爲百分之四十六點二、百分之六十六點三。前三期的小姓如下：

時期	占該期官吏的%	差距%
第一期	14.5	10.2
第二期	24.7	12.9
第三期	37.6	

表現出上坡面很急峻。小姓在第五、第六、第七期的比例依次爲百分之二十一點五、十九點七、十八點六，仍然表示上升運動在繼續中，但其幅度已漸小，這種上升運動使次一期士族的百分比遂漸提高，故第八、第九期士族百分比達到一個新的高峯。

東晉南朝階級愈來愈森嚴，士族任中上品官、小姓任低中品官的現象，不但成爲習慣，抑且與選舉制度配合，拙文"從中正評品與官職之關係論魏晉南朝社會架構"

曾有細論，故小姓大都在低品中品官任職。自第八期至第十三期小姓曾占比例在百分之二十一點一與百分之四點九之間，然而上升至士族的現象並不活潑。梁末侯景之亂，陳霸先最後建立陳朝，其基本武力建立在許多地方首豪及縣姓之上，拙文"五朝軍權之轉移及其對政局之影響"曾有細論。第十四、第十五期小姓依次爲百分之二十一點一、百分之二十五點六，其中有上升運動出現。

北魏在第(八)、第(九)期時小姓依次爲百分之四十四點四、百分之四十一點一，甚高，將此與曹魏時期比較，這個上升運動高潮使北魏第十期第十一期士族比例急速上升至百分之六十三及百分之七十三。自第十一、第十二至第十三期，小姓比例急速下降至百分之十三與十之間，甚低；北魏這段時期與南期一樣地漸趨階級社會。

東魏北齊小姓占百分之二十五點三，同期因爲北魏末年河陰之役士族消滅甚多，故仍不足以補充大幅下降的士族比例。西魏北周小姓占百分之十一點七，前與北魏末期相仿，後與隋代類似。

隋朝（卽第十六期）士族占百分之六十七，小姓占百分之十五點二，這個比例很接近各朝的平均數，可能是因爲在時間上居七百年之中間，地區上又統合宇內之故。

唐代第十七期時值開國之際，似乎是士族與寒素的天下，小姓僅占百分之六點二。第二代（卽第十八期）小姓比例高達百分之二十二點七，顯然是從唐初第一代寒素開國功臣子弟中升上來者，第一代寒素占百分之二十九。從第十八期以迄第二十七期唐亡，小姓的比例一直很低，最高只有百分之十七，最低僅百分之五點二。然唐代階層之間流動並沒有像南朝梁代那麼僵化，科舉當然是重要因素，因此寒素小姓可藉考試而做大官，累積一二代便可成爲本文定義之士族，然這條通道（Channel）並非非常廣濶，拙著「唐代統治階層社會變動」所示，每一代由小姓而士族者（卽唐代新族），僅增加百分之二。

寒素之變動

士族、小姓都是在政治社會中有地位者，寒素才是平民，許多研究社會變動者的注意力集中在寒素階層，當然寒素仍過於籠統，實際上包括各地區各種不同行業的自由民、半自由民、甚至非自由民。同時寒素在統治階層所占比例的升降，亦最能反映出戰爭、政潮、政變等之社會意義，在資料充分的情況之下，應有專文討論之。本文

僅就整個社會架構中比重而論之。

第一期漢末建安時期，這是士族仍未完全凝固而又逢天下大亂之際，寒素占百分之五十六點五；第二期卽曹魏初年寒素仍然有百分之三十六點八；這中間以文士爲最多，拙文"三國政權與社會基礎"中已有細論，從第三期士族比例接近百分之五十，並繼續穩定成爲一種社會架構以後，寒素任官機會微小。自第三至第六期，約在百分之十五上下；第七期的百分之一點八及第八期的百分之六點一，正是東晉後半段門第森嚴的時刻，東晉與宋政權交替，復有一個很好的機會，寒素竟有百分之二十七，梁代亦出現一次侯景之亂，是寒素憑軍功出仕的機會，占百分之二十七點五，南朝其他各期大率在百分之二十以下。

北魏開創期間寒素尙有百分之二十四點四。二十二點二，自此以降，未再達百分之二十者，北中國胡姓尙武，漢士族尙文，寒素仕進機會遜於南朝。

隋代寒素占百分之十七點二，亦近各期之平均數。

唐代寒素有三個高潮，卽開國期間（第十七期）的百分之二十九、安史之亂（卽第二十二期）的百分之二十八點四、及唐末天下大亂(卽第二十七期)的百分之二十九點五；這都是用兵之際，拙文「唐代統治階層社會變動」中曾有細論。第十九期武后當政，與第二十期玄宗前期，亦達百分之二十五點五，與百分之二十四點五，這就與科舉及政潮有關了。第二十三期占百分之二十五，這是安史之亂的延長。除第二十五、二十六期以外，似乎唐代寒素任官比魏晉南北朝時期略大。

* * *

著者曾對第一、二、三期作過個案研究[1]，對於唐代各期士族、小姓、寒素亦曾有系統討論[2]；其實在上列二十七期之中的任何兩期間的士族、小姓、寒素百分比之升降，與當時政潮政變有密切關連，都可作進一步的個案分析。

1. 參見拙文"三國政權的社會基礎"史語所集刊 第46本第1分1974。
2. 參見拙文「唐代統治階層社會變動」影印博士論文，1969。

第三篇　中古家族之變動

（一）

客觀的局勢將大族引進了統治階層，產生了一種特殊的政治現象——士族政治。有關士族如何在政治上保持其地位的主觀及客觀因素，拙文「兩晉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中提出初步的分析，但該書文不及隋唐，以致不能看到全豹。士族是中古政治社會的中堅力量，從前篇所示，自漢末至唐末士族長期位居統治階層之絕對多數，也就是說整個中古時期社會架構無甚變化，然而這並不表示中古士族全然沒有盛衰升降，事實上各士族盛衰升降與當時政治社會有密切關連，同時也直接影響到當時政治社會的內容。就以家族爲單位而言，有若干大家族在政治上綿延達二十幾世，然社會必竟是動的，有的家族只興旺一二代，有的七八代；即令長達二十幾世的家族，其間亦有盛衰起伏。問題是即令某些士族衰微，繼之而爲統治階層者亦是士族，所以中古家族的變動從大處看屬於框框內的變動，而非社會架構的變動。

政權需要社會勢力爲其基礎，而社會勢力是會變動的，這是變動的內在要素，形之於外則是家族的變動。且以士族與地方豪族二大基層敍述之。

(一)士族：士族是已經被吸收成爲高級統治階層的社會力量，由於時間的推移，有的會漸漸失去其社會性、有的增減其社會力量、有的轉移社會力量之地盤，各家族有其特殊的主觀客觀條件，而有不同的發展。當士族被吸收入統治階層以後，其社會基礎的變化如下：

其一：家族中某些人至中央或他州任官，其原籍仍保留族人及退休的族人，誠如 Eberhard 在其大著「征服者與統治者」中說[1]：

> 一個縉紳家族通常有一個鄉村家和一個城市家。鄉村家即家族田產所在地，那裏居住一部份族人，管理經營其財產，如向佃農收租等，鄉村家是家族經濟的支持骨幹。當其家族有足够的資金時，則聘請教師教育其子孫，使其子孫能從事官宦生涯。……
>
> 縉紳家族中受教育的份子常常搬進城市中居住，其生活較爲安逸，他們有鄉村

1. Wolfram Eberhard: Conquerors and Rulers-Social Forces in Medieval China pp. 44-45. 1965年修訂版

家爲其經濟基礎，……

縉紳在城市的支族的主要活動是政治性的，其家人千方百計謀求進入官僚羣中，或做中央官或做地方官，或爲文官或爲武官。……

這種在城市與鄉村皆有基業的家族較爲穩固，同書云：

社會的安定與權力的訣竅基於雙重意義上；如果在中央的城市支族在權力爭奪時失利，則該家族鄉村部份仍能繼續生存與維持，政局的轉移很少能够同時影響到城市及鄉村兩地方的族人。若當城市支族當權時，彼可保護並援助居住在鄉村的支族。……[1]

依社會勢力的轉變進而會影響其政治地位的理論而言，這種大家族很少受某一政局改變而影響其地位。

四民月令所述東漢博陵安平崔氏可作爲這個類型的範本。又例如隋書卷四十二李德林傳云：

(李德林)博陵安平人。祖壽，湖州戶曹從事。父敬族，歷太學博士鎭遠將軍。(德林)年十六遭父艱，自駕靈輿反葬故里，時正嚴冬，單衰跣足，州里人物由是敬慕之。博陵豪族有崔諶者，僕射之兄，困休假還鄉，車服甚盛，將從其宅詣德林赴弔，相去十餘里，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才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燻灼。

中古若干通朝大族大都屬於此型，尤以北中國系統的士族爲然，如趙郡平棘李氏、河南滎陽鄭氏、太原王氏、弘農華陰楊氏、趙郡武城崔氏、范陽涿縣盧氏等。並參見第一篇第10頁首段注。

其二：支葉稀疏的家族，一旦加入了統治階層，常常舉家遷入城市，久而久之，與其原籍斷絕關係。這種家族漸漸喪失其原有的社會力量及社會性，其子孫僅能憑藉才能干祿時主。若能延綿若干代，則僅爲官僚家族而已，一旦政局轉移，其政治地位影響至鉅。最能澈底表現這種類型的是東晉南朝的僑姓，所謂僑姓當然指原籍非南方的士族(尤其是中原地區的士族)，有的原本頗有聲勢，如瑯琊臨沂王氏、潁川潁陰荀氏、陳郡陽夏袁氏；有的薄具聲名，如泰山平陽羊氏；沛國龍亢桓氏、陳郡

1. Wolfram Eberhard: Conquerors and Rulers-Social forces in Medieval China pp. 46. 1965年修訂版

陽夏謝氏，汝南安城周氏、河南陽翟褚氏、陳留尉縣阮氏等。以上所述諸士族，自隨東晉司馬睿僑遷南方以後，本籍似乎無甚人物出現，他們自東晉而南朝，漸漸步向官僚家族。

其三：有些家族由於其主要份子到其他州郡任官，久而久之，落籍於新住處。有的或因戰亂之影響，整族遷往邊區，如兩晉南北朝時的涼州與東北之地，於是乎產生遷籍及分支現象。這種現象在隋唐時期亦甚普遍，大部份士族雖然遷移與分支，仍然保留其原籍之稱號，稱之爲「郡望」，於是乎在唐代常常出現「郡望」與居住之「籍貫」不能合一之現象[1]，在感情疏隔多世，再從兄弟當然比不上親兄弟，同族的社會地位則以家譜維繫着。這是大族社會勢力之新增。有些較單薄的士族，若遷移他處，其原籍的社會領袖可能因此空虛，於是次一級的家族可能漸漸取代之，而形成爲該地區的新社會領袖。這是社會勢力之移植與新生。

其四：異族酋豪因政治及軍事因素遷入中國者，有的僅在中央任官，久而久之，失去其社會力量而成於官僚的一分子；有的在某地落籍，可能形成一個新的州郡豪族，這種大族之地區性之消融，直接影響到社會勢力的變化，這種例子在北朝系統頗爲普遍，而宇文氏關中本位政策與本類型有更顯著的關係。

* * *

(二)地方豪族，地方上次一級的家族，常被人忽略，這些小姓見諸史冊中的名稱如：地方酋豪、縣姓、洞主、豪强等。其社會力量容或小於大士族，但在地方上仍擁有許多實力。一般而論，大士族對地方豪族之顧忌遠勝過對平民之顧忌，因爲這些小姓隨時有取代大士族的實力與資格，由於地方豪族與中央政治力的連繫遠不及大士族密切，因此當政局安定或中央政治力强大之時，作用顯得不大。而自漢朝以來，大士族運用中央政治力來壓抑地方豪族的例子屢見不鮮[2]，拙文“從中正評品與官職之關係論魏晉南朝之社會架構”中所示，魏晉南朝九品官人法之演變，中正評品、望族、與官職之間，都有屢次性的相對關係。亦卽門望高的士族，其中正評品爲「門地二品」

1. 參見岑仲勉「唐史餘瀋」頁229，唐史中之望與貫條，引列十條。又十七史商榷、抱經堂集等書亦有類似見解。
2. 參見許倬雲“西漢政權與社會勢力的交互作用”史語所集刊第35本，1964。

任官由五、六、七品起家；低者依次遞減。地方豪族則屬「寒微士人」，至梁代別開一格即由流外七班入官。地方豪族由低品官入仕，其上達頗受限制，士族與次一級的地方豪族間之衝突，構成中古統治階層之中的主要事件。在魏晉南北朝門閥深嚴之秋，唯有政權更迭，或大變故的出現，地方豪族的實力才顯示出來，尤其是赤裸權力，例如永嘉之亂後，中原板盪，地方上塢堡大行其道[1]；梁末侯景之亂，陳霸先集團是以南方小姓、酋豪、縣姓爲基礎，而平亂建元[2]；而隋末有所謂「山東豪傑」者[3]，亦屬此類。總之，在亂變之餘，部份地方豪族纔能上升，而達到社會勢力與其政治地位間相應關係之新平衡。唐代科舉制度仕進稍具彈性，使部份地方豪族得以循和平方式而上達。

（二）

本章且以家族爲單位，縱觀士族之發展，自東漢至唐末，凡七百餘年。東漢爲源流，三國是中古社會架構之上坡面[4]，依次展開分爲四大階段：（A）兩晉南朝；（B）北朝；（C）隋→安史亂前；（D）安史之亂→唐末。士族之標準仍以三世任官達五品者[5]，然中古時期達此項標準者爲數甚多，本章取其最大或系長之六十族。表中各族之後的數字，表示該族五品以上之人數。在東漢、三國、兩晉南朝、北朝各朝，係取材於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周書、北齊書等正史列傳上之人物。隋唐時期係混隋書、唐書合鈔及隋唐墓誌拓本而成。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有更多的人物，唯該表僅記載曾任宰相的家族，且即令有記載之家其偏廢不一，故本表不以宰相世系表作爲基本材料，以免詳簡不同，失去比例平衡。本表按正史與隋唐墓誌拓本爲主要材料，是一種最好的自然抽樣。亦以此之故，本表所列之數字，於其看作絕對數目，不如看作一種相對的比例，對於各大族興衰起伏，庶幾乎才有正確的瞭解。除此之外，本表附帶說明如下：

(1) △符號表示某時期是大族。

(2) ☆符號表示前期曾是王朝宗室。

1. 參見金發根「永嘉亂後的北方豪族」第一章。
2. 參見拙文“五朝軍權之轉移及其對政局之影響”。
3. 陳寅恪“論隋末唐初所謂「山東豪傑」”。
4. 參見拙文“三國政權的社會基礎”史語所集刊第46本第1分，1974。
5. 參見拙書「兩晉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第一章，及拙論文“唐代統治階層社會變動”1969。

（三）

東漢	三國	A 兩晉南朝	B 北朝	C 隋——安史亂前	D安史之亂——唐末	A+B+C+D
		△陳郡長平 殷氏 15				
		△濟陽考城 江氏 18	△代郡 羅氏13	△幷州文水 武氏13	幷州文水 武氏 2	
	陳留尉縣 阮氏	△陳留尉縣 阮氏 14	△安定 鄧氏15	△樂安 孫氏 5	樂安 孫氏13	
	河南陽翟 褚氏	△河南陽翟 褚氏 19	△北秀容縣 爾朱氏15	△燉煌 令狐氏17	燉煌 令狐氏 1	
	廬江灊縣 何氏	△廬江灊縣 何氏 20	△隴西狄道 辛氏21	△南陽 張氏16	南陽 張氏 5	
△南陽新野 鄧氏29	會稽山陰 孔氏	△會稽山陰 孔氏 25	△上谷沮陽 張氏22	△隴西 獨孤氏18	隴西 獨孤氏 7	
△扶風茂陵 竇氏18	汝南安城 周氏	△汝南安城 周氏 28	△清河繹幕 房氏23	△太原 郭氏12	太原 郭氏13	
△扶風茂陵 馬氏17	吳郡吳縣 顧氏	△吳郡吳縣 顧氏 16	△代郡 陸氏32	△鉅鹿 魏氏20	鉅鹿 魏氏 6	
△扶風平陵 耿氏17	吳郡吳縣 張氏	△吳郡吳縣 張氏 35	△代郡 穆氏47	△隴西天水 趙氏26	隴西天水 趙氏12	
△安定烏氏 梁氏12	陳郡陽夏 謝氏	△陳郡陽夏 謝氏 55	☆河內溫縣 司馬氏38	△清河武城 張氏39	清河武城 張氏 6	
				☆潁川 陳氏14	潁川 陳氏 8	
泰山平陽 羊氏 8	泰山平陽 羊氏	△泰山平陽 羊氏 17		☆洛陽 宇文氏20	洛陽 宇文氏 2	
潁川潁陰 荀氏 9	潁川潁陰 荀氏	△潁川潁陰 荀氏 17		☆洛陽 元氏44	洛陽 元氏 8	
沛國龍亢 桓氏 7	沛國龍亢 桓氏	△沛國龍亢 桓氏 25				
京兆杜陵 韋氏 6	京兆杜陵 韋氏	京兆杜陵 韋氏 10	京兆杜陵 韋氏28	京兆杜陵 韋氏63	京兆杜陵 韋氏34 135	
河南開封 鄭氏 5	河南開封 鄭氏		河南開封 鄭氏45	河南開封 鄭氏42	河南開封 鄭氏37 124	
弘農華陰 楊氏10	弘農華陰 楊氏		弘農華陰 楊氏31	弘農華陰 楊氏74	弘農華陰 楊氏50 155	
博陵安平 崔氏 5	博陵安平 崔氏		博陵安平 崔氏43	博陵安平 崔氏49	博陵安平 崔氏43 135	
	趙郡武城 崔氏		趙郡武城 崔氏63	趙郡武城 崔氏50	趙郡武城 崔氏55 168	
△汝南汝陽 袁氏10	趙郡平棘 李氏		趙郡平棘 李氏87	趙郡平棘 李氏65	趙郡平棘 李氏27 179	
△上谷昌平 寇氏 8	隴西狄道 李氏		隴西狄道 李氏38	隴西狄道 李氏62	隴西狄道 李氏35 135	
△瑯琊東武 伏氏 8	太原晉陽 王氏	太原晉陽 王氏 26	太原晉陽 王氏28	太原晉陽 王氏45	太原晉陽 王氏17 116	
△南陽湖陽 馮氏 8	瑯琊臨沂 王氏	瑯琊臨沂 王氏133	瑯琊臨沂 王氏 6	瑯琊臨沂 王氏49	瑯琊臨沂 王氏11 197	
△南陽新野 來氏 7	范陽涿縣 盧氏		范陽涿縣 盧氏34	范陽涿縣 盧氏55	范陽涿縣 盧氏38 127	
△潁川陽翟 郭氏 7	渤海蓨縣 高氏		渤海蓨縣 高氏70	渤海蓨縣 高氏41	渤海蓨縣 高氏17 128	
△汝南汝陽 周氏 6	河東聞喜 裴氏	河東聞喜 裴氏 27	河東聞喜 裴氏46	河東聞喜 裴氏49	河東聞喜 裴氏29 151	
△南陽新野 陰氏 6	彭城 劉氏	彭城 劉氏 28	彭城 劉氏21	彭城 劉氏36	彭城 劉氏33 118	
△下邳淮浦 陳氏 5	河東解縣 柳氏	河東解縣 柳氏 11	河東解縣 柳氏20	河東解縣 柳氏24	河東解縣 柳氏15 70	
△南陽棘陽 崔氏 5	京兆杜陵 杜氏		京兆杜陵 杜氏21	京兆杜陵 杜氏26	京兆杜陵 杜氏27 74	
△京兆長安 宋氏 5	蘭陵 蕭氏	蘭陵 蕭氏 18	蘭陵 蕭氏14	蘭陵 蕭氏23	蘭陵 蕭氏17 72	
△魏郡繁陽 馮氏 5	河東汾陰 薛氏		河東汾陰 薛氏47	河東汾陰 薛氏15	河東汾陰 薛氏10 72	
△犍爲武陽 張氏 5	吳興武康 沈氏	吳興武康 沈氏 45	吳興武康 沈氏 3	吳興武康 沈氏 8	吳興武康 沈氏 3 59	
△汝南南頓 應氏 5	吳郡吳縣 陸氏	吳郡吳縣 陸氏 33	吳郡吳縣 陸氏 3	吳郡吳縣 陸氏11	吳郡吳縣 陸氏 5 52	
	陳郡陽夏 袁氏	陳郡陽夏 袁氏 26	陳郡陽夏 袁氏 8	陳郡陽夏 袁氏 9	陳郡陽夏 袁氏 2 48	
			扶風 竇氏12	扶風 竇氏31	扶風 竇氏13 56	
			代郡 長孫氏30	洛陽 長孫氏 8	洛陽 長孫氏 6 44	
			代郡 于氏39	洛陽 王氏14	洛陽 于氏 1 54	
			代郡 源氏10	洛陽 源氏24	洛陽 源氏 2 36	
			渤海蓨縣 封氏25	渤海蓨縣 封氏 6	渤海蓨縣 封氏 4 35	
			高陽新城 許氏13	高陽新城 許氏 8	高陽新城 許氏 3 24	

(3) 劉、蕭、高、楊、李各族之數字，未含宗室人物。

(4) ……符號表示漢代已有端倪。

(5) 表中數字，東漢爲二千石以上，其他各朝爲五品官以上。

(6) 東漢部份僅作參考，未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

(7) 本表上方部份，大都是某時期大族，亦卽綿延不長之家族。

(8) 本表最後一欄(A＋B＋C＋D)是通朝大族之總和。

(四)

表中所示，自魏晉以迄唐末，延綿不絕一直維持强盛的士族，有十姓十三家，卽：京兆杜陵韋氏、河南開封鄭氏、弘農華陰楊氏、博陵安平崔氏、趙郡武城崔氏、趙郡平棘李氏、隴西狄道李氏、太原晉陽王氏、瑯琊臨沂王氏、范陽涿縣盧氏、渤海蓨縣高氏、河東聞喜裴氏、彭城劉氏等，任官五品以上者在197人以下，116人以上。另河東解縣柳氏、京兆杜陵杜氏、蘭陵蕭氏、河東汾陰薛氏、吳興武康沈氏、吳郡吳縣陸氏、陳郡陽夏袁氏等七姓亦屬通大族，唯任官人數略遜，在74人以下，48人以上，此二十家衣冠人物，相繼不絕，凡七百年之久。其次扶風竇氏，洛陽長孫氏、洛陽于氏、洛陽源氏、渤海蓨縣封氏、高陽新城許氏、外加曾經宗室者洛陽元氏、河內溫縣司馬氏、洛陽宇文氏、潁川陳氏等，此十家列位統治階層凡五百年之久，再如：沛國龍亢桓氏、潁川潁陰荀氏、泰山平陽羊氏、陳郡陽夏謝氏、吳郡吳縣張氏、吳郡吳縣顧氏、汝南安城周氏、會稽山陰孔氏、廬江灊縣何氏、河南陽翟褚氏、陳留尉縣阮氏、濟陽考城江氏、陳郡長平殷氏、代郡穆氏、代郡陸氏、清河繹幕房氏、上谷沮陽張氏、隴西狄道辛氏、北秀容縣爾朱氏、安定鄧氏、代郡羅氏、清河武城張氏、隴西獨孤氏、南陽張氏、燉煌令狐氏、樂安孫氏、幷州文水武氏等三十家皆有三百年以上之人物。以上六十家是中古政治社會最重要的士族。

兩漢雖不能稱爲士族時期，然兩漢給予以後士族早期萌芽與發展的時空條件，許多大士族在漢代已漸露曙光。表中所示，中古最興旺悠長的二十姓，大都可推自漢代、如韋氏、鄭氏、楊氏、崔氏(博陵)、崔氏(趙郡)、李氏(趙郡)、王氏(太原)、王氏(瑯琊)、盧氏、高氏、裴氏、劉氏；李氏(隴西)、柳氏似乎在漢以後發展而成。其中韋氏、鄭氏、楊氏、崔氏(博陵)等在東漢時期尙屬較大的士族。大

部份的中古士族，在曹魏西晉時期（公元第三世紀）已漸次凝成，與前章統計表對照看，曹魏西晉正是士族社會架構的上坡面，自此以迄唐末，士族居統治階層之絕對多數，歷久而不衰。東漢末期(卽公元第二世紀)的黨錮之禍，加速强化士族的同類感，這種內在精神之養成與維持，陳寅恪與錢穆兩位先生皆有深論，乃是使士族能够超越朝代更迭、政潮起伏的凝固力。這並不意味着追隨着這股精神的家族必然延綿不絕，一個家族的長期高官厚祿，仍需具備許許多多主觀客觀因素，這需從個案研究中發現[1]，然而就其大趨勢而言，大部份的大士族在這段漫長的七百年之中，皆能維持其政治社會地位，已非偶然因素可以解釋。

東漢較大的士族有南陽新野鄧氏、扶風茂陵竇氏、扶風茂陵馬氏、扶風平陵耿氏、安定烏氏梁氏。鄧禹、馬援、耿弇爲開國元勳，竇融、梁統率河西之地歸漢，時皆在東漢開創之際。他們在西漢時已非泛泛之輩，梁氏在西漢以貲千萬徙茂陵[2]，耿氏在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鉅鹿徙焉[3]，竇融七世祖廣國漢孝文皇后之弟封章成侯，融高祖父宣帝時以吏二千石自常山徙焉[4]。鄧氏、馬氏、竇氏、耿氏、梁氏在東漢復具外戚身份，與宗室關係甚爲密切。除耿況、耿伋兄弟學老子於安丘先生，似有學以外，鄧禹是太學生，其餘未聞在經學上有特殊聲名。故他們皆屬官僚類型，可評爲政治性家族，政治性的家族隨政局的變動而盛衰，脫離不了朝代更迭與政潮起伏之影響，故在魏晉以後已非大族矣！以經業聞名的袁楊二族，袁氏自袁良袁安傳孟氏易[5]，至東漢後期有四世三公，漢魏之際與曹操爭天下失敗，自此衰落。另一支陳郡陽夏袁氏，盛行於中古[6]。弘農華陰楊氏習歐陽尚書，楊震有關西孔子之稱[7]，至唐不衰。京

1. 竹田龍兒“門閥としての弘農楊についての一考察”。史學31—1~4
守屋美都雄“六朝門閥の一研究——太原王氏系譜考”。法制史研究4
矢野主稅“韋氏研究”。長崎大學學藝部研究報告臨時增刊號
矢野主稅“鄭氏研究”。社會科會論叢8
矢野主稅“裴氏研究”。社會科會論叢14
拙文“我國中古大士族之個案研究——瑯琊王氏”。史語所集刊第37本上册，1967.
Ch'en Ch'i-yü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Hsün Family (ca. 100-300 A.D.):—A Case Study of One of 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in the Six Dynasties."
2. 後漢書列傳卷二十四梁統傳。
3. 後漢書列傳卷九耿弇傳。
4. 從漢書列傳卷十三竇融傳。
5. 後漢書列傳卷三十五袁安傳。
6. 趙鐵寒“記袁安碑”大陸雜誌卷十二第五、六期。謂汝南汝陽袁氏與陳郡陽夏袁氏、並非一支。
7. 後漢書卷列傳卷四十四楊震傳。

兆杜陵韋氏[1]、河南開封鄭氏[2]、博陵安平崔氏[3]，亦屬東漢大族，由北朝而隋唐，成中古名族。泰山平陽羊氏[4]、潁川潁陰荀氏[5]、沛國龍亢桓氏[6]，在東漢亦以經術傳家，享盛名於魏晉，衰於南朝。

西晉司馬氏政權對士族政治之完成，是重要的關鍵。這又可以推溯到曹魏時期潁泗士族集團與譙沛地方豪族集團之鬭爭，魏齊王芳嘉平元年司馬懿勝曹爽，穩替曹氏政權，是因爲司馬氏本身是士族之一，同時又得到士族支持之故，拙文"三國政權與社會基礎"[7]曾有討論。

永嘉之亂，西晉中央政府破碎，司馬睿在南方建立政權，是爲東晉。東晉元帝原無實力，由大士族擁戴下而偃有半壁江山[8]，士族得到充分發展[9]，當此時也，其政權支柱爲僑姓與吳姓。僑姓依地理之遠近，又有區別，大凡距離南方較近者，較易舉宗南遷，此類如瑯琊臨沂王氏、蘭陵蕭氏、陳郡袁氏、陳郡陽夏謝氏、沛國龍亢桓氏、潁川潁陰荀氏、太山平陽羊氏、汝南安城周氏、河南陽翟褚氏、陳留尉縣阮氏、濟陽考城江氏、陳郡長平殷氏；這些士族的主要房支與南方政權密切結合，是東晉南朝政府中之重要人物。另一類距南方較遠，或房支甚多的大族，有一部份南奔，有一部份留在北方原籍，就該家族而言，形成南北二支平衡發展的現象，如京兆杜陵韋氏、太原晉陽王氏、河東聞喜裴氏、河東解縣柳氏等。自晉室南渡，建康成爲首府，三吳猶如三輔，吳郡吳縣張氏、顧氏、陸氏，原本東南地望，甚少機會參與西晉中央政府[10]，如今在僑吳結合的政策之下[11]，成爲中央級的士族，其他環繞此樞紐地區的大族如吳興武康沈氏、會稽山陰孔氏、廬江潛縣何氏等，亦皆籍地緣之影響力，盛行於東晉南朝朝中。東晉優渥士族，士族軍權甚盛，皇室居於平衡地位[12]，士族間多次

1. 後漢書列傳卷十六韋彪傳。
2. 後漢書列傳卷二十五鄭玄傳。
3. 後漢書列傳卷四十二崔駰傳。
4. 後漢書列傳卷二十一羊續傳。
5. 後漢書列傳卷五十二荀淑傳。
6. 後漢書列傳卷十八上桓譚傳、卷二十七桓榮傳。
7. 並參見萬繩楠"曹魏政治派別的分野及其升降"。
8. 參見拙文"五朝軍權之轉移及其對政局之影響"。
9. 參見拙文"從中正評品與官職之關係論魏晉南朝之社會架構"。
10. 參見何啓民"永嘉前後吳姓與僑姓關係之轉變"。
11. 參考晉書卷六十五王導傳。
12. 參見拙文"五朝軍權之轉移及其對政局之影響"。

勢力之平衡及其平衡之破壞，使若干士族敗亡與沒落，桓氏、殷氏、褚氏、周氏、以及未見於本表的次級大族如太原祁縣溫氏、潁川鄢陵庾氏、高平金鄉郗氏、義興陽羨周氏等皆因與軍權過於密切而卒致衰落。自此以後，南朝士族不喜軍旅。宋齊梁陳之軍權大都掌握在皇帝與宗室手中[1]，大士族子弟以任文職官吏爲主，集中在王、謝、袁、沈、張、顧、陸、孔氏之中。而其中尤以瑯琊王氏一支獨秀。

距離南方愈遠，舉宗南下愈爲困難，此理甚明，故諸如趙郡武城崔氏、博陵安平崔氏、趙郡平棘李氏、隴西狄道李氏、范陽涿縣盧氏、渤海蓨縣高氏、河東汾陰薛氏、京兆杜陵杜氏等，皆在原籍謀求發展；太原晉陽王氏、京兆杜陵韋氏、河東聞喜裴氏、河東解縣柳氏等，雖有一支南下，大部份仍居籍。而弘農華陰楊氏，河南開封鄭氏、則是世代長居中原的重要家族。

在北魏安定北中國之前，中原政局極爲紊亂。在失去保護的士族們，祇有聚塢集堡，以求自衞，拓拔氏統一北方，漸採與漢人合作之政策，然胡漢相處，牽徙到文化之差距，其困難遠甚於僑吳姓地域之差異。北方士族之生存與成長，包含着許許多多血淚史[2]。所以北方士族有其堅毅的生存力，表現在盤根錯節的社會基礎之上，這項因素是其與拓拔氏共同維繫中原政治社會安定的最大資本，在北朝較大的士族有：京兆杜陵韋氏、河南開封鄭氏、弘農華陰陽氏、博陵安平崔氏、趙郡武城崔氏、趙郡平棘李氏、隴西狄道李氏、太原晉陽王氏、范陽涿縣盧氏、渤海蓨縣高氏、河東聞喜裴氏、彭城劉氏、河東解縣柳氏、京兆杜陵杜氏、河東汾陰薛氏、河內溫縣司馬氏、渤海蓨縣封氏、高陽新城許氏、清河繹幕房氏、上谷沮陽張氏、隴西狄道辛氏、安定鄧氏；胡姓亦甚多，其最盛者除元氏外，有：穆氏、陸氏、長孫氏、于氏、賀氏、源氏、爾朱氏、羅氏等。一般而論，北朝大族之數量較多，分布地域亦較廣，西自隴西、東至渤海、北起代郡、南臨彭城，皆平衡分布，此與拓拔氏吸收各地地方勢力之政策有關。

北朝系統最後統一中國，建立隋唐帝國，注定北方士族在統治階層占有較優勢的

1. 參見拙文“五朝軍權之轉移及其對政局之影響”。
2. 如崔浩之死。論崔浩死因之論說甚多，如陳寅恪“崔浩與寇謙之”。王伊同“崔浩國書獄釋疑”。孫同勛“北魏時期政治的衝突與崔浩之獄”。逯耀東“從北魏前期的文化與政治形態論崔浩之死”等。

地位。盛行南朝的陳郡陽夏謝氏、吳郡吳縣張氏在隋唐二朝鮮有人物，更遑論沛國龍亢桓氏、潁川潁陰荀氏、泰山平陽羊氏、吳郡吳縣顧氏、汝南安城周氏、會稽山陰孔氏、廬江灊縣何氏、河南陽翟褚氏、陳留尉縣阮氏、濟陽考城江氏、陳郡長平殷氏。然吳興武康沈氏、吳郡吳縣陸氏、陳郡陽夏袁氏雖趨衰微，仍有十餘人任官五品以上，保持遞減衰退速度，盛極一時的瑯琊臨沂王氏，在隋至安史亂前這二世紀之中，略可與其他北朝大士族比美，望族尚高，然至安史亂後以迄唐末，則急速下降而趨沒落，南齊與梁代的宗室蘭陵蕭氏，稍爲幸運，在隋唐頗有人物。

有一項很明顯的現象，即北朝胡姓大族，至隋唐時急速衰微，如穆氏、陸氏、爾朱氏、羅氏等，幾乎甚少官宦，長孫氏、于氏亦急速衰落，然尚保有十餘人居官五品以上，竇氏在隋唐全期頗爲幸運；源氏在唐代前半期亦甚幸運，似乎頗爲特殊，北朝的宗室元氏及宇文氏與源氏的情況很類似，他們在安史亂後已一蹶不振。北朝關東關中地區的士族在隋唐的盛況，遠非南朝士族與北朝胡姓可比。京兆杜陵韋氏、河南開封鄭氏、弘農華陰楊氏、博陵安平崔氏、趙郡武城崔氏、趙郡平棘李氏、隴西狄道李氏、太原晉陽王氏、范陽涿縣盧氏、渤海蓨縣高氏、河東聞喜裴氏、彭城劉氏、河東解縣柳氏、京兆杜陵杜氏、河東汾陰薛氏等，此十五姓是隋唐全期三百餘年的寵兒，子孫有極高的任官率。

（五）

以上是以每個大士族爲單位而觀其盛衰。由於許多大士族源於兩漢或魏晉，若干代以後，昭穆疏遠，分支分房的現象常常發生，例如以王祥王覽爲其共同祖先的瑯琊臨沂王氏，至南朝初有所謂烏衣巷王氏及馬糞巷王氏之分。降至唐朝，各大士族分房分支更爲普遍。然而，士族內部官宦型態是否像周朝「宗法式」現象？抑或沒有主系旁支之分、各房支在族內所享的機會平等？或者另有方式？解決這個問題無法從有形的律令中獲得。各房支的變動原因極多，各族的情況又不盡相同，故這是一個具有高度彈性的問題，應該需要完整的資料才能圓滿地解釋，本文僅能依現今所能看到的資料作爲基礎，先觀察各族內部官宦變化的通性，然後以典型的例子深入分析與討論。

大士族隨時會發生分房分支現象，有的房支因年久失宦，其地位亦隨之下降，故多代失宦或多世低品的支系，其政治社會上的地位與主房無法相比，唐書合鈔卷一一

六高士廉傳中亦謂：「每姓第其房望，雖一姓中高下懸隔。」在另一方面至唐代時大士族房望高者往往不僅一個，有的有十幾個著房，從各族的例子觀察，著房不一定是各族的長房，這一點與周朝「宗法式」有別，宗法制度大宗(主支)占優勢，所謂百世不遷，小宗（旁系）則逐代下降，從南北朝以迄唐代而觀之，房支的興衰與該支子孫官宦顯赫有密切關係，而所謂官宦顯赫實由許多偶然因素造成，沒有一定的規則。因唐代大士族的著支不祇一個，故唐代大士族並非單一主系的官宦型態，各大族有許多主系並列，這些主系皆被社會政治上共認其門第地位，當然這些主系又復有盛衰之變化。從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看，這些主系的盛衰跳動不定，第一時期若是甲主系興盛，至第二代可能另一主系興盛，有時亦有輪換的現象。茲舉新唐書卷七十一上宰相世系表裴氏爲例：其著房有五，卽西眷裴、洗馬裴、南來吳裴、中眷裴、東眷裴。實際上其後南來吳裴又分爲叔業支及令寶支；中眷裴又分爲萬虎、雙虎、三虎支、苞支；東眷又分出道護支。故唐代裴氏著房共有十個主支。若以上品（一、二、三品）爲其盛衰的標記，則各主系盛衰變動如下表：（未計者表示三品以下或未仕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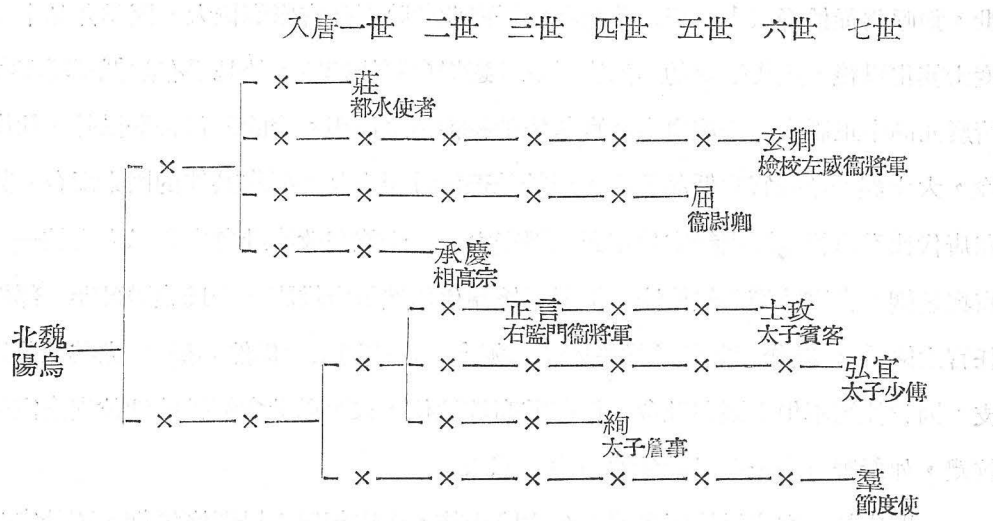
唐代裴氏各主支盛衰表

	入唐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西眷	2	1	1	0	2	0	0	0
洗馬	1	2	3	0	0	1	4	2
南來吳叔業支	0	0	1	2	1	0	0	0
南來吳令寶支	2	1	3	3	0	0	2	0
中眷萬虎支	0	0	0	0	0	1	0	0
中眷雙虎支	2	2	2	0	1	2	0	0
中眷三虎支	0	0	0	1	2	1	1	0
中眷苞支	1	0	2	2	1	1	1	0
東眷	1	1	6	3	4	2	0	0
東眷道護支	1	2	2	1	1	3	1	0
	10	9	20	12	12	11	9	2

除第三世有二十人，第八世僅二人以外，其他各世任官三品以上在十人上下。這並非

由一支構，而是由十支合成，其型態是相間跳動的。

爲了進一步說明這種現象的典型狀況，且舉唐代范陽涿縣盧氏陽烏房爲例（唐代著姓房支之一），並作世系表如下：（新唐書卷七十三上宰相世系表范陽盧氏陽烏房）。



附注：符號「×」代表三品以下或未仕者。

若將該房視爲一個整體看，則其各世居官三品以上者統計爲：

范陽盧氏陽烏房	入唐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三品以上人數	1	1	1	1	1	2	2

每世平均一人以上，以陽烏房的例子而言，雖然每代皆有一人官拜上品，但沒有二人是父子關係，而祇是從父或再從父的關係。入唐第一世盧莊，第二世的承慶是其二從姪。第三世的正言是承慶的四從姪。第四世的盧絢是正言的二從姪。第五世的屈是絢的六從姪。第六世的玄卿是屈的六從姪；另一位士玫是屈的七從姪。第七世的弘宜是士玫的五從姪，另一位羣則是士玫的六從姪。唐代並非沒有父子相襲爲上品官者，但爲例不多，至於能延襲三四世爲三品者，更屬罕見。

若以兩晉南北朝時期與唐代作一比較，前者似乎有主幹房支的型態，例如兩晉南朝瑯琊臨沂王氏各房支之中最華貴的一支，其世系[1]爲：

1. 參見拙文“我國中古大士族之個案研究——琅琊王氏”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第三十七本下册，1967.

導	洽	珣	曇首	僧綽	儉	暕	訓
丞相	中書令	衛將軍	侍中	侍中	侍中	尚書左僕射	侍中
一品	三品	二品	三品	三品	三品	三品	三品

這種現象在唐代各著姓中從未出現過，而兩晉南北朝累世數代居官上品者比比皆是。

在親疏關係上再從當然不如父子叔姪，但地域也有影響，河北重視同宗，三二十世，猶呼爲從伯從叔[1]。親疏關係在兩晉南北朝時對任官影響較大，因爲九品中正制度士族化以後，主支子孫的起家官以及升遷機會可能較優，於是乎有類似循環現象。隋廢九品中正制度，士族由中品官起家的特權不復出現。唐除舉行科舉以外，仕出多途，大士族子弟任官由低品入仕，至於是否能升至上品，要靠其他的因素配合。族望在唐代仕進由絕對因素變成爲相對的因素之一。士族在政治社會中有二大支柱——官宦與婚姻。官宦特權雖然冲淡，但對婚嫁關係仍然努力維護。唐氏族譜已非吏部按譜任官之簿牒，其作用顯然是維護階級婚姻[2]，同族同宗感仍然强烈，尤其是著姓盛支，因爲他們不但企圖在社會上保有其高等地位，又可以社會領袖的地位與皇室分庭抗禮，如新唐書卷一七二杜兼傳附中立傳云：

> 開成初，文宗以眞源臨眞二公主降士族，謂宰相曰：民間修婚姻，不計官品，而上閥閱，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邪！詔宗正卿取世家子以聞！

時已唐代末葉矣！

維持社會地位及維繫疏遠昭穆的法寶，是各士族的譜牒，唐末亂起，許多士族損毀家譜與喪失生命[3]同具社會意義。

---

1. 顏氏家訓第六風操篇。
2. 參見拙文"敦煌唐代氏族譜殘卷之商榷" 史語所集刊第43本第2分，1971.
3. 參見孫國棟"唐宋之際社會門第之消融" 新亞學報 4-1.

第四篇　中古士族性質之演變

（一）

秦漢統一宇內，置全國於一個政權之下，築馳道，開關梁，最受惠者是商賈，他們在廣大地域上周流，交通有無，往返取利，設若從事鐵的開採（鐵是漢朝農工製造工具的主要原料），或鹽的製銷（鹽是民生必需品之一），所謂「冶鑄鬻鹽」，貲產可累積千萬[1]，史記貨殖列傳裏記載三十幾種商業，每種收益皆可比美食邑千戶的封君[2]。這種現象引起統治者不滿，「（漢）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以困辱之」[3]，這都是消極的作法，並不能止住商賈的發展；武帝征伐匈奴，國家所費甚鉅，大司農桑弘羊「民（指農民）不加賦，而國用足」的政策之下，進一步向商賈聚斂，實施新稅[4]，徵收算緡錢[5]，又有告緡令，沒收商賈財產，商人中產以上破產者甚多[6]。漢政府最打擊商賈的辦法，乃是鹽鐵專賣，及均輸平準等法。前者遏止商賈從生產工具及民生必需品中牟利；後者以國家的財力做生意，與商人競爭，取代商人「通有無」的功能，平抑物價[7]。總之，以農業爲主要生產的時代，農爲本商爲末，政權最後抉擇重農輕商，乃極自然之舉，故在西漢前期的重農主義[8]及武帝國有政策之下，商人雖有萬里江山可供其周流，復有高惠呂文景長期太平盛世以養其孳息，但在政治力不斷的壓抑之下，商人徘徊在控制與被利用的曲折道路上[9]，所以自昭宣以降，論者涉及經濟社會問題時，對於土地問題的疾呼，愈來愈盛。土地問題成爲社會問題的關

---

1. 漢書卷二十四下食貨志：「而富商大賈……冶鑄鬻鹽，財或累萬金」。
2. 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序：「酤一歲千釀，醯醬千坻，醬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糶千鍾，薪藁千車，船長千長，木千章，竹竿萬個，其軺車百乘，牛車千輛，木器髹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巵茜千石，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石，其帛絜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蘗麴鹽豉千荅，鮐鮑千斤，鰒千石，鮑千均，棗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按此處千字是不定數，形容極多。
3. 漢書卷二十四下食貨志及同書卷一高帝紀八年三月令。
4. 漢書卷二十四下食貨志：「商賈人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
5. 漢書卷二十四下食貨志：「諸賈人末作貰貸賣買，居邑貯積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算一；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算一。
6. 漢書卷二十四下食貨志：「楊可告緡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氐皆遇告。……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氐破。」
7. 漢書卷二十四下食貨志。
8. 韓復智「兩漢的經濟思想」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出版委員會。
9. 楊聯陞「傳統中國政府對城市商人之統制」刊於清華學報新八卷第一、二期合刊。

鍵，它不但意味着商賈、官僚日漸流入土地兼並的陣營，並且使以地主（地主亦兼營定量商業，如四民月令中所載）爲主的豪族，在中國社會架構上發展出特定的地位。

土地兼幷，起因於民可自由買賣土地[1]，一般認爲始於秦商鞅廢井田[2]，漢前期經濟政策是抑商路線，已如上述，其賦稅政策，則利於擁有土地者，按漢初土地稅三十而一（3.3%），比商稅少半，其原意是減輕農民負擔，但直接受惠者是大地主，因爲地租通常什稅伍（50%）[3]。官稅與地租之間的差額，便是地主的淨利。以人獸力爲主的初級農業生產方式，其淨利有一定的限制，不如商賈累積之速，豪族想獲得大量的淨利，必須：其一土地大量兼幷。其二大量役使佃農或奴婢。兩者是中古農業經濟獲利基礎，也是豪族爭奪的焦點，如漢書卷九十寧成傳：

> 寧成乃貰貸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致產數千萬。

漢書卷五十九張安世傳：

> 張安世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

又如西漢末期南陽樊氏，後漢書卷二十二樊宏傳：

> 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至乃開廣土田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又池魚牧畜，有求必給，嘗欲作器，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使焉。

在中古自然經濟優勢狀態下，豪族在經濟上以自給自足爲目標，這就需要將土地與人力作有組織的安排，一方面使田地佃農奴婢得到充分的利用，一方面可因此獲得各類物品，從田地上的種植，到食物加工、民生手工藝品、衣著、生產工具、藥品、武器、屋舍等，有時也作些有限度的物品交易，務使家族本身成爲一個完整的生產和消費體系，所謂「閉門成市」的境界。上述南陽樊氏，「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是指田地與奴婢的利用；而「起廬舍高閣，陂渠灌注，又池魚牧畜」，

1. 土地可自由買賣，問題頗不簡單。按陳槃師「漫談地券」刊於大陸雜誌第二卷第六期，戰國時中原國家似有地券。
2. 漢書卷二十四上食貨志：「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仟伯，貧者亡立錐之地」。據秦統一中國，毀各國史籍，六國經濟發展，未必遲於秦，可參見前註。
3. 漢書卷二十四上食貨志：「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也。」

則爲了「有求必給」的目標，樊氏的記載，雖能見其規模，語焉未詳。東漢中期崔寔著四民月令，則有較詳細記載可視爲研究豪族內在經濟體系與性質的重要資料[1]，該文陳述崔氏家族全年按月經營生產項目，其農業生產品類極多，有「瓜、瓠、葵、薤、韭、芥、大小葱、蒜、苜蓿、雜蒜、蓼、春麥、蜿豆、冬藍、采求、大豆、胡豆、胡蘇、稬禾、苴麻、薑、黍穄、粳稻、禾、黍、小豆、燕菁、芥、蕈蘆、冬葵、莧菪子、小蒜、乾葵、椹麥、牧宿、胡葱、豆藿」，樹木有「竹、漆、桐、梓、松、柏」，果樹有「杏、桃、棗」；農產品加工有「釀春酒、醬醬、肉醬、清醬、銅魚醬、藏瓜、炒豆、碎豆作末、作麵」又有繕治槃鋤、合耦田器；及張弛角弓弩、竹木弓弩、正縛鎧弦，繕五兵等；又合諸膏、小草續命丸、法藥，生產者當然是崔家的佃農、奴僕，豪族對人力物力的運用，有其經營程序及組織系統，如正月，農事未起，命女紅趣織布。二月，蠶事未起，命縫人浣冬衣，徹複爲袷，其有羸帛，遂爲秋製。六月，命女紅織縑縛，可燒灰染青紺雜色。七月，浣故製新，作袷薄以備始寒。八月，趣練縑帛，染綵色，擘綿治絮，製新浣故。十月，析麻，趣績布縷，作白履、不借。崔氏起於西漢昭帝時，屢有官宦，至東漢中期崔寔時，已有二百多年歷史，經過長期的發達，其經濟自給自足的體系已較完整，其他豪族容或在規模上有大小之別，其類型甚爲相似。

豪族在初期發展及其後的擴張中，對土地兼幷的方式極多，且大部份是長期地、漸進地進行着，正史對於這方面的變動，殊少專卷記載，及至侵犯統治者的利益、或大量危害平民生計時，才有人提出呼籲，所以這方面的具體資料甚難找尋，我們暫以爬梳所得，歸納出下列幾種擴張土地方式。

其一，戰國末期開放土地自由買賣，當是土地私有制的重要關鍵，儘管在中古時有許多人提出防止兼幷的言論，然土地自由買賣，兼幷現象亦必相應而生。擁有少量土地的自耕農，在正常的年頭，其辛勤收穫扣除生活及賦稅以外淨剩餘極低，若遇天災人禍，不得不向豪族舉債，甚或賣出自己田地，正如晁錯所說：「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者」[2]

1. 參考邱漢生"從四民月令看東漢大地主的田莊"。
2. 漢書卷二十四上食貨志，文帝時晁錯之言。

其二，是「豪民侵陵，分田刼假」[1]。分田刼假的意義是政府計口假與貧民的口分田，實際上都被豪强刼奪去了[2]，漢書卷七十二貢禹傳：

……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

實際上漢政府對商賈購買土地有形式上的限制，農民失去的土地大部分皆落入地方豪族之手。

其三，是遷徙或開闢新的肥沃之區，獲得比以前更大更好的土地。華陽國志卷三蜀志汶山郡條：

然秦惠王始皇克定六國，輒徙其豪俠於蜀，資我豐土，家有鹽銅之利，戶專山川之材，家給人足，以富相尙，故工商致結駟連騎，豪族服王侯美衣……若卓王孫家僮千數，程鄭各八百人，而鄒公從禽巷無行人，蕭鼓歌吹擊鍾肆懸富侔公室，豪過田文漢家食貨以爲稱首，蓋亦地沃土豐，奢侈不期而至也。

一般而論，豪族遷徙或開闢新的區域，以邊地爲多，但當中原一帶田地，因特殊原因而有某程度荒蕪時，通常政府皆將其列爲公田，當此時也，亦是豪族發展良機。後漢書載仲長統有見於豪族自取荒地可耕者，曾作下列呼籲，後漢書卷七十九本傳損益篇：

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雖然猶當限以大家，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爲姦也。

在豪族的形成過程之中，由於中古去上古未遠，宗法制度的影響很深。豪族建立一個以血緣爲基礎的單位，是很自然的發展。據芮逸夫先生[3]及許師倬雲[4]對漢代家庭的研究，認爲主幹家族（Stem family）盛行於漢世，以「同居共財」的標準論，主幹家庭只容約一個已婚兒子與父母同居，其餘已婚及成年的兒子分出居住。對於一般平民而言[5]，此論甚是，然從資料所示，漢朝豪族頗有直系家庭（Lineal family）的實例，直系家庭包括同父的已婚諸子。漢代是否以尊長在世爲已婚諸子同居共財的

1. 漢書卷二十四上食貨志，王莽時令。
2. 賀昌羣著「漢唐間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頁30，曾有闡述。
3. 參見芮逸夫「遞變的中國家族結構」刋於臺大考古人類學刋 17-18 合刋。
4. 參見許倬雲「漢代家庭的大小」刋於清華學報，慶祝李濟先生七十歲論文集下册。
5. 同註 4，頁799，所舉四個例子，可作爲大族代表。

要件，則無明確的證據。總之，像魏晉以後那樣的大家族，似乎在漢代正在發展中。直系家庭是豪族倫理體系的基本單位[1]，以此爲核心，對於宗族親戚作層次的連繫。如崔寔四民月令中記載石漢聲校注本：

> 正月之旦，是謂正日，躬率妻孥，絜禮祖禰。……及祀日，進酒降神，畢，乃家室尊卑，無小無大，以次列坐於先祖之前，子婦曾孫，各上椒酒于其家長，稱觴擧壽，欣欣如也（二月、六月、十一月亦有祀祖）。

從核心家庭的祭祖及和睦作起點，推衍到「九族」的連繫，同書云：

> 三月…冬穀或盡，椹麥未熟，乃順陽布德，振贍匱乏，務施九族，自親者始。
>
> 九月…存問九族，孤寡老病，不能自存者，分厚徹重，以救其寒。

又推及同宗，同書云：

> 十月…五穀既登，家儲蓄積，乃順時令，敕喪紀，同宗有貧窶久喪不堪葬者，則糾合宗人，共興擧之，以親疏貧富爲差，正心平斂，毋或踰越，務先自竭，以率不隨。

再推及宗族、婚姻、賓旅、君師等，同書：

> 十二月…請召宗、親、婚姻、賓旅，講好和禮，以篤恩紀。
>
> 冬十一月…冬至之日…進酒肴，及修刺謁賀君師耆老如正月。

這種由直系家庭推及九族、同宗、宗族、婚姻、賓旅、君師、耆老的方式，正是承繼周朝宗法制度，以及儒家親疏有等思想的具體實踐。

豪族如果僅以血緣爲其範圍，在人數及財富上都有很大的限制。豪族在擴張其社會影響力的過程中，有二件事實應予重視，其一是婚姻，其二是部曲奴婢，婚姻是一種平行的社會連繫，豪族因婚嫁關係，使兩者之間拉得親近，社會上同等財富的豪族相互通婚的現象，非常自然和普徧。這種橫面牽連常常構成很大的勢力網。當然以婚姻爲連繫力量並不能保證兩族間必然會採取同一態度，在以男性爲中心的社會裏，婚姻關係的結果通常較同宗同族爲鬆懈。但是當他們之間有共同利害時，由於婚姻關係的存在，可以使豪族間迅速地結合起來，而構成一個共同的對外勢力。劉秀起兵，母

1. 同上頁註4。

黨樊氏、妻黨陰氏、姊婦鄧氏等，皆舉族響應[1]，地皇四年王莽詔有云：「劉伯升（縯，秀之兄）與其婚姻黨與妄流言惑衆，悖畔天命」。

部曲奴婢是一種上下關係的社會連繫。奴婢固且不論，因自古被視爲私產，是主人直接控制的人。部曲也者，楊忠一認爲在漢末三國時期，已從士卒隊伍的意義轉化爲私兵的身分[2]，金發根先生認爲在東漢初年就有轉變私兵的跡象，並舉銅馬等各領部曲，及李寶被殺後其弟收寶之部曲報仇爲例[3]，金說甚是。賓客、門生亦流行於兩漢，其地位亦漸漸下降[4]。部曲、賓客、門生等身分之低落趨向，與豪族勢力上升恰好成反比例地演進，漸漸地演變成在政府與人民之間，多出一層社會階層——豪族。我們知道在農業社會裏，大部份都是安份守己的農民，其中常常分化出一小部份人，或因家中人多地少，或因生性不喜務農，或因其他原由，這一小部份人與城市裏分化出的游手好閒之徒常常殊途同歸，成爲社會中的寄生者，此輩很容易被豪富吸收，成爲部曲、賓客等，原本僅僅個別的游離體，如今結合在一個一個豪族的家門中，成爲豪族的爪牙。此外，替豪族耕地的佃農，在法律上是自由民，理論上與豪族的關係是納田租，然而中古力役地租的型態並未完全脫去[5]，佃農除交納田租以外，每常爲豪族作些力役雜事，這些人實際上受豪族人身與經濟雙重約束，當政治社會有亂變時，他們也很自然地亦屬豪强勢力中的一份子。

豪族所擁有的勢力，與皇帝所掌握的政治力，常常徘徊在衝突與妥協之間。例如漢書卷九十酷吏傳記載：

> 郅都：「……濟南瞯氏宗人三百餘家豪滑，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拜都爲濟南守，至則誅瞯氏首惡，餘皆股栗」。
>
> 周陽由：「由居二千石中最爲暴酷驕恣，所居郡必夷其豪」。
>
> 義縱：「爲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遷爲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

---

1. 參見後漢書列傳卷二十二陰識傳、卷五鄧晨傳、卷二十二樊宏傳等。
2. 參見楊忠一"部曲沿革略考"食貨半月刊一卷三期。
3. 參見金發根"永嘉亂後北方的豪族"頁25。
4. 同註3，第二章第二節東漢門生故吏部曲賓客地位的改變。
5. 參見四民月令。

又如後漢紀卷四建武四年條記載：

> 鬲縣五姓反，逐其守長。諸將曰：「朝擊鬲，暮可拔也」。（吳）漢怒曰「敢至鬲下者斬，使鬲反者守長罪也」。移檄告郡牧守長，欲斬之。諸將皆竊言，不擊五姓，反欲斬守長乎？」漢乃使人謂五姓曰「守長無狀，復取五姓財物，與寇掠無異，今已收繫斬之矣！」五姓大喜，相率而降。（按後漢書吳漢傳注：「曰五姓蓋當土强宗豪右也」）

綜合以上所述，初期地方豪族有以下幾個特點。其一、經濟性：其社會地位的建立，起初在於獲得比一般人有較多的財富，而從土地上獲利是最普遍的現象。除此以外，還有若干人從工商業中獲得財富，在人數上沒有大地主多，但有時也顯得很活躍。地方豪族是當時社會上財富競爭的勝利者，他們所重視的是如何保持現有的財富，並企望進一步如何擴張其財富，政治、文化等活動是達成這項目標的手段，經濟是最原始目的，如東漢光武帝劉秀起兵時，姻親樊宏從征，樊氏其他親友認爲家財已足，不必作如此冒險，是很明顯的心理寫照。其二、是區域社會性，以土地爲根本的豪族，勢將局限於一定的區域之中，因各地物產環境不同，而又具有不同的地方性色彩。豪族以宗親血緣爲連繫力，表明其社會性的特質。其三：武質團體：在平時是自衞團體。在亂時是戰鬪單位，如東漢開國時大族參與光武集團[1]；曹操南征北伐，亦以地方豪族從征爲骨幹[2]。

（二）

兩漢士族凝成，乃由於社會勢力之存在，掌握政治權力的皇帝爲增强其社會基礎計，自西漢昭宣以降，採取吸收社會勢力參與政權的辦法[3]而啓其端。以農業生產爲主的社會中，擁有土地者常常又是擁有社會勢力者，故地方豪族成爲被吸收的對象。一端是代表政治力的皇帝；一端是代表社會勢力的地方豪族；二者間的結合需要透過某些媒介，而這種媒介的存在，又必需在政治社會領域中完成重要的功能，才能長久。官僚與士大夫是居於這二極之間的媒介人物，在兩漢三百年來大致安定的政治社會中，他們一直扮演着中間角色的功能，長期間的發展，使這批中間人構成一個特殊

1. 參見余英時“東漢政權建立與士族之關係”。
2. 參見拙文“三國政權的社會基礎”。
3. 參見許倬雲“西漢政權與社會勢力的交互作用”史語所集刊第35本，1964.

的團體與社會階層，地方豪族之士大夫化，以及士大夫之家族化，走向了中古士族之道路。

地方豪族之士族化，可由下列例子中看出。

漢書卷七十八蕭望之傳：

家世以田爲業，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後爲丞相）。

漢書卷七十一平當傳：

祖父以訾百萬，自下邑徙平陵。當少爲大行治禮丞，功次補大鴻臚文學，察廉爲順陽長，枸邑令，以明經爲博士。

漢書卷七十七鄭崇傳：

本高密大族，……祖父以訾徙平陵。父賓，明法令，爲御史。……崇少爲郡文學史，至丞相大車屬。

華陽國志卷四南中志牂牁郡條：

公孫述時三蜀（牂柯郡）大姓龍、傅、尹、董氏……明章之世，毋斂人尹珍字道眞，以生遐裔未漸庠序，乃遠從汝南許叔重受五經，又師事應世叔學圖緯，通三材，還以教授，於是南域始有學焉。珍以經術選用，歷尚書丞郎、荆州刺史，而世叔爲司隸校尉，師生並顯。

漢書卷八十一張禹傳：

河內軹人也，至禹父徙家蓮勺。……卜者謂禹父曰：是兒多知，可令學經，及壯，至長安學，從沛郡施讎受易，瑯琊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衆，舉爲郡文學。……代王商爲丞相，……家以田爲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溉灌，極膏腴上賈（師古曰，賈讀曰價）。

兩漢士大夫階層之養成是經過長時期的，而扮演改變性質的養成所，首推太學與公私立教授。太學創設於武帝，原提案人是董仲舒，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云：

董仲舒對策曰；養士……莫大於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以得矣！……武帝立學校之官……皆自仲舒發之。

按初置五經博士，博士弟子在武帝元朔五年僅五十人而已，此後發展神速，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

> 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爲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吏。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

又前漢紀卷三十載，平帝元始四年，王莽「爲學者築舍萬區」云云。太學生每代以等比級數增加，至少在推進經學方面，有巨大的社會功能。學成士大夫並非最終目標，通經能被任用爲官吏，這是很誘惑人的，元帝以後「通一經皆復」，所謂利祿所在，趨之若鶩，故漢書韋賢傳記載，當時鄒魯所流行的諺語「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郡國有學官，始於文翁（漢書卷八十九），元帝更令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吏。私學亦頗有人，如云敞、疏廣、朱博、翟方進、珪孟；後漢有王良、劉昆、夏恭、劉茂、索盧放、伏湛、承宮；分見於本傳或儒林、文苑、獨行列傳。接受教育成爲時尚，文化的培養又成爲各種人物結合融化的大熔爐。博士弟子的社會成分大都已不可考，然而一般平民（大部份是農民）的子弟無錢無閒獲得教育（極少數例外），能够獲得受教育機會的必定家頗富於財，前文所舉便是明證。地方豪族子弟走進士大夫階層是一波波的改造與推進。地居中原一帶的豪族，比較容易獲得公私教育機會，而邊區地帶則較困難。所以並非所有的地方豪族都在變，他們因時、因地、因人的差異，而有種種程度之別，機緣最好的地方豪族，不但接受教育，並且擠身爲官僚階層，如潁泗、山陽之地，於是乎身兼官吏、士大夫、地方豪族的身分。亦有僅遊學京師，一直以官吏候選人的身份存在於京師與地方之間。然而，大部的豪族，在兩漢三百年來，或多或少都感受到儒家的影響，這種影響使得原本武質的地方豪族，兼備了文儒的性質。

地方豪族的轉變除了因利祿的誘力以外，政治的壓力也產生推動作用，尤其是當强而有力皇帝主政時，更加明顯，從刺史所賦予的責權觀察，自武帝元封五年初分十三州刺史，在西漢一朝皆主地方政府監察之任，漢書卷十九百官公卿表注引漢官典職儀：

> 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卽不省。一條、强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强凌弱，以衆

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姦。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苛暴，剝截黎元，爲百姓所疾，山崩石裂，祆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賄賂，割損政令。

其中第一條與第六條是症對着地方豪族，由刺史促令郡太守負責。兩漢酷吏傳中人物，是負責推行中央政令，記載着許多鎭壓地方豪族的事蹟。而循吏傳中人物，其主要功績則在於推廣教化。漢政府軟硬兼施的兩面手法，加速了改變地方豪族的作用。這並非意味着所有豪族都因而改變其性質，一方面是漢政府沒有如此巨大的行政能力。二方面是地方豪族遍佈全國各個角落。能够獲得士族化的地方豪族，則由經濟性的特質進而兼具學業文化的特質。而那些邊陲地區的地方豪族，則仍然保持其土皇帝的嘴臉[1]，介於此兩端者，便有種種不同程度的排列。

（三）

地方豪族另一項性質上的重大改變，厥爲由區域性進入中央性。地方豪族演變成士族，需要包涵學業品德，有的甚至兼具官吏資格；這並非每一地方豪族都能有的機會，所以除部份脫穎而出外，大部份豪族仍然停留在各地方，繼續成爲地方領袖，華陽國志是現存記載較詳的古地方志，對於巴、漢中、蜀、南中諸郡的地方豪族均有提及，如該書卷一巴志臨江縣：「枳東四百里，接朐忍，有鹽官在監塗，二溪一郡所仰，其豪門亦有鹽井，又嚴、甘、文、楊、杜爲大姓」。又同書卷三蜀志汶山郡成都縣：「大姓有柳、杜、張、郭、楊氏；富先有程、鄭、郤公，後有郭子平；奢豪楊伯侯兄弟」又同書同卷廣都縣：「郡西三十里，元朔二年，置有鹽井漁田之饒，大豪馮氏有魚池鹽井」。這些「大姓」、「豪門」、「富」室、「奢豪」、「大豪」等名詞亦反映出社會性、經濟性、武質特點，這都是縣級地方豪强，從魏晉南北朝史書觀察，絕大部份都未進入士族，他們是社區領袖。另一方面，至東漢末葉士族之凝成，孕育出另一種社會領袖。黨錮成爲重要的轉捩點，由於這個事件加速了士大夫間的交流，交接之風，無代無之，其對於政治社會產生影響，則應視其參與人物的社會勢力强弱而

1. 參見三國志吳志步騭傳。

定，而交接頻率增加，則又可以加速和擴大其對社會的影響力。東漢末葉交接之風甚熾，正如徐幹中論譴交篇所說：

> 桓靈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賓客爲務，冠蓋塡門，儒服塞道。饑不暇餐，倦不獲已，殷殷沄沄，俾夜作晝。下及小司，列城墨綬，莫不相商以得人，自矜以下士，星言夙駕，送往迎來，亭傳常滿，吏卒傳問，炬火夜行，闇寺不閉。

專制政體時代，交接被統治者視爲壞事，因爲交接在傳播工具不發達的社會裏，是主要的人際溝通方式，也就是朋黨形成的先決條件，其功能甚爲巨大。黨錮事件以前，京師太學成爲士大夫交接中心，其人物實包羅全國各主要州郡，據金發根先生東漢黨錮人物的分析一文臚列的黨人籍貫所示[1]，其地理分配非常廣泛，如下：

司隸。河南郡三人，河內郡一人，弘農郡三人，京兆五人，扶風一人。

豫州。潁川郡二十一人，汝南郡十七人，梁國一人，沛國五人，陳國三人，魯國四人。

冀州。魏郡二人，中山郡二人，河間郡三人，清河郡一人，渤海郡五人。

兗州。陳留郡十五人，東郡二人，東平郡二人，任城郡一人，泰山郡一人，山陽郡二十八人。

徐州。東海郡一人，瑯琊郡一人，彭城郡一人，下邳郡一人。

青州。平原郡二人，北海郡一人，東萊郡一人。

荆州。南陽郡六人，南郡二人，江夏郡二人，桂陽郡一人。

揚州。廬江郡二人，會稽郡二人，吳郡一人，豫章郡一人。

益州。漢中郡二人，巴郡一人，蜀郡二人，犍爲郡一人。

涼州。安定郡一人，敦煌郡二人。

幷州。上黨郡一人，太原郡八人。

幽州。漁陽郡一人。

交州。無。

另八人未詳。

---

1. 金發根“東漢黨錮人物的分析”史語所集刊，第34本下册，1963.

以上分析，黨錮士大夫以豫州的潁川、汝南，及兗州的山陽最多，但全國除交州以外，皆有人物。故此次運動(太學生對抗宦官)是平面極廣的運動。世說新語雖是二百年後劉宋時臨川王劉義慶所作，實記載黨錮後常被士族所傳聞的逸聞佚事，從世說新語中所得二十三條人物間交接事例來看[1]，士大夫似已超越區域的界線。這些例子大部份列入卷一德行篇，所謂德行實際上很難提出具體的表現，士大夫間除了相互捧場外，最值得重視的是對於交接本身亦大讚特讚，如「陳太丘(寔)詣荀朗陵(淑)，貧儉無僕役，乃使元方(紀、寔長子)將車，季方持杖從後，長文(郡)尚小載著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箸鄰前，于時太史奏眞人東行(檀道鸞續晉陽秋曰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父子，于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2]。士大夫超越區域界線，而構成一體的現象，亦可由張儉逃亡事件中發現，後漢書卷六十七張儉傳：

> 趙王張耳之後也，父成，江夏太守。……結仇(侯)覽等，鄉人朱並素性佞邪，爲儉所棄，並懷怨恚，遂上書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爲黨，於是刋章討捕，儉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後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歎息而去，篤因緣送儉出塞〔(集解)惠棟曰袁紀篤導儉經北海戲子然家，遂入漁陽出塞〕，以故得免，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宗親並殄滅，郡縣爲之殘破。

這些士大夫似已成爲全國性大社會領袖，其後袁紹去董卓東奔，亦甚類似。黨錮事件，促使士大夫結合在一起，最後超越了地域性，而成爲大社會領袖，又可從他們之間互捧的讚語中看出區域性已經昇華了，如下[3]：

天下忠誠竇游平(武)	天下德弘劉仲承(淑)
天下義府陳仲擧(蕃)	以上三君。
天下模楷李元禮(膺)	天下英秀王叔茂(暢)

1. 參見世說新語上卷各篇。
2. 參見世說新語上篇德行篇。
3. 陶潛「羣輔錄」漢魏叢書第三十六册。

天下良輔杜周甫（密）　天下水凌朱季陵（寓）
天下忠貞魏少英（朗）　天下好交荀伯條（翌）
天下稽古劉伯祖（祜）　天下才英趙仲經（興）
以上八俊。

天下和雍郭林宗（泰）　天下嘉恃夏子治（馥）
天下英藩尹伯元（勳）　天下清苦羊嗣祖（陟）
天下瑰金劉叔林（儒）　天下雅志蔡孟喜（衍）
天下臥虎巴恭祖（肅）　天下通儒宗孝初（慈）
以上八顧。

海內貴珍陳子鱗（翔）　海內忠烈張元節（儉）
海內謇諤范孟博（滂）　海內通士檀文有（敷）
海內才珍孔世元（昱）　海內彬彬范仲眞（康）
海內珍好岑公孝（晊）　海內所稱劉昇升（表）
以上八及。

海內賢智王伯義（商）　海內修整蕃嘉景（嚮）
海內貞良秦平王（周）　海內珍奇胡毋季皮（班）
海內光光劉子相（翊）　海內依怙王文祖（考）
海內嚴恪張孟卓（邈）　海內清明度博平（尙）
以上八廚。

所謂「天下」、「海內」也者，其內心已認爲全國爲一大社會的意識甚明。不獨此也，從史書中發現他們所注意的事情，亦以學業品德[1]及全國性利益爲多，例如世說新語卷一德行篇首段「陳仲擧（蕃）言爲士則，行爲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以天下爲己任的思想，本是儒家修、齊、治、平的一貫理論，並非漢末士大夫唯一特色，然而漢末士大夫在程度上的强調，足以看出部份地方豪族在其凝結成士族的過程中，從區域性的小社會眼界擴大到全國性的大社會領域。

1. 參見世說新語及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尤其列傳之贊語。

（四）

綜前所述，經兩漢三百年漸次演變，暨政治力與社會勢力相互融合，產生一類新的社會階層——士族；這個社會階層在東漢末年黨錮之禍以後，由於同舟共濟，密集交往的結果，越形凝固，一連串外在改變，最後又引起性質的改變，對於這時期士族性質的演變方向而言，是：由武質團體而兼及文章世家、由地方性人物而中央性人物、由社會體而兼具政治性、由經濟性而形而上的趨向。

近人陳寅恪先生與錢穆先生對士族內在精神都曾有精闢的看法，似亦注意到士族初凝成階段的特性所在，錢穆先生在「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係」（新亞學報五卷二期頁54）中說：

> 今再滙納上面各項敍述而重加以一番綜合的說明，則可謂當時門第傳統共同理想所希望於門第中人，上自賢父兄，下至佳子弟，不外兩大要目：一則希望其所具孝友之內行，一則希望能有經籍文史學業之修養，此兩種希望，並合成爲當時共同之家教。前一項之表現，則成爲家風，後一項之表現，則成爲家學。

略言之，士族之家風與家學成爲其主要特性矣！陳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政治革命與黨派分野頁54亦云：

> 夫士族之特點既在其門風之優美，不同於凡庶，而優美之門風，實基於學業之因襲，故士族家世相傳之學業乃與當時之政治社會有極重要之影響……。

學業之中，更以經學爲重，錢穆先生在該文中曾分析當時士大夫所作的典籍，云「若以著作數量作爲當時對經學中某一部份重視與否之衡量標準，則此時代之經學最重禮、次春秋、易居第三位」（同書頁27）。禮的實踐，在個人與家族方面，表現於孝行的重視，成爲團結家族的法寶。在另一方面，「然其與政治之關鎖仍循其東漢以來通經義勵名行以致從政之一貫軌轍」（陳寅恪文）。一言以蔽之，經學是溝通個人、家族、國家的方法，經可以指示人在三者之間如何扮演角色。經大部份是儒家所定出的法則，禮是儒家理想的實行方式，我人雖不可說儒家的精義盡在於此，至少當時人對於禮的實踐非常賣力，尤其在孝行方面，表面上近乎澈底。總之士族以經作爲內涵要件，成爲其主要的特質。無怪乎錢穆先生云「門第即來自士族，血緣本於儒家，苟儒家精神一失，則門第亦將不復存在」（同上書），錢氏之言，已指出初期士族性質之

主流。

士族中央化過程——從地方而中央，在漢末已表現得很明朗，但最重要的還是思想上從區域性進入全國性，這是地方豪族蛻變成士族的關鍵，也是中古士族的特性之一。中央化可以獲得更多的機會在中央或州郡任官，但並非指全部可以任官，許多人物享譽於朝野，而並不兼具官吏身份。有一點特別强調的是：士族子弟在這時期雖然出任官吏，並沒有脫離其社會性，這與純官僚有極大的差別。自永嘉亂後，士族分散各地，有的甚至到邊陲地帶，如河西、遼東、嶺南等地。要之，這一類人在精神上已經結成一體，含有同類感，成爲一個特殊社會層，他們在思想與言行方面，於其與同地區地方人士相同，毋寧與他郡士族較近[1]。這羣人所具有超地區的想法與行爲法則，實是中央化過程以後無法再抹去的士族特色之一。

僑姓南遷以後，遠離原籍，雖累世堅持原籍地望，可是實際上已是可望而不可及，逼立僑州僑郡形式上滿足了他們心理要求，從社會意義而言，他們居住南方，與南方政權之間發生特定的社會連繫，長期失去原籍的社會基礎，在南方一直無法像吳姓一般地盤根錯節，於是乎他們愈來愈依賴中央政府，也就是說，原本兼具社會及政治性的僑姓人物，漸漸走向單一的政治方向，步入官僚，依賴中央在南朝時更加明顯，顏氏家訓第十一涉務篇：

> 江南朝士，因晉中興，而渡江，本爲羈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資俸祿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僕爲之，未嘗目觀起一壠土，耘一株苗，不知幾月當下，幾月當收……。

這與「四民月令」中所記述有很大差異，有的僑姓在南方亦建有大莊園，然這與原籍性質上不同，在南方所建立的莊園似乎專供揮霍享樂之用[2]，僑姓大都居住在京師附近。

僑姓與三吳會稽文質士族之間，縱有差異之點[3]，就其大處衡量，仍屬大同小異。緣因三吳會稽文質士族原本亦是崇尚經學的世家，如陸氏、虞氏、姚氏，其與中原一帶世家大族所崇尚的經學，原出一轍，所以當僑吳姓文質士族接觸之時，吾人看不出在思想學術上有多大的衝突，在初期相處階段地域觀念的差異遠勝過文化上的小

1. 參見拙文「三國政權的社會基礎」末段。
2. 如宋書卷五謝靈運傳所述的田園。
3. 參見何啓民"永嘉前後吳姓與僑姓關係之轉變"政大學報第26期，1972.

別。這一點從王導對地域界線所採取的政策可以發現[1]，地域差異的互容與文化因素的共同感，是東晉立國的重要凝固力；在另外角度，僑姓與三吳會稽文質士族在性質轉變上，亦有若干共同的傾向，此點後文再予細論之。

上文曾述，南方人物有其復雜性，除了三吳會稽文質士族以外，武大姓是另一類重要人物，他們的性質與三吳人物有異，東晉南朝政權對他們的重視程度，不亞於三吳會稽文質士族，拙著「兩晉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統計吳興武康沈氏在東晉南朝僅次於瑯琊臨沂王氏、陳郡陽夏謝氏，而居官人數共達四十五人。按沈氏可作爲南方武大姓的代表人物，且以其爲例，觀察武大姓性質之演變。

據唐書卷七十四上宰相世系表云：吳興武康沈氏係後漢光祿勳沈戎之後，戎子酆零陵太守。酆子景、河間相。姓纂卷七景子彥。彥子規。以上皆無事蹟可查，入晉以來，以沈充首見於列傳，晉書卷九十八王敦列傳中附沈充傳云「少好兵書，頗以雄豪聞於鄉里，（王）敦引爲參軍」。爲部將吳儒所殺。晉書卷八十九忠義傳云：「（充子勁），竟殺讎人」亦以義勇聞，後爲慕容氏所害。宋書卷六十三沈演之傳：「高祖充，晉車騎將軍吳國內史（按晉書卷九十八王敦傳附沈充傳注晉陽秋曰：敦克京邑，以充爲車騎將軍吳國內史）。曾祖勁、冠軍陳祐長史戍金墉城，爲鮮卑慕容恪所陷，不屈節見殺，追贈東陽太守。祖赤黔廷尉卿。父叔任，以平蜀全涪之功，封寧新縣男食邑四百四十戶，出爲建威將軍益州刺史……家世爲將，而演之折節好學，讀老子日百遍，以義理業尚知名……。子勃好爲文章，善彈琴，能圍棊，而輕薄逐利，歷尚書殿中郎，太宗泰始中爲太子右衞率，加給事中，時欲北討，使勃還鄉里募人，多受貨賄，上怒下詔曰，沈勃琴書藝業口有美稱，而輕躁耽酒，幼多罪愆，比奢淫過度，妓女數十，聲酣放縱，無復齊限，自恃吳興土豪，比門義故，脅說士庶，告索無已，又輒聽募將，委役還私，託注病叛，遂有數百，周旋門生，競受財貨，少者至萬，多者千金，考計贓物二百餘萬，便宜明罰敕法，以正典刑。……復爲司徒左長史，爲廢帝所誅」。沈懷文從兄曇慶，宋書卷五十四載：「宋大明元年督徐兗二州及梁郡諸軍事輔國將軍徐州刺史……本州大中正，三年遷祠部尚書。……世以長者稱之。」宋書卷八十二沈懷文傳謂「懷文少好玄理，善文章，嘗爲楚昭王二妃詩，見稱於世。……何

1. 晉書卷六十五王導傳。

尙之設祖道，文義之士畢集，爲連句詩，懷文所作尤美，辭高一座。……遷尙書吏部郎、侍中……撰南越志及懷文文集並傳於世」。

另一房沈慶之，宋書卷七十七本傳載：「少有志力，孫恩之亂也，遣人寇武康，慶之未冠隨鄉族擊之，由是以勇聞」，其後轉戰各地，官拜太尉，賜死。子文叔。文叔子昭明，亦自殺。慶之第三子文耀，文耀子五兵尙書毅，毅子梁左民尙書僧晏，僧晏子梁東陽太守巡。似以文質傳家矣！尤其巡子君理，據陳書卷二十三載：「(君理)美風儀，博涉經史，有識鑒。……太建五年官至尙書右僕射領吏部侍中，君理第五弟君高，於太建八年詔授持節都督交廣等十八州諸軍事寧遠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嶺南俚獠世相攻伐，君高本文吏，無武幹，推心撫御，甚得平和」。其他諸房支在梁陳以降，亦多文士。如陳書卷十八沈衆傳云：好學頗有文才。陳書卷十九沈烱傳云：少有雋才，荆州陷，爲西魏所虜……魏人愛其文才而留之。陳書卷三十三儒林傳所載，「沈峻及其子文阿。沈休稚及其子山卿，其孫洙」，皆通五經章句文史之士。

從吳興沈氏主要人物事蹟觀察，這個家族的特質，已逐漸地從武而文，如義興陽羨周氏，曾顯赫一時，這類武大姓若不及時改變爲文質士族，很容易與其他政治勢力相衝突，而導至覆滅。

在東晉南朝時期，就士族整體而言，也有偃武就文的傾向。漢末曹魏西晉之際，士族雖以經學家風爲其內涵，爲官爲宦，甚多文武兼備，如漢末大族袁氏，有袁紹袁術。瑯琊諸葛氏之誕、亮、瑾，分仕魏、蜀、吳，皆曾掌大軍。河內司馬氏之懿、昭、師，曾轉戰各地，掌兵權，最後卒以此篡魏。潁川鍾會以平蜀聞於世。泰山羊祜鎮守南界，有名於魏吳之間。瑯琊王敦在永嘉亂時爲揚州刺史左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節，成爲東晉立國的主要軍力，又如汝南周馥、周訪，范陽祖逖，高平郗鑒等。著者曾依吳廷燮歷代方鎮年表，統計都督及刺史任期，觀察宗室士族、小姓、寒素等社會階級在東晉、宋、齊、梁、陳軍權之消長[1]。

在東晉的四個階段中，士族掌兵權的比例約在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九十四之間，宋齊降爲三分之一；梁又降至四分之一；陳代則落入六分之一，顯示出士族急速退出軍事舞臺。如果以「族」爲單位，從士族子弟曾否出現於某時期，觀察其退出與加入

1. 參見拙文"五朝軍權轉移及其對政局之影響"清華學報新八卷一、二合期。

軍事舞臺的比例，亦可發現變動頻率甚大，而主要的趨向是士族退出者多，加入者

期　　間[1]	士族總數變遷	退出士族		加入士族		變遷頻率 %
		N	%	N	%	
1-2	15-19	2	9.5	6	28.5	38
2-3	19-12	9	42	2	10	52
3-4	12-17	1	6	6	33	39
4-5	17-17	8	29	8	29	58
5-6	17-16	7	30	6	26	56
6-7	16-12	7	36	3	16	52
7-8	12-12	3	20	3	20	40
8-9	12-6	6	50	0	0	50
9-10	6-2	4	67	0	0	67

少。加入者比例逐漸減少，正表示該文所示三十四大士族漸漸退出軍事舞臺之痕跡。

士族逐漸退出軍事舞臺的原因甚多，以東晉南朝而論，南方空間結構與朝廷中士族的地位，一直處於權力競爭與均衡維持的局面之下，每一次均衡之破壞，皆引起若干參與的大士族消亡，所以大士族父兄皆喜子弟尙文，如晉書卷六十五王導傳載：

> 六子悅、恬。……悅弱冠有高名……少侍講東宮，恬少好武，不爲公門所重，導見悅輒喜，見恬便有怒色。

顏氏家訓卷十四關有誡兵專章，陳述顏氏祖先崇武者「皆罹禍敗」，「此皆陷身滅族之本也，誡之哉！誡之哉！」，所以南朝至梁世，士大夫皆不尙武，如顏氏家訓涉務篇第十一中所形容：

> 梁世士大夫，皆尙褒衣博帶，大冠高履，出則車輿，入則扶持，郊郭之內，無乘馬者。周弘正爲宣城王所愛，給一果下馬，常服御之，擧朝以爲放達，至乃尙書郎乘馬，則糺劾之，及侯景之亂，膚脆骨柔，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復，性既儒雅，未嘗乘騎，見馬嘶歗陸梁，莫不震慴，乃謂人曰：正是虎，何故名爲馬乎，其風俗至此。

（五）

北方漢姓士族，其性質上是郡級地方豪族，自拓拔魏吸收他們加入政權以後，他

1. 此處分期係按拙文"五朝軍權轉移及其對政局之影響"文中所定標準。

們從社會領袖跨越政治領袖，然而這並非立即放棄其原有的社會勢力，有見於永嘉亂後北方長期紊亂，祇有聚宗自衞才能渡過災難，士族對其原籍一直引爲重要的根基；北魏吸收他們加入政權，亦因爲要借重於他們的地方聲望。這種覺悟也促使他們重視同宗[1]。胡漢之間的關係，雖然經雙方努力改善，不能不承認其間甚爲微妙，拓拔氏一方面希望借重他們社會地位以穩定社會，一方面雅不欲他們地方勢力過於强大，成爲尾大不掉的局面。如世說新語卷六雅量篇引祖約別傳：

> 約字士少，范陽遒人，累遷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鎭壽陽，與蘇峻反，峻敗，約投石勒。約本幽州冠族，賓客塡門，勒登高望見車騎，大驚。又使占奪鄉里先人田地，地主多恨，勒惡之，遂誅約。

事雖發生在石勒時，而北魏有崔浩之禍，其理甚近。

如以中原漢姓士族而言，北魏時顯已大量兼具政治領袖的身份，並沒有完全走入官僚體系。與南方相比較，北朝士族似乎大部份都是「城市鄉村之雙家型態」[2]。

孝文始有百官俸祿，對於士族中央化有促進作用，有些士族、或有些士族中的某些房支，已有官僚化的傾向，然此時北魏已過一百年，所剩僅五十年。再者地方聲望之消失，要經過數代時間；房支之間的疏遠，亦需多世之後。所以吾人祇能說，在北魏後半期，漢士族中央化已有開始的痕跡，大部份漢士族兼具中央與地方勢力。參見第三篇第42頁隋書載博陵安平崔氏之例。

北魏政權之中，胡姓士族由社會性轉變爲政治性，由地方性轉變爲中央化的趨向，比漢士族更爲明顯。緣因北魏胡姓的三十六國，九十九姓，原爲朔土舊部落大人，是遊牧民族的部落單位，充分含有地方性與社會性。待拓拔氏建立政權，這一批部落成爲圍於元氏的政治性人物。初都代郡時他們稱爲代人，孝武南遷洛陽，大部份隨至洛陽，又稱洛陽人，隨着北魏政權領袖的强化，社會領袖由部落酋豪變成宗主督護，再由宗主督護而演變爲三長。對胡姓部落而言，表示其社會勢力之日漸減弱，而與編戶無異，另一方面，孝文厲行漢化以後，百官有祿，將部落大人後裔[3]定出姓

1. 顏氏家訓卷六風操篇導論。
2. Wolfram Eberhard「Conquerors & Rulers」導論，1965年修正版。
3. 魏書卷一一三官氏志載。

族，而成爲官吏候選人。就社會意義而言，胡姓與漢姓不同，胡姓由代而洛，數世依附中央，部落解散，已無基本社會勢力，當此時也，他們走進了政治圈卽意味着變成官僚體系的一部份，也就是本文所謂中央化了。

然而，部份胡姓仍有居住在北方沿邊者，遷都洛陽以後，與中央愈來愈隔絕。如北齊書卷二十三魏蘭根傳：

> 尙書令李崇爲本郡都督，率衆討茹茹，以蘭根爲長史，因說崇曰：緣邊諸鎭，控攝長適，昔時初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强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後，有司乖實，號曰府戶，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宗舊類，各各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

這些緣邊的地方勢力，斷絕了中央化，與洛陽政治中心相隔，最後導致「六鎭之叛」。魏分東西。西魏宇文氏當政，由弱勢變爲優勢，正如上篇所示，因爲宇文氏的府兵制度能結合地方勢力。並使地方勢力中央化，宇文氏「關中本位政策」包羅了胡漢兩族，其社會勢力政治化，地方勢力中央化更爲普及。這時期崛起的胡漢士族，成爲西魏、北齊、楊隋、及初唐統治階層的主體[1]。其性質之演變，在隋唐部份論之。

士族文武性質之轉變，北朝胡姓比較明顯。拓拔魏及其隨同入主中原中部落，善弓馬騎射，原以武勇而有天下，然而，治理國家時，文治勝於武功。此所以跖拔氏自始吸引漢族士人參與統治。同時在另一方面，胡姓亦開始學文，這是漢化的重要部份，至孝文帝時，由於孝文積極推展，以及北魏積百年來風氣已成，所以州郡鄉里都瀰漫着一片學術氣氛，趙翼二十二史箚記北方經學條，北方經學比南方尤盛云，當指孝文以後，在這種潮流之中，使許多胡姓亦傾向於學術，其中變遷，並非一朝一夕可成，要之，有關一個家族性質的轉變，要以代（Generation）爲單位來觀察，因爲在中古時期，一般社會的變動速率並不很大，要接受一種較爲生疏而又涉及性質改變時，似乎要透過孩童時期的教育，所以轉變是緩慢的。從北魏胡姓士族而論，他們雖然吸收漢文化，而日趨於文質，由於種族關係，他們並沒有立刻拋棄其武質，因爲軍權乃是胡人政權的基石。就北魏政權核心家族而論，其文質傾向的速率，並不一定快

1. 陳寅恪先生所創名詞，參見「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於他族，其一是因爲北魏需要他們掌兵權；其二是他們既是政權的核心，地位獲得較易，並不太渴望於在文學方面入仕。許多年青的子弟繼任父兄的爵位兵權，作爲北魏政權第一級爪牙，東征北伐，或戍守重要地區。例如：

于氏。魏書卷三十一于栗磾傳：

> 代人也，能左右馳射，武藝過人。……襲慕容寶……趙魏平定，太祖置酒高會謂栗磾曰：卿卽吾之黥彭。……轉虎牢鎭大將加督河內軍，尋遷使持節督督兗恒二州諸軍事鎭南將軍枋頭都將。……子洛拔，襲爵，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寧東將軍和龍鎭都大將營州刺史。……（子孫以軍功居高位者甚多，詳見本傳）

長孫氏。魏書卷二十五長孫嵩傳：（大意如下）

> 太祖時來歸，以爲南部大人，累有戰功。太宗時都督山東諸軍事，劉裕北伐，嵩與其對抗於關中，世祖時爲左輔，爵北平王，遷太尉，加柱國大將軍。其子頲，善騎射，襲爵，加侍中征南大將軍。頲子敦，敦子道。皆襲爵而爲將軍。嵩從子道生，亦是太尉。世祖時重要人物，曾從征蠕蠕，並與宋將鏊戰於南方，子抗早卒。抗子觀，觀子冀歸，幼承家業，高祖以後皆是掌兵權人物。冀歸，魏太師、錄尚書事上黨王。子紹遠，紹遠弟澄，（同書卷二十六本傳）。

> 兼具文武，「雅好墳籍，聰慧過人」，然這已是北魏末期，西魏初期了。

有的胡姓由武而文的轉變較快，尤其在北魏後期。如：

陸氏。魏書卷四十陸俟傳：

> 世領部落，曾祖幹、祖引、父突、皆有戰功。俟長子馥，是幹吏。馥子琇，「雅好讀書」。琇弟凱，好學，年十七爲「中書學生」，以功臣子孫曾任文官。子暐與弟恭之，並有時譽，有文章。
>
> 馥弟麗，高宗時領太子太傅，好學愛士，嘗以講習爲業，其所待者皆篤行之流，士多稱之，至孝過禮……自麗以降，如子叡，叡子希道，陸氏兼具文武。尤以文才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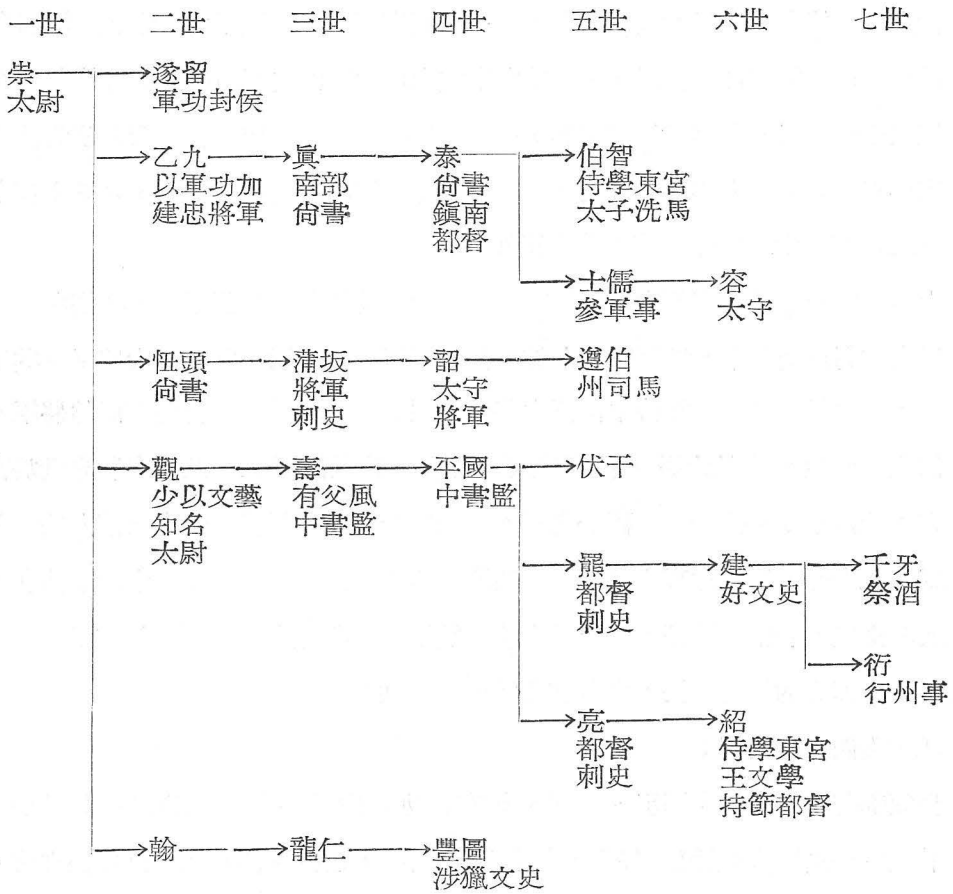
穆氏。在北魏政權中地位甚爲重要，魏書卷二十七穆崇傳云：「其先世效節於神元桓穆之時」，元穆二族交往甚密，穆氏尙公主者最多，如次[1]：

---

1. 參見拙著「兩晉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

穆	盧	司馬	李	陸	崔	鄭	裴	杜	共計
11	3	3	2	2	1	1	1	1	25

且以魏書卷二十七穆崇傳中的世系表爲例，以觀察該家族文武性質之動態。



穆氏與元氏的密切關係，是其走向官僚體系主因，在各族之中，穆氏在高級官吏者甚多。又自崇以降，穆氏大都漸漸兼具文武官職，愈到後世，家族中善於文史者愈多。元氏。北魏皇室急速趨向於文學，又表現於武將的銳減，孫同勛著「拓拔氏的漢化」頁74統計元氏歷代猛將人數及所佔全體宗室百分比表：

帝號	太祖	太宗	世祖	高祖	顯祖	高祖	高祖後
武將%	54%	51.5%	61.5%	47.2%	38.7%	26.7%	38.0%

（六）

關中、山東、南方，由於地區環境不同，政治社會情勢不同，所以士大夫階層的組合與發展也不盡相同。在南北朝末期，有一位顏之推氏在其顏氏家訓中對南北士大夫的差異點，偶有陳述。顏之推係瑯琊臨沂人，九世祖含，從晉元帝東渡，官至侍中右光祿大夫西平侯。父勰，梁湘東王繹鎮西府諮議參軍。之推初仕梁朝鎮西府墨曹參軍，經侯景之亂，又爲後梁散騎侍郎奏舍人事。後梁爲北周軍所破，入周；偷奔北齊，爲奉朝請，官至黃門侍郎。齊亡，又入周，大象末爲御史上士，隋開皇中爲太子學士。(詳見北齊書卷四十五顏之推傳)。以其家世與經歷，他所作的比較應屬可信。茲摘錄於次：

顏氏家訓第四後娶篇：

> 江左不諱庶孽，喪室之後，多以妾媵終家事，疥癬蚊蜇，或未能免，限以大分，故稀鬬閱之恥。河北鄙於側出，不預人流；是以必須重娶，至於三四。母年有少於子者，後母之弟與前婦之兄，衣服飲食，爰及婚宦，至於士庶貴賤之隔，俗以爲常。身沒之後，辭訟盈公門，謗辱彰道路，子誣母爲妾，弟黜兄爲傭，播揚先人之辭跡，暴露祖考之長短，以求直己者，往往而有。

同書第五治家篇：

> 今北土風俗，率能躬儉節用，以贍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

同書第五治家篇：

> 江東婦女，略無交遊，其婚姻之家，或十數年間未相識者，性以信命贈遺，致殷勤焉。鄴下風俗，專以婦持門戶。爭訟曲直，造請逢迎，車乘塡街衢，綺羅盈府寺，代子求官，爲夫訴屈，此乃恒代之遺風乎？〔注：言孝文未遷都以前胡人舊俗也〕。

同書第五治家篇：

> 南間貧素，皆事外飾。車乘衣服，必貴齊整；家人妻子，不免饑寒。河北人事多由內政。綺羅金翠，不可廢闕，贏馬頓奴，僅允而已，倡和之禮，或爾汝之。

同書第六風操篇：

江南人，事不獲已，須言閥閱，必以文翰，罕有面論者。北人無何，便爾話說，及相訪問。

同書第六風操篇：

凡宗親世數，有從父，有從祖，有族祖。江南風俗，自茲已往，高秩者通稱呼爲尊；同昭穆者，雖百世猶稱兄弟；若對他人稱之，皆云族人。河北士人，雖三二十世，猶呼爲從伯從叔。

顏之推以南方與北方士人作比較。實則尚可細分，如南方有僑姓、吳姓，在東晉時頗有分野，南朝以降，其性質上大致趨一，北朝始則有胡漢士族之分，自魏分東西以後，亦另成一系，而表現出獨特性質。故唐朝人論士族異同時，對北周在宇文氏「關中本位政策」之人物，視爲另一單元，有四分之說，新唐書卷一九九柳冲傳云：

山東之人質，故尚婚姬，其信可與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與也。關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達可與也。代北之人武，故尚貴戚，其泰可與也。及其弊則：尚婚姬者先外族後本宗。尚人物者進庶孽、退嫡長。尚冠冕者，略伉儷，慕榮華。尚貴戚者，徇勢利，亡禮教。

「質」者，樸實也。由此發展，則重視婚姬，如上文引顏氏家訓後娶篇、治家篇、風操篇所示，重視正側。推而廣之，則對於同姓同宗的同類感較深，所謂「雖三二十世，猶呼爲從伯從叔」者也。南史卷二十五王懿傳：

北土重同姓，謂之骨肉，有遠來相投者，莫不竭力營贍。王懿聞王愉在江南貴盛，是太原人，乃遠來歸愉。愉接過甚薄，固辭去。

江左之人文，「文」者，華飾也。如顏氏家訓云，其風俗重視「外飾」對人物標準則首重文采，如梁書卷三十三王筠傳云：

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世擅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世者也。沈少傅約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爲四代之史，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瑯琊臨沂）之盛者。

關中之人雄，「雄」者勇壯也，關中自宇文氏結合胡漢士族以來，另發展出一種特性，周書卷十六末：

初魏孝莊帝以爾朱榮有翊戴之功，拜榮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榮敗後，此官遂廢。大統三年，魏文帝復以太祖建中興之業，始命爲之，其後功參佐命，望實俱重者，亦居此職。自大統十六年以前任者凡八人，太祖位總百揆督中外軍，魏廣陵王元欣，元氏懿戚，從容禁闥而已，此外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分掌禁旅，當爪牙禦侮之寄，當時榮盛莫與爲比，故今之稱門閥者，咸推八柱國家云。

故關中集團門閥地位之高低，以政治地位高下爲依歸，其人以冠冕爲重，下列例子，亦可見其一般。

舊唐書卷六十一竇威列傳：

扶風平陸人也，太穆皇后從父兄也。父熾，隋太傅。威家世勳貴，諸昆弟並尚武藝，而威躬翫文史，介然自守，諸兄哂之，謂爲書癡。隋內史令李德林舉秀異，射策甲科，拜秘書郎，秩滿當遷而固守不調，在秘書十餘歲，其學業益廣，時諸兄並以軍功致仕通顯，交結豪貴，賓客盈門，而威職掌閑散，諸兄更謂威曰：昔孔子積學成聖，猶狼狽當時，栖遲若此，汝效此道，復欲何求，名位不達，固其宜矣！

代北之人，原指拓拔魏初入中原時的胡姓，經北魏一百五十年後，大部份同化，一如漢姓；另一部份隨宇文氏入關中，尚保留胡風，降至隋唐，代北之人已無獨特的團體。柳冲所指，當爲北魏時的情況。「雄」與「武」；「冠冕」與「貴戚」；其性質甚近，殊難嚴格分野。

綜上所述，是關中、山東、南方三大區域因形勢不同而發展出不同性質，實則士族乃綜合性的社會領袖，其性質是多方面的，魏晉南北朝隋唐士族皆重視婚嫁、人物才華、冠冕、貴戚，緣因各地區獨特的客觀因素，遂使對某一項或數項比較重視，循此發展，遂成風氣。隋唐統一全國，定於一，各區域人物滙聚一堂，於是自永嘉亂後各自發展的特質，有了比較的機會，同時也呈現出各區域人物間之競爭，此事另文論之。

從社會科學的角度而觀之，以上各地區人物之差異，乃是事物之表象。各地區士族本身性質之轉變，是由於其由地方性而中央化，由社會性而政治性，由武而文的變

化。一切流風習俗是士族性質變遷後的外在表現，例如在本文第三篇所述，僑姓南渡，與吳姓在南方建立東晉，至隋統一全國，一直離本籍而僑居江南。本身已失去社會基業，從此成爲依附中央政權的官僚人物。以功能主義而言，他們所能貢獻出的力量，是以文才干祿。其尚文之風亦宜矣！官僚型的人物，首重政治階層中的關係。而北方胡人當政，漢士族之被重視，爰因其有充分的地方勢力，助統治者安定社會，故北方的特殊環境，養成士族地方與中央，社會與政治兼顧的性質，故其對於同族關係深厚，而表現在累世同堂[1]，而婚嫁又是連繫其他士族的最佳方法[2]，故重視婚嫁。關中自宇文泰當政以後，以府兵制度結合胡漢社會上的勢力，大族高位，小族低位，納入政治體系中，其以冠冕相尚，亦符合其社會地位，表現出特有性質。

如陳寅恪先生所言，李唐初建國時的統治集團，乃是西魏北周楊隋以來的人物，其性質當與關中士族相同，此點可由李唐皇室對「禮儀」標準，遠沒有士族重視[3]。唐太宗令修氏族志，高士廉輩初定稿列崔幹爲第一，不合太宗意，太宗的士族排列標準爲：（舊唐書卷六十五高士廉傳）

> 太宗曰：我與山東崔、盧、李、鄭，舊既無嫌，爲其世代衰微，全無冠蓋，猶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間，則多邀錢幣，才識凡下，而偃仰自高。販鬻松檟，依託富貴，我不解人間何爲重之，祇緣齊家，惟據河北，梁陳僻在江南，當時雖有人物，偏僻小國，不足可貴，至今猶以崔盧王謝爲重，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在朝士，皆功效顯著，或忠孝可稱，或學藝通博，所以擢用，見居三品以上，欲共衰代舊門爲親，縱多輸錢帛，猶被偃仰，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幹猶爲第一等，昔漢高祖止是山東一匹夫，以其平定天下，主尊臣貴，卿等讀書見其行迹，至今以爲美談，心懷敬重，卿等不貴我官爵邪；不須論數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遂以崔幹爲第三。

1. 如唐書合鈔卷二四五張公藝傳，鄆州壽張人，九代同居……。
   唐書合鈔卷二四五劉君良傳，瀛州饒陽人，累代義居，兄弟雖至四從，皆如同氣……。
   同書同卷宋興貴傳，雍州萬年人，累世同居……。
2. 遂耀東"拓拔氏與中原士族的婚姻關係"新亞學報7卷1期。
3. 陳寅恪指出此點，"統治階級之氏族及其升降"載於「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篇。

通鑑卷一九五，貞觀十二年：

上曰：……乃更命判定，專以今朝品秩爲高下，於是以皇族爲首，外戚次之，崔（民）幹爲第三。

唐太宗「欲崇重今朝冠冕」「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專以今朝品秩爲高下」等思想，乃是承襲關中集團對士族的一貫看法。然而山東士族仍有雄厚的勢力，論者認爲武曌時期，代表關中集團爲核心的勢力衰退，山東士族優勢之建立。但是，由於政治制度社會環境不斷地在變，武周以後參加政治階層的新士族，有另外一種性質，而舊士族不論其來自關中、山東、南方，面臨着這種變化，有一部份亦在轉變，有一部份不變，故在中唐晚唐之時，士族性質之轉移，又有一番新的內容。

（七）

隋朝廢除九品官人法，去州郡大小中正官，至少在形式已打破按門第高下臚列官吏候選人的選舉法，寒素入仕的可能性增加。然而，若將唐代官吏依其社會成分分類統計[1]，其結果如下：

士族 (N)	士族 (%)	小姓 (N)	小姓 (%)	寒素 (N)	寒素 (%)	合計
2233	66.2	414	12.3	724	21.5	3,471

士族仍然占官吏三分之二弱。唐代與魏晉南北朝之間的差別之一，是唐代已有若干比例的寒素入仕，入仕的寒素之中，亦有能升至士族者，所以唐代的社會變動（Social Mobility），除了個人的上升變動之外，還包含着家族的升降，有的魏晉舊族萎縮或退出政治統治階層，有的寒素由小姓而士族。所以在唐代官吏百分之六十六點二的比例中，有一部份是唐代新進的士族，稱之爲唐代新士族。

按拙著「唐代統治階層社會變動」之分類，唐代新族者，係指新進士族、新進士族之後裔、蕃族等。換言之，士族階級中除去魏晉南北朝以來的舊族以外，蓋稱唐代新族，下列統計表係示舊士族與新士族在各期中占官吏之百分比：

1. 參見拙文「唐代統治階層社會變動」1969.

唐代舊士族與新士族比較表

期	皇帝	A（舊族）	B（新族）	A+B（唐士族）
I	高祖太宗	61.5	3.3	64.8
II	高宗	57.9	4.8	62.7
III	武周	51.5	11.8	63.3
IV	玄宗	58.9	8.6	67.5
V	玄宗	63.0	7.6	70.6
VI	肅宗、代宗	44.1	12.1	56.2
VII	德宗	45.5	14.9	60.4
VIII	順、憲、穆、敬	41.2	22.1	63.3
XI	文宗、武宗	57.6	17.9	75.5
X	宣宗、懿宗	64.2	24.5	88.7
XI	僖宗、昭宗	39.3	26.0	65.3
	唐代總比例	53.1	13·1	66.2

舊士族强調家風家學，錢穆先生及陳寅恪先生皆有論及[1]，引爲士族之重要特質，然而以隋唐科舉取士，崇尚詩詞，尤以進士科爲甚，此涉及中古時期士大夫階級賢能標準之爭與黨派之爭，拙文「唐代統治階層社會變動」中已有論及，將有另文細論，經學派與詩詞派之爭，影響所及，不僅表面上人物升降，亦且意味着士族性質的改變。在舊士族中本有一些人喜詞藻，故有一些舊族跟隨時代的變遷，賢能觀念亦轉變，從而對詩詞歌賦喜好。隋唐新興士族以及許多魏晉舊族已轉變成詞詩派者，其內在性質已與魏晉以來所謂舊族家風家學者，已有重大不同。

（八）

實施府兵制度的關中集團，原本有結合政治力與社會勢力，用意是使地方力量走向中央化，隋唐承襲傳統，中央化更形明顯，中軍統率十二軍，十二衞這是中央集權的具體表現，然而，自隋統一中國以後，對全國（關中、山東、南方）人物最具影響的政策，厥爲廢九品中正，將官吏任用權（包括州郡長吏）皆集中在吏部，隋書卷二十八百官志下：

（開皇）三年四月……舊周、齊州郡縣職，自州都郡縣正已下，皆州郡將縣令至而調用以理時事；至是，不知時事，直謂之鄉官，別置品官，皆吏部除授，

1. 參見本篇前段。

每歲考殿最。

通典卷十四選舉二歷代制中云：

隋文帝……自是海內一命以上之官，州郡無復辟署矣！

這項措施是剝削士族霸占州郡「上綱」[1]任官特權，使大小官品皆由中央政府吏部主之。造成士族子弟集中中央政府所在地，營鑽求官。通典卷十七選舉典雜論議中亦云：

隋氏罷中正，選舉不本鄉曲，故里閭無豪族，井邑無衣冠，人不土著，萃處京畿。

士族中央化趨勢，在南北朝末期已經開始，至隋愈爲明顯。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有唐代墓誌銘揚本七千餘張大部份的士族子弟死後埋葬在長安與洛陽附近。白氏長慶集卷六十一唐故虢州刺史贈禮部尚書崔公墓誌銘並序云：

自天寶以還，山東士人皆改葬兩京，利於便近，唯吾一族至今不遷，我歿宜歸全于滎陽。

士族多世居住兩京，加以分房分支，漸與原籍隔離，逐失去其地方性，譜牒成爲連繫重要之物，而爲官吏而官吏是士族子弟追求的目標。是故唐代士族除居住於兩京以外，則有隨任官地而居者，造成「郡望」與「居住地」分離現象，郡望成爲衙頭，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二郡望條：

自魏晉以門第取士，單寒之家，屏棄不齒，而士大夫始以郡望自給，唐宋重進士科，士皆投牒就試，無流品之分，而唐世猶尚氏族，奉勅第其甲乙，勒爲成書，五季之亂，譜牒散失，至宋而私譜盛行，朝廷不復過而問焉。士既貴顯，多寄居它鄉，不知有郡望者蓋五六百年矣！

從社會史的觀點而言，至此士族已脫離地方而趨中央，由社會勢力而變成爲官僚體系之一員了。擁有社會勢力者較不易受政權變動的影響，官僚人物常隨朝代興衰而沉浮。此所以同樣經歷亂世，在五胡亂華之時士族穩立不移；在五代十國之時，士族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1. 參見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編一卷中，頁三九七。

參 考 書 目

史記　漢書補注　後漢書集解　三國志集解　晉書斠注　宋書　南齊書　梁書　陳書　魏書　北齊書　周書　隋書　新唐書　舊唐書　唐書合鈔

南史　北史　資治通鑑

玉海　太平御覽　册府元龜　文苑英華　崇文總目　北堂書鈔　初學記　登科記考

唐六典　通典　文獻通考　通志　唐會要　唐律疏義　唐大詔令集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唐文　唐文粹

監鐵論　論衡　潛夫論　申鑒　中論　人物志　抱朴子　世說新語　顏氏家訓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墓誌拓本

華陽國志　元和郡縣圖志　太平寰宇記　長安志　洛陽伽藍記

三國兩晉及南北朝各代方鎮年表（吳廷燮撰）

日知錄　二十二史劄記　十七史商榷

大英博物館攝藏敦煌遺書照像本 Order No. O.P.B. & MSS 11431/4200 Title Stein Rolls

四民月令　唐摭言　唐語林　漢唐事箋　唐才子傳　翰林志

封氏見聞記　翰林院故事　隋唐嘉話　唐闕史　北夢瑣言

大唐創業起居注　貞觀政要　鄴侯家傳

王伊同　「五朝門第」　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叢刊乙種　1943

王伊同　"崔浩國書獄釋疑"　清華學報新1卷2期　1957

王壽南　「唐代藩鎮與中央關係之研究」　嘉新研究論文　1969

王夢鷗　「唐人小說研究」　藝文印書館　1971

毛漢光　「兩晉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　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出版委員會，1966

毛漢光　"我國中古大士族之個案研究——瑯琊王氏"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7本，1967

毛漢光　「唐代統治階層社會變動」　影印博士論文，1969

毛漢光　"五朝軍權轉移及其對政局之影響"　清華學報新8卷第1,2合期，1970

毛漢光　"敦煌唐代氏族譜殘卷之商榷"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3本第2分，1971

毛漢光　"三國政權的社會基礎"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6本第1分，1974

毛漢光　"從中正評品與官職之關係論魏晉南朝之社會架構"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6本第4分，1975

向　達　"敦煌叢抄"　北平圖書館館刊5卷6期，1931

牟潤孫　「論魏晉以來之崇尚清談及其影響」　香港中文大學　1966

牟潤孫　"敦煌唐寫姓氏錄殘卷考"　臺大文史哲學報第3期　1951

全漢昇　「唐宋帝國與運河」　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24，1944

余英時　"東漢政權之建立與世家大姓之關係"　新亞學報1卷2期　1956

余英時　"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　新亞學報4卷1期　1959

余　遜　"南朝之北士地位"　輔仁學誌12—1~2，1943

何啓民　"中古南方門第吳郡朱張顧陸四姓之比較研究"　政大學報第27期　1973

何啓民　"永嘉前後吳姓與僑姓關係之轉變"　政大學報第26期，1972

何炳棣　「中國會館史論」　臺灣學生書局，1966

李樹桐　「唐史考辨」　中華書局　1965

杜　牧　「樊川文集」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邱漢生　"從四民月令看東漢大地主的田莊"

谷霽光 「府兵制度考釋」 1962
谷霽光 "六朝門閥" 武漢大學文哲季刊5卷4期
谷霽光 "安史亂前之河北道" 燕京學報卷19 1936
瞿同祖 「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 上海 1947
周一良 "北朝民族問題與民族政策" 燕京學報第39期
周一良 "南朝境內之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本第4分 1938
岑仲勉 「唐史餘瀋」1960，「隋唐史」 1957
岑仲勉 四校林寶「元和姓纂」 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 29, 1948
周一良 "領民酋長與六州都督"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上册 1948
芮逸夫 "遞變的中國家族結構" 臺大考古人類學刊17-18合刊 1961
金發根 「永嘉亂後北方的豪族」 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出版委員會 1964
金發根 "東漢黨錮人物的分析"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4本下册 1963
金發根 "塢堡溯源與兩漢的塢堡"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7本上册 1967
武仙卿 "魏晉時期社會經濟的轉變" 食貨半月刊1-2 1934
姚薇元 「北朝胡姓考」 1962
祝秀俠 「唐代傳奇研究」 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第四輯 1957
唐長孺 「魏晉南北朝史論叢」「魏晉南北朝史續論叢」「三至六世紀江南大土地所有制」
唐長孺 "門閥的形成及其衰落"
徐高阮 "山濤論"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1本第1分 1969
孫同勛 "拓拔氏的漢化" 臺大文史叢刊 1962
孫同勛 "北魏初期政治的衝突與崔浩之獄" 幼獅學誌 3-1，1964
孫國棟 "唐宋之際社會門第之消融" 新亞學報4卷1期 1959
孫國棟 "唐貞觀永徽間黨爭試釋" 新亞學院學術年刊7
高亞偉 "孫吳開闢鑾越考" 大陸雜誌7卷7、8期 1953
許倬雲 "西漢政權與社會勢力的交互作用"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5本 1964
許倬雲 "漢代家庭的大小" 清華學報慶祝李濟先生七十歲論文集下册 1967
許倬雲 "三國吳地的地方勢力"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7本上册 1967
許國霖 "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叢抄" 北平圖書館館刊6卷6期 1932
陳 垣 "史諱舉例" 燕京學報第4期 1928
陳 垣 "敦煌劫餘錄" 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4，1931
陳 槃 "漫談地券" 大陸雜誌2卷6期 1951
陳寅恪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20，1944
陳寅恪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22，1944
陳寅恪 「元白詩箋證稿」
陳寅恪 "李唐氏族之推測""——後記""——三論"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本1分、4分、第5本1分，1931，1933，1935
陳寅恪 "崔浩與寇謙之"
陳寅恪 "論隋末唐初「所謂山東豪傑」"
陳寅恪 "記唐代之李、武、韋、楊婚姻集團" 1954
章 羣 「唐史」 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第1輯 1958
章 羣 "論唐開元前的政治集團" 新亞學報1卷2期 1956
陶 潛 「羣輔錄」 漢魏叢書第36册
陶希聖 「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 新生命書局 1929

陶希聖鞠清遠 「唐代經濟史」 1935
陶希聖武仙卿 「南北朝經濟史」 1937
陶希聖 「中國政治制度史」 初版 1944，臺一版 1974，啓業書局
陶元珍 "三國吳兵考" 燕京學報第 13 期 1933
傅樂成 "荊州與六朝政局" 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4 期 1952
勞 榦 "論漢代的游俠" 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1 期 1950
勞 榦 "漢代察舉制度考"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17 本 1948
勞 榦 "論漢代的豪強及其政治上的關係" 清華學報慶祝李濟先生七十歲論文集上册 1967
勞 榦 "論東漢時代的世族" 學原卷 3 第 3, 4 期
勞 榦 "關東與關西的李姓與趙姓"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31 本 1960
賀次君 "西晉以下北方宦族地望表" 禹貢 3 卷 4 期 1935
賀昌羣 「漢唐間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 1964
逯耀東 "拓拔氏與中原士族的婚姻關係" 新亞學報 7 卷 1 期 1965
逯耀東 "從北魏前期的文化與政治形態論崔浩之死" 新亞學報 7 卷 2 期 1966
楊筠如 「九品中正與六朝門閥」 上海商務 1930
楊忠一 "部曲沿革略考" 食貨半月刊 1 卷 3 期 1935
楊聯陞 "東漢的豪族" 清華學報 11 卷 4 期 1936
楊聯陞 "傳統中國政府對城市商人之統制" 清華學報新 8 卷 1, 2 合期 1970
楊聯陞 "中唐以後稅制與南朝稅制之關係" 清華學報 12-3 1937
楊樹藩 「唐代政制史」 正中書局 1967
鄒文海 「鄒文海先生政治科學文集」 鄒文海先生六十華誕受業學生慶祝會印行
萬繩楠 "曹魏政治派別的分野及其升降"
趙鐵寒 "記袁安碑" 大陸雜誌 12-5～6 1956
鄧名世 「古今姓氏書辨證附校勘記」 叢書集成初編
鄧嗣禹 「中國考試制度」 1967
劉 復 「敦煌掇瑣」 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 2，1931
錢 穆 "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係" 新亞學報 5 卷 2 期 1963
繆啓愉 "吳趙錢氏在太湖地區的圩田制度和水利系統" 農史研究集刊第 2 册
鞠清遠 "兩晉南北朝的客、門生、故吏、義附、部曲" 食貨 2-12 1935
鞠清遠 「唐代財政史」 商務 1940
韓復智 「兩漢的經濟思想」 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出版委員會 1969
薩孟武 「中國社會政治史」 第一、二、三册三民書局 1966
譚其驤 "晉永嘉喪亂後之民族遷徙" 燕京學報卷 15 1934
嚴聖偉 "論三國時代之大族" 新亞學報六卷一期 1964
嚴耕望 "北齊北周政權下漢人勢力之推移" 新亞學報 6 卷 2 期 1964
嚴耕望 「兩漢迄五代入居中國之蕃人氏族研究——兩漢至五代蕃姓錄」 新亞研究所專刊 1967
嚴耕望 「中國地方行政制史」 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 45，1950-52
嚴耕望 "秦漢郎吏制度考"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23 本上册 1951
嚴耕望 「中國歷史地理」 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第 2 輯
嚴耕望 "唐藍田武關道驛程考"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39 本下册 1969
嚴耕望 "略論唐六典之性質與施行問題"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24 本 1953
嚴耕望 「唐史研究叢稿」 新亞研究所出版 1969

上田早苗 “巴蜀の豪族と國家權力” 東洋史研究 25-4，1967
川勝義雄 “曹操軍團の構成について” 創立廿五周年紀念論文集 1954
川勝義雄 “孫吳政權の崩壞から江南貴族制へ” 東方學報 44，1973
川勝義雄 “シナ中世貴族の成立について” 史林 33-4，1950
川勝義雄 “貴族制社會と孫吳政權下の江南” 刊於中國中世史研究 6，1970
五井直弘 “曹操の政權について” 歷史學研究 178，1954
仁井田陞 「支那身分法史」1942
仁井田陞 「中國法制史研究」1962
仁井田陞 「唐令拾遺」1933
井上晃 “後魏姓族分定考” 史觀第 9 期 1936
矢野主稅 “魏晉中正制についての一考察” 史學研究第 82 期 1961
矢野主稅 “魏晉中正制の性格について一考察——鄉品と起家官品の對應を手掛りとして” 史學雜誌 72-2，1963
矢野主稅 “裴氏研究” 社會科學論叢 14
矢野主稅 “鄭氏研究” 社會科學論叢 8
矢野主稅 “門閥貴族の系譜試論” 古代學 1-7，1952
矢野主稅 “韋氏研究” 長崎大學學藝部研究報告臨時增刊號
布目潮渢 “唐朝創業期の一考察” 東洋史研究 25-1，1966
布目潮渢 「隋唐史研究——唐朝政權の形成」 東洋史研究叢刊之 20，1968
竹田龍兒 “唐代士人の郡望について” 史學 24-4，1951
竹田龍兒 “貞觀氏族志の編纂に關する一考察” 史學 25-4，1952
竹田龍兒 “門閥としての弘農楊についての一考察” 史學 31-1～4，1958
安田二郎 “南朝の皇帝と貴族と豪族、土豪層——梁武帝の革命を手がかりに” 刊於「中國中世史研究」1970
守屋美都雄 “六朝門閥の一研究——太原王氏系譜考” 法制史研究 4，1951
西村元佑 「中國經濟史研究——均田制篇」 東洋史研究叢刊之 17，1970
池田溫 “唐朝氏族志の一考察” 北海道大學文學部紀要 13-2，1965
池田溫 “八世紀初における敦煌の氏族” 東洋史研究 24-3，1965
吉田虎雄 「魏晉南北朝租稅の研究」 中國學術研究叢書 3，1943
多田狷介 “後漢豪族の農業經營” 歷史學研究 286，1964
好並隆司 “曹操の時代” 歷史學研究 207，1957
宇都宮清吉 “評岡崎博士著「南北朝における社會經濟」” 東洋史研究 1:3，1936
谷川道雄 “北魏末期の鄉兵について” 東洋史研究 20-4，1962
志田不動麿 「東洋中世史」 平凡社 1939
岡崎文夫 「魏晉南北朝通史」 弘文堂書房 1932
岡崎文夫 「南北朝に於ける社會經濟制度」 1935
周藤吉之 「唐宋社會經濟史研究」 東京大學出版會 1965
宮川尚志 「六朝史研究」政治、社會篇 日本學術振興會刊 1956
宮川尚志 “三國吳の政治と制度” 史林 38-1，1955
宮川尚志 “魏晉及南朝の寒門、寒人” 初刊於東亞人文學報 3-2
宮崎市定 「九品官人法の研究」 東洋史研究叢刊之一，1956
狩野直禎 “蜀漢政治の構造” 史林 42-4，1959
狩野直禎 “後漢末の世相と巴蜀の動向” 東洋史研究 15-3，1957
越智重明 “南朝の貴族と豪族” 史淵第 69 期 1956
越智重明 “東晉の豪族” 史淵第 76 期 1958

越智重明 "州大中正の制に關する諸問題" 史淵第94期 1965
越智重明 "南朝の清官と濁官" 史淵第96期 1966
越智重明 "梁陳時代の甲族層起家の官をめくつて" 史淵第97期 1966
越智重明 "梁の天監の改革と次門層" 史學研究第97期 1966
越智重明 "魏晉南朝の最下級官僚層について" 史學雜誌 74-7, 1965
越智重明 "清議與鄉論" 東洋學報 48-1, 1967
增村宏 "黃白籍の新研究" 東洋史研究 2-4, 1937
濱口重國 「唐王朝の賤人制度」 東洋史研究叢刊之15, 1966
濱口重國 「秦漢隋唐史の研究」 東京大學出版會 1966

Andreski, Stanislav: Military Organization and Societ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Aron, Raymond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Ruling Clas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I, 1950.
Balazs, Etienne.: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 Trans. by H. M Wright ed. by Auther F. Wrigh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4.
Bendix, Reinhard and Lipset, Seymour Martin: Class, Status, and Power-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Free Press 2nd ed. 1966.
Bottomore, T. B.: Elites and Society. Penguin Books L. T. D. 1964.
Burnham, James: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Chang, Chung-Li: The Chinese Gentry: 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Societ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55.
Ch'en, Ch'i-yü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Hsun Family (ca 100-300 A. D.): A Case Study of One of 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in the Six Dynasties"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sian History, University of Hongkong 1964
Ch'ü, T'ung-tsu: Law and Society in Traditional China. Paris and The Hague 1961.
Ch'ü, T'ung-tsu: 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h'ü, T'ung-tsu: Han Social Structure. 1972.
Ch'ü, T'ung-tsu: "Chinege Class Structure and its Ideology" in Fairbank, J.K. (ed), 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
Creel, H. C.: Confucius, the man and the myth. New York. 1949.
Dahl, Robert A.: Who Govern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1th Printing 1967. Frist Published 1961.
Dien, Allert E.: "The Use of the Yeh-hou chia-chuan as a Historical Sourc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34, 1974.
Dien, Allert E.: "Elite Lineages and the T'o-Pa Accommodation: A Study of the Edict of 495"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Vol XIX Part I.
Domhoff, G. William and Ballard, Hoyt B.: C. Wright Mills, and the Power Elite. Beacon Press 1969. First Published 1968.
Domholf, G. William: Who Rules America, Prentice-Hall 1967.
Eberhard, Wolfram: The Rulers and Conquerors: Social Forces in Medieval China. Leiden first Edition 1952. Second Edition 1965.
Eberhard, Wolfram: Social Mobility in Traditional China. Leiden E. J. Brill 1962.
Eberhard, Wolfram: "Additional Notes on Chinese *gentry society*"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7 No. 2. 1955.

Eberhard, Wolfram: "Research on the Chinese Family". Sociologus Vol 9. 1959.

Eisenstadt, S. N.: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Empire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Historical Bureauratic Societies. Fress Press paperback 1969. First published 1963.

Eisenstadt, S. N.: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Historical Societie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VI. (n. 4 July 1964).

Fairbank, John K.: 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airbank, John K. Reischaner, Edwin O.: *East Asia: The Great Traditi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Boston.

Fei, Hsiao-t'ung: China's Gent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Fei, Hsiao-t'ung: "Peasantry and Gentry: An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Social Structure and Its Chang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LII. 1946.

Fei, Hsiao-t'ung: Peasant Life in China.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39.

Feng, Han-Yi: "The Chinese Kinship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II, 2 (July, 1937).

Frankel, Hans H. "The K'ung Family of Shan-yin" 清華學報新2卷2期

Johnson, David "The Medieval Oligarchy: A Study of Great Families in their Social, Political & Institutional Setting" 博士論文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70.

Ho, Ping-ti: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Ho, Ping-ti: "The Salt Merchants of Yang-chou: A Study of Commercial Capitalism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XVII (Nos. 1-2. June, 1954).

Hsiao, Kung-Chuan: 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cth-centur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erss. 1960.

Hsu, Cho-yun: 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An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 722-222B. C.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Hsu, Cho-yun: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Society and the Central Political Power in former Ha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II. 1965.

Lasswell, Harold D.: The Political Writing of Harold D. Lasswell

Lasswell, Harold D.: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Elites-An Introduction and Bibliograph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Lasswell, Harold D.: Politics-Who gets, what, when, how.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1th Printing 1968. First Published 1958.

Kracke, Jr. E. A: "Family vs. Merit in Chines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under the Empir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X (No. 2. Sept. 1947).

Kracke, Jr. E. A.: Civil Service in Early Sung China, 960-1059. Cambridge, 1953.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onograph Series Volume XIII.

Kracke, Jr. E. A.: "Region, Family, and Individual in the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 -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Li, Chi: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8.

Lundberg, Ferdinand: The Rich and Superrich. Bantam Book, Ice. 4th Printing 1969. First Published 1968.

Liu, Hui-Chen (Wang).: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lan Ruler. N. Y. 1959.

Liu, James T. C.: Reform in Sung China; Wang An-Shih (1021-1086) and his New Polic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Mannheim, Karl: Idealogy and Utopia. Trans from the German by Louis Wirth the Edward Shils. N. Y. 1936.

Marc, Block: Feudal Society. Trans. by L. A. Manyon Roullege & Kegon Paul L. T. D. London.

Marsh, Robert. M.: Mardarin and Executive: Elite Mobility in Chinese and American Societies. Columbia University 1959.

Menzel, Johanna M.: The Chinese Civil Serivce-Career Open to Talent D. C. Heath and Company. 1963.

Meskill, John: The Pattern of Chinese History-Cycles, Development or Stagnation, C. D. Heath and Company. 1965.

Mills, C. Wright: The Power Elit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aperback 1959. First Published 1956.

Mosca, Gaetono: The Ruling Class. Trans. by Hannah D. Kahn. N. Y. and London. 1939.

Nivison, David S. and Wright, Auther: Confucianism in Ac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areto, Vilfredo: The Mind and Society. Brace and Company, 1942.

Parsons, Talcott: Societies-Evolutionary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Prentice-Hall, Inc., 1966.

Pasons, Talott: Theories of Society. 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 Inc. 1961.

Pulleyblank, Edwin. G.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Pulleyblank, Edwin. G. "Gentry Society: Some remarks on recent work by W. Eberhard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5. 1953.

Reischauer, Edwin O.: Ennin's Diary, and Ennin's Travels in T'ang China. 1955.

Rusell, Bertrand.: Power-A New Social Analysis. London, George Auen & Unwin L. T. D. 王鳳喈譯本

Ruey, Yih-Fu (芮逸夫)："Changing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Family" 臺大考古人類學刊第17. 18期

Schumpeter, Joseph: Imperialism-Social Classes.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1th Printing 1971. First Published 1955.

Shils, Edward: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Powers: Some Perspectives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 -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1. 1958.

Skinner, G. W.: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1957.

Sorokin, Pitirin. A.: Social and Cultural Mobility. Free Press of Glencoe. Illinois.

Thrupp, Sylvia L.: "Hierarchy, Illusion and Social Mobility: A Component on Ping-Ti Ho, Aspect of Social Mobility in China, 1368-1911" -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II (No. 1. Oct. 1959).

Twitchett, D. C.: 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T'ang Dynas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3.

Twitchett, D. C.: "The Monasteries and China's Economic n Medieval Times" - Bulletin of 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udies Vol XIX. Part 3. 1957.

Veblen, Thostein: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Viking Press paperback 1948. First Published 1899.

Wang, Gungwu: 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Kuala V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3.

Wang, Yi-t'ung: "Slaves and other Compararable Social groups during the Northern Dynasties"

-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XVI. Nos. 3-4. Dec. 1953.

Weber, Max: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Trans. by A. M. Henderson and Talcott Parsons. 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47.

Webex, Max.: From Max Weber: Eassys in Sociology. Trans by H. H. Gerth and C. W. Mills (N.Y. 1946).

Weber, Max: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Trans. by Edward A. Shils and Henry A. Finch. Free Press Glencoe. Illinois. 1949.

Weber, Max.: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 by Talcott Parsons. Charles Seribner's Sons. N. Y. 1958.

Wittfogel, K. A.: New Light on Chinese Society. 1938.

Wittfogel, Karl. A.: Oriental De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Wittfogel, Karl. A.: "Public Office in the Liao Dynasty and the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 -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X.

Wright, Arthur F. and Twitchett, Denis: Perspectives on the T'ang. 1973.

Wright, Arthur F.: The Confucian Persuasion. Stanford. 1960.

Wright, Arther F.: "The Formation of Sui Ideology". 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

Yang, Lien-Shêng: Studies in Chinese Institutional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Yang, Lien-Shêng: Topics in Chinese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Yang, Mattin C.: A Chinese Villag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 Y.